Far East
HC
426
.T8

CAI-JING YANJIU

财经研究

1

1958

目　　录

駁斥資产阶級右派謬論

駁斥吳景超在人口問題上对中国人民的侮蔑……褚葆一(1)

从"乡土工業"的謬論看費孝通的反动本質……張有年　朱士耀(4)

駁斥厉德寅等反对学習苏联反对学習中国人民大学的謬論…楊国璋　桂世祚　陈善林　柴作楫　邱　淵　葛霖生(10)

駁斥厉德寅复辟資产阶級統計学的讕言……肖　卓(15)

坚决粉碎右派分子复辟資产阶級統計学的陰謀……王思立　朱　元　蔣士駒　楊　惠　郑德如　王建民(20)

論　　文

論社会主义和資本主义的經济竞賽……胡世杰(24)

√关于目前时期大力發展农業的几个問題……丁日初(28)

√ 我国工業管理体制的偉大改革……汪鴻鼎　謝树森　屠修德(35)

√ 我国商業管理体制上的一次重大改革……吳智偉　崔　燄(38)

√ 改进財政管理体制的重大意义……李民立(42)

√ 农業社收入分配核算問題的研究(下)……吳滬生　陈治鈞(46)

討　　論

√关于我国农業生产計划向征購計划过渡問題的商榷(上)……張开敏　陈声雅(54)

專 題 报 告

√关于上海工業的情况和若干問題……刘志誠(60)

学 术 动 态

本院学术动态……实(65)

2137

駁斥吳景超在人口問題上对中国人民的侮蔑

褚葆一

我們国家有六万万以上的人口，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人多不但是我們国家的特点，也是我們国家的优点，建設社会主义的巨大力量就是从这里产生的。但是資产阶級右派份子，对于劳动人民一向抱有刻骨的仇恨，由于与生俱来的仇視劳动大众，因此也不放过每一个机会来咒咀我們众多的人口。在解放以前，他們跟在他們的"洋大人"之后，一起叫囂，說中国人口太多，因此不能摆脫貧困、愚昧与疾病。为帝国主义及反动政府卸脫罪責。在解放以后，人民不准他們再講这些侮蔑性的話了，于是不得不改变詞句，說中国人口太多，老百姓太会生孩子，因此建設社会主义很困难。裝做很关心社会主义建設的样子，他們这些話企圖达到兩个目的，一是对中国人多进行侮蔑；二是好像中国困难的人口問題未解决以前，要建設社会主义沒有希望，企圖瓦解我們建設社会主义的信心和决心。

章罗联盟的干將吳景超所写的"中国人口問題新論"①，就是这样一棵毒草。通篇用美丽的馬列主义的辞句裝扮起来，以此来迷惑人，販买他的馬尔薩斯主义的私貨。

吳景超的基本論点是这样的：

他表明他是从社会主义經济規律的要求，来研究及解决中国的人口問題的。建設社会主义社会的首要任务是提高劳动生产率。要完成这个任务必須提高劳动人民的技术裝备，增加国民收入中的积累部份。吳景超着重指出："过高的人口出生率，是有碍于积累的迅速增加的"。也就是說，人口出生率太高，对建設社会主义是不利的。

再从活劳动和物化劳动之間的比例关系来看："我們的問題，是現在还沒有足够的生产資料，可以把目前存在的劳动力，加以最合理、最經济、最有效的利用。"就是說，我們目前人口已經太多，按照我們目前的积累来看，每年約170亿元左右，如果每一职工，需要一万三千元的生产資料，那么这点积累，每年只能增加130万人就業。但按照我們的人口增加率，每年有600万人要求就業，他說，"問題就在这里。"

接着，他来处方了，他說，既要滿足建設社会主义社会的要求，提高技术裝备，又要使应該就業的每年600万人都就業，这样兩全其美的办法是沒有的，或者是讓要求就業的人都就業，而不要社会主义，不去迅速提高国民經济的技术水平；或者是要社会主义，而把我們的人口出生率从千分之37下降到千分之17。吳景超虛伪地講，降低出生率是可能的，但同时却告訴讀者要达到这目的是不可能的，至少，在10年或20年那样的期間內是不可能的。他說要把人口出生率从千分之37下降到千分之17是要縮減千分之20。从历史上看，德国曾經花了51年的时間使人口出生率縮減千分之21.5。苏联花了37年②的时間（从1913到1950）才使人口出生率縮減千分之20.5，而苏联在1950年人口出生率还高达千分之26.5，（比我們所要到达的千分之17还差得很远！）吳景超講我們采取节育政策可能不必要等37年就可使人口出生率縮減千分之20，但他沒有指出究竟要等30年呢还是等35年。这里也显出了右派份子的手法，用了許多漂亮的辞句，原来只是告訴我們一条：要建設社会主义，先等37年再說！

仅仅解决人口出生率的問題，問題还沒有全部解决。因为目前的人口数量和生产資料比較起来是失調的。下降人口出生率只能解决將来的問題。目前的問題还是沒有办法。所以在篇尾他这样說："旧社会遺留下来的农村中广大人口，在机械化的过程中，必然騰出許多劳动力，这些劳动力，应当如何安排"，他沒有提出解决的办法。吳景超在这里故作姿态只是把問題提出，而不加解决，意思是讓讀者去自己思考。其实讀者們根据他前面所提解决問題的办法也早已看破了他的錦囊妙計，这些問題沒有别的方法可以解决，只有用吳景超那个老办法，那就是节制生育，減少人口，而吳景超在文章的开始却早已画龙点睛似地說过，"从历史的經驗看来，沒有一个工業化的国家，因实行节制生育而使人口減少的。"这样，最后的

① 載新建設1957年3月号。

② 右派份子吳景超在这里要了一个花招，他把从1913到1950故意計算为27年而不是37年（見新建設1957年3月号第7頁），使讀者不那么容易地發現他的毒藥。

結論也就不說自明了。

总起来說，吳景超通过那篇文章要給讀者一个什么样的結論呢?那就是，根据社会主义經济規律的要求，中国要建設社会主义，有兩不可能：目前的人口太多，生产資料太少，所以建設社会主义不可能，这是一不可能；其次，人口自然增加率太高，积累太少，所以建設社会主义不可能，这是二不可能。

吳景超在这篇"中国人口問題新論"里所提出来的論点，包含着很严重的錯誤和濃厚的毒素。

第一，吳景超在文章里搬弄了馬克思主义政治經济学的許多規律，以此来夸耀他自己是馬克思主义政治經济学的行家。而同时利用这些規律作为幌子，把不屬于这些規律的意思硬加到这些規律上去。歪曲这些規律，以达到他不可告人的目的。

例如：对于社会主义基本經济規律，吳景超就这样加以利用："我們对于每一劳动者所配备的生产資料，如果比理想的水平少一些，低一些，生产还是照旧进行的，但是这种生产，就不是在高度技术基础上进行，而可能是在落后技术的基础上进行，那是不符合于社会主义基本經济規律要求的。"吳景超在这里着重的是要劳动者一个都不能例外地配备最新式的机器設备，否則就不合社会主义基本經济規律的要求，因此也就不能实現社会主义。我們在这里要指出：这不是社会主义基本經济規律的要求，而且在事实上也是办不到的。因为生产技术是在不断进步的，每天都可以有新的改进，每天都可以有新的發明，而机器裝备一旦配备起来就一定要使用一个相当長的时期，不能有了新的圖样，新的效率較高的机器，就把旧的設备，旧的机器一律作廢。無論是在資本主义国家或社会主义国家都有一部份旧的老式的生产設备在繼續使用的，甚至在更新的时候，由于經济上的原因或其他的考慮，有时候宁願不采用最新的圖样，而反而去采用比較旧式的生产資料的。馬克思主义解决問題的方法，是要照顧到时間，地点与条件的。吳景超在这里想用一个死办法把我們束縛住，那对不起，只有枉費心机了。不錯，社会主义基本經济規律是要在高度技术基础上进行生产，但这是在具体条件下的高度技术，而且并非是像吳景超所說的，要求一个也不能例外。我們可以有最新式的机器設备，但同时也可以使用稍为旧一点的設备，只要我們認为是合宜的，这并不能就認为是不符合規律的要求。这就等于：在莫斯科的大街上，有最新式的大厦，也有古老的楼房，二者同时并存，誰也不会因此就否認莫斯科是社会主义都市。我相信吳景超对于这一点是了解的，他所以故意加以曲解，無非是要我們相信我們建設社会主义的条件还沒有具备而已。

第二，吳景超在計算新增职工攤到的投資数以及就業的可能性时，也是尽量加以歪曲，我們知道，中国目前还是农業国，因此劳动就業的主要方向是参加农業劳动。在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以后，劳动就業主要是参加农業合作社，作一个集体农民。而一个集体农民所需要的投資数是比一个工人要少得多的，但吳景超在計算新增职工所需要的投資数和就業可能性时，却故意把这主要方面撇开不提。在他的表內也列有"农業、水利和林業"一欄，但是他所考慮的只是国家經营的农業企業，把农業生产合作事業完全不考慮进去，这样来达到提高新增职工所需投資数及减少就業可能性的目的。

还有，国民經济建設計划一經訂定以后，不可能沒有修改的，这点斯大林在总結第一个五年計划的时候早已指出来了。吳景超曾經是主講国民經济計划的一个教授，当然不会不知道的。我国近年来由于党領导了增产节約运动取得了偉大的成就，基本建設的單价一再下降。但是吳景超在計算每一职工所需投資額的时候，还是以第一次五年計划的原定数字为标准而不加絲毫的修正。故意使計算出来的数字偏高，[illegible]伪地"証明"他的中国积累不足，建設社会主义無望的荒无拟就的結論。

总之，吳景超在这篇文章里故意曲解規律，歪曲事实，以达到他反对人民反对社会主义的目的。他的手法是很恶毒的，他設法給人以假象，好像他是拥护社会主义的，很关心社会主义的。而眞正的主張呢，是要社会主义慢慢来，再等37年再說，無非是要使人相信我們党提出的，在三个五年計划期間建成社会主义的說法不可能实現。当然，他也了解公开这样講是不得人心的，于是借用馬列主义辞句，轉弯抹角以表达他这样反动的主張。

在"中国人口問題新論"里，最引人触目惊心的一点，便是吳景超对人的看法，也就是他对于我們人民的态度。吳景超批判了"人是財富的創造者"这一論点。他說，"劳动力是財富的源泉，我們对于这一点是完全同意的。但是初生的嬰兒，并不是劳动力。他不能創造財富，而只能消耗財富。不但他不能在出生的那一年創造財富，就是在以后的十几年中，他也不是生产者，而只是消費者。只有当他成長到15岁或15岁以后，他才能加入生产，为社会創造新的价值及使用价值。"从这段話里可以看出来，吳景超把我們国家最宝貴的人，看作是仅仅是提供劳动力的工具。初生的嬰兒因为不能提供劳动力，因此就認为在我們国家里就不应該有他們的地位。因此，不应該把他們生出来，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态度呢，难道是我們国家对待人的态度嗎？完全不是的。这是資本主义国家資本家对待劳动者的态度。上面这一段話，它的語气和內容（除了使用了几个馬克思主义的术語以外）和資产阶級經

济学社会学書刊上的話是沒有什么不同的。在这里，吳景超充分暴露了他的資产阶級右派的立場和思想感情。

吳景超在节育問題上想鑽我們空子，他看到我們党主張节育，于是他以为有机可乘可以推銷一下他的私貨了。他在文章中引了周总理的一段話，好像他吳景超的主張节制生育，正是根据我們党的政策而来的。实际呢，完全是兩回事。周总理的話說得很清楚："为了保护妇女和兒童，很好地教育后代，以利民族的健康和繁荣，我們贊成在生育方面加以适当的节制"。可見我們党的节育主張，正是从关怀妇女和兒童的健康，对人的尊敬、爱护为出發点的。而吳景超呢，是从責怪嬰兒不能参加劳动的那种对人的冷酷看法，也就是对人的仇視为出發点的，那里有一点与我們党的看法有共同之处呢，正是在这里表显了資产阶級右派与我們的根本紛歧。

馬尔薩斯主义者与我們馬克思主义者有一个根本不同之点。他們把人口問題作为解决人类社会一切問題的根本問題：只要实行节制生育，减少人口，穷人的孩子不要生得太多，于是一切問題都不成問題了，社会就可以順利地發展。我們認为这样的看法是不合乎历史唯物主义的。人类社会發展的根本問題是生产关系的性質是否适合生产力的要求的問題。而人口問題本身也必須要从生产关系是否和生产力相适应这一关系上来研究解决的。节制生育并不是决定社会进程的根本問題。这是我們和吳景超的节育主張的根本区别。而吳景超就是要設法来模糊这个界綫，以便混淆視听，偷运私貨，他是这样講的："我們提倡节育，除了一般人所說的为了妇嬰的健康，子女的教养，民族的繁荣等理由外，还是为了要迅速地提高人民的劳动生产率，要使我們的生产合乎社会主义基本經济規律及有計划按比例發展規律的要求，因而使我們現在能順利地完成过渡时期的总任务，將来不过分費力地解决基本經济任务。"吳景超在这里很恶毒地把馬克思主义对节育的看法和馬尔薩斯主义混为一談。

附帶要提出的是吳景超在1957年發表的这一篇反动論文，內容和他在解放前發表的文章"工業化过程中的資本与人口"① 是一模一样的。吳景超在解放前就是臭名昭著的馬尔薩斯主义的信徒。在"工業化过程中的資本与人口"一文里，把美国資源委員会的数字作为标准，說中国要工業化，必需每一职工配备四千六百美元的資本，他假定四亿五千万中国人中間有40%就業，那末一亿八千万的就業人口就要八千二百八十亿美元的資本，他断定中国人是拿不出这么多錢的，于是他就提出另外一个少花錢也可以工業化的办法，那就是节制生育，吳景超毫無人性的很欣賞当时中国的很高的死亡率，他"希望政府，以节制生育为其人口政策。……假如每一对成婚的夫妇，生育子女，不得超过二人，則在目前的死亡率之下，將中国的人口，降低为二亿人，其可能性比儲蓄美元八千二百八十亿美元要大得多"。这一段話，充份証明了吳景超仇視我們人民是一貫的，他把节制生育和死神的威力結合起来，企圖使当时中国的四亿五千万人口减少到二亿人口，他的心腸是比虎狼还要毒还要狠的。

吳景超前后兩篇文章虽然相隔將近十年，但是从观点立場到結論，还是絲毫不变，虽然經过解放，虽然經过党的苦心教育，然而吳景超还是牢牢的站在資产阶級右派的立場上，站在反动的馬尔薩斯主义的立場上，一心与人民为敌。他这样敌視人民的主張，在反动政府統治的时代，是有人賞識的，但是今天人民已經当家作主，这样的反动論調，我們是决不容許他繼續加以傳播的。

我們知道，吳景超还有一个叫囂得很响的主張，就是要恢复資产阶級的社会学，其中包括一条，要恢复人口問題的討論研究。这篇"新論"想来就是吳景超拿出来作为示范的罢，很好！通过这篇"中国人口問題新論"，我們也領教了吳景超一伙人主張恢复資产阶級社会学的眞正意圖。很清楚，他們的意圖不是别的，就是要借此来侮蔑我們人民，否定我們的社会主义，借"科学"之名来迷惑人，为恢复資本主义准备条件，在科学的外衣之下，进行政治陰謀。这手段是很巧妙，很毒辣的。可是他們估計錯了一点，在党的領导下，人民的覺悟已經提高了，我們不会上这个当，更不会同意他們这个荒謬主張。

---

① 見"观察"三卷三期，1947年9月。

从"乡土工業"的謬論看費孝通的反动本質

張有年　朱士耀

一

在这次右派份子利用党的整風运动的机会，向党發动瘋狂进攻的过程中，披着学者外衣的費孝通也充当了一名急先鋒。他假借恢复旧"社会学"和研究当前社会問題的幌子，来进行反动的政治陰謀活动。在去年四、五月間，他一方面选中了知識份子問題，先后發表了"知識份子的早春天气"、"早春前后"等文，公开煽动知識份子抗拒思想改造，否定知識份子必須和工农相結合的方向，企圖破坏工人、农民和知識份子的联盟；另一方面，他又选中了农民問題，利用了他在人民代表进行視察的机会中所收集的"資料"，在"新观察"杂志上發表了"重訪江村"一文，其中不仅污蔑了党的农業合作化方針、統購統銷政策，企圖进一步破坏工农联盟，更恶毒的，他还以农民利益代表者自居，重新提出他过去的"乡土工業"謬論，来挑撥党与农民之間的关系，妄想誘惑农民回头走資本主义道路。他在"重訪江村"一文中，曾經說道："这里提出的一个問題，我覚得有很大意义的，就是，在这一类农村里，也就是原料生产地，建立的小型輕工業工厂，在今后是不是还有出現的可能和必要？談起了这个問題，我也有一段心事，因为二十一年前我看到过这种小工厂对于提高农村經济的好处，印象很深，所以在解放前我写过不少文章，提倡所謂'乡土工業'。也許由于我道理講得不清楚，又过分强調了这种小型輕工業在国民經济里的地位，在思想改造时，曾被当作資产阶級思想，狠狠地被批判过一陣，現在平心靜气的想来，我当时的想法不是没有錯誤，錯誤是在輕視了重工業，这是应当批判的。但是所提出关于乡村工業的問題，我依旧覚得值得研究，其中有些地方，我覚得很适合于我們中国具体情况，最近听了关于第二个五年計划的說明，更打动了我的心，这次我重訪江村，我这段衷曲又涌上心头，在百家爭鳴的今天，我有了勇气，再度提出来，誠恳地要求領导上能注意这个問題。"显然，費孝通在这里还想利用"百家爭鳴"来翻案，重新發动反攻，好罢！我們就来透視一下費孝通的"乡土工業"謬論的反动实質吧。看一看它究竟是为那一个阶級服务的，过去把它当作为資产阶級思想而加以狠狠地批判，是不是冤枉了他。

二

为了搞清楚費孝通"乡土工業"謬論的实質，有必要先說明一下他在怎样的历史条件下提出来的。我們知道，封建社会在中国延續了好几千年，近百年来由于帝国主义的侵入，原有腐朽的封建势力在帝国主义支持下，更加深了对中国劳动人民的剝削，因此，土地問題長时期来一直就是中国人民斗爭的中心。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就明显地举起反帝、反封建的大旗，領导农民进行澈底反封建的斗爭。特别在1927年以后，反封建斗爭深入到土地革命阶段，帝国主义、封建統治的基础，逐漸趋于崩潰、灭亡，針对着中国共产党所領导的革命运动，地主阶級的孝子、帝国主义的走狗梁漱溟、晏陽初等，便提出所謂"文化改造"論、农民"愚、貧、病、私"論，認为这是农村一切問題的根源，根本否認土地制度存在什么問題。他們在帝国主义、封建地主阶級、軍閥的支持下，組織了什么"乡村建設研究院"，"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搞所謂"实驗区"，来推行他們的反动理論，以对抗中国共产党領导的土地革命。当然，这种赤裸裸的为反动統治服务的理論和活动，根本不可能得到中国人民的支持。特别在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向中国發动侵略以后，农村經济的崩潰加速了，农民革命斗爭因而有了迅速的發展，这些为虎作倀的"实驗区"也先后垮台了。正是在这种形势下，費孝通为了繼承和挽救梁漱溟、晏陽初等的"事業"，便改换另外一种花样，提出了所謂"为了三万万几千万的农民着想"的"乡土工業"謬論。在他的1935年在美国出版的"中国农民生活"一書中，首先提出了这一問題，以后在解放战爭时期，他又作了詳尽的补充与發揮，成为比較系統的謬論。

現在我們来进一步看一下，費孝通是怎样提出"乡土工業"謬論的？它的内容是什么？

費孝通比梁、晏等更加陰險、隐蔽，他先假惺惺地承認当时中国存在严重的土地問題，广大农民被沉重的地租、捐稅、攤派压得透不过气来，連最低的生活也不能維持。他說："在这里發生了一个很奇怪的現象，就是不耕种的人反而可以有粮食吃，耕种的人却没有飯吃了。"可是，他随后就露出了狐狸尾巴，他把产生这种現象的基本原因歪曲为中国地少人多，是"土地利用的边际已經太低"，大部份土地"不能給人以溫飽以上的报酬"。繼而，他又作了进一步的歪曲。地少人多的現象是早已存在的，那"为什么土地問題到近二、三十年来才是严重呢"？这里他有意欺騙地把原因归之于农村手工業，也就是他所謂的"乡土工業"。他說："中国从来不是个純粹的农業国家，而一

直有着相当發达的工業。可是傳統的工業却并不集中在都市里，而分散在無数的乡村里，……使普遍土地不足的农家可以靠这些家庭工業里的收入，維持小康生活。”由于“西洋都市机器工業的竞爭”，“在过去近一个世紀来，上述傳統有机配合开始破坏了。破坏在那里开始的呢？在我看来，第一个脫栓的齿輪是乡土工業。……跟着乡土工業那一齿輪脫了栓的却是那傳統有机配合所維持的小康生活”。因此，他就得出了“中国土地問題严重性的表面化是由于乡土工業衰弱而引起的”这一替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作掩蔽蒙騙的荒謬的結論，并提出重新恢复和建立“乡土工業”作为解决問題的对策，以便为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加深对中国人民的剝削輔平道路。

那末，費孝通所主張恢复的“乡土工業”的具体內容是什么呢？据他自己在“現代工業技术的下乡”一文中說：“我所謂乡土工業包括下列几个要素：（一）一个农家可以不必放弃他們的农業而参加工作，（二）所以地点是分散在乡村里或乡村附近，（三）这种工業的所有权是屬于参加这工業的农民的，所以应当是合作社性質的，（四）这种工業的原料主要是由农民自己可以供給的，（五）最主要的是这种工業所得到的收益是能最广的分配給农民”。由此費孝通便把他的“乡土工業”說成是一种“合作社”性質的，以現代技术逐步裝配起来的小型輕工業。他大肆宣揚，通过这种“乡土工業”的發展，建立起“工农混合的新社区”，就能“复兴”农村，“提高”农民生活。不仅如此，費孝通竟恬不知耻丧心病狂地說这是实現中国工業化的唯一步驟。以上就是費孝通关于“乡土工業”謬論的基本內容。这种謬論的眞正企圖究竟何在呢？是“为了三万万几千万的农民着想”嗎？当然不是，它完全是一个無耻的欺騙，它完全是那些买办、地主阶級的奴僕在革命新高漲的形势下，妄想挽救他們的主子和他們自己的死亡，对抗人民革命而捏造出来的極其反动的“理論”。

三

現在就以上所提出这一謬論的几个主要之点加以分析批判。

費孝通認为地少人多是中国人民貧困的根本原因。必須指出，費孝通在这里極其露骨的充当了反动透頂的馬尔薩斯人口論的忠实宣傳員。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經典作家們早就依据了丰富的历史事实，澈底給予了駁斥，从而这一反动理論已被公認为是为法西斯發动奴役世界的侵略战爭服务的。的确，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如果因为人口多，生活就一定貧困，那么怎样解釋在旧社会有少数剝削阶級能够过極端荒淫無耻，醉生夢死的生活呢？同时，又怎样解釋新中国成立以后，人口比过去有更为迅速的增加，而人民生活水平又能比解放前有显著的提高呢？据目前估計，我国人口每年增加数額在一千二百万以上，虽然速度是相当高的，但是广大人民生活水平都有了显著的改善。周总理在1957年6月26日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議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在这一方面列举了大量令人信服的事实。周总理說道：“首先，讓我們来看占我們国家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农民的生活狀况。解放以来，我国的农業生产总值是逐年上升的。……随着农業总产值的增長。农民的購买力也大大提高了。1950年全国农民的購买力是八十一亿元，1956年上升到一百九十一亿元，比1950年增加了百分之一百三十六。国家供应給农民的消費資料也随着增加了。1956年比1950年，棉布供应增加了兩倍，膠鞋增加了一点九倍，食鹽增加了將近一倍，糖增加了二点三倍，煤油增加了十一倍，香烟增加了一点四倍，在五万万多的农民中，生产和消費的增長这样大，是旧中国从来沒有过的”。“在旧中国的农村，广大的貧苦农民过着衣不蔽体、食不飽肚、糠菜半年粮的生活，解放后，經过土地改革和合作化运动，目前我国农民大体上有百分之二十到三十过着略有积余的生活；有百分之六十左右过着有吃有穿的生活；有百分之十到十五过着少吃少穿的生活，这一类人还需要国家和农業合作社的帮助。”周总理还說道：“我們再来分析一下占全国人口第二位的职工的生活狀况。……在七年中間，我們解决了約一千三百万人的就業問題，这是旧中国历史上从来沒有过的。1952年全国职工年平均工資是每人四百六十元，1956年提高到六百一十元。在四年中間，提高了將近百分之三十七。这样的工資增長速度，也是旧中国历史上从来沒有过的。”显然，旧中国广大人民貧困的根本原因不在于人多地少，而在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制度，在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資本主义的灭絕人性的統治。还必須指出，費孝通在中国人口問題上开刀，也絕不是偶然的，他这样做除了把中国人民的貧困归罪于客观条件以模糊广大劳动人民的阶級意識而外，还适应了帝国主义的利益。中国人口众多，对帝国主义来講，是一則以喜；一則以憂。喜的是，有大量廉价劳动力可供剝削，是無穷尽利潤的泉源。憂的是，当这一个沉睡的巨人覚醒以后，將發揮出惊天动地的力量，动搖帝国主义的殖民体系。近几十年来，特别在十月革命以后，成立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以来，为数众多的中国人民革命斗爭蓬勃發展，的确使帝国主义憂得寢食不安，它的忠实走狗費孝通之流便在人口問題上大做其文章想替主人解憂，眞可謂“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了，但是历史的巨輪，絕不是这小撮人所能抵住的，他們只是枉費心机。

費孝通的另一个基本論点“土地利用的边际已經太低”，大部份土地“不能給人以溫飽以上的报酬”，不过是依据臭名远揚的“土地报酬遞减規律”引伸而来的，近代資产阶級学者正是运用这一反动理論为工农群众的日益貧困作辯护。馬克思、恩格斯、列宁曾不止一次的批判过它，馬克思列宁主义教导我們，土地收益跟随着生产力的不断發展而不断提高，根本不存在什么“收益遞减規律”。旧中国一般农产品單位面积产量，和其他各国比較起来是比較低的，即使这样，如果没有沉重地租的剝削，农民还是能够維持自己的生活。而且，單位面积产量較低的根本原因，也不在于什么“土地利用的边际已經太低”，只能归罪于封建剝削制度，它限制了土地潜在能力的充分發揮。試問在土地收入有一半以上要以地租、賦稅等形式供献給地主阶級及其国家政权，广大农民生产积極性受到严重的压制的情况下，农業生产怎么可能有迅速的發展呢？新中国成立以后，农村中进行了土地改革，特别是合作化运动的胜利發展，农民生产积極性有了显著提高，广泛开展爱国增产运动，采取兴修水利、改进耕作技术、推广优良品种等等措施，一般农作物的單位面积产量都有不少提高，农業生产有了空前的發展。例如，从 1949 年到 1956 年，水稻产量由九七二，八九四（千市担）上升到一，六四九，五九一（千市担），約增加了 70%，但水稻播种面积只增加了 30%，其主要原因为單位面积产量提高了。目前“如果按播种面积計算（即一亩双季稻按兩亩算），7 年内，增加了88.9斤，已达360斤左右；如果按耕地面积来算（即一亩双季稻仍按一亩算），那么平均产量已达472.3斤了。不要小看了这个数字，从世界范圍来說，水稻每亩 472.3 斤的产量，已名列第五位。超过了美国、印度尼西亞、緬甸、泰国、巴基斯坦、印度和菲列宾。”① 小麦的單位面积产量較水稻为低，但从 1949 年到 1956 年全国“單位面积产量，7年来，也增長了42%，已达到 121.3 斤。”② 如以山东黃县为例，“試看 1936 年，黃县小麦平均亩产仅 150 斤，1955年也只有180斤，1956年就达到263.8斤”。③ 至于棉花，解放后，1949 年單位面积产量为21.6斤，1957 年增加为 38 斤，上升达 76%左右。解放几年来，年年出現丰产新記录。怎么能說我国“土地利用的边际已經太低”呢？即使这样，目前农業生产在提高單位面积产量方面的潜力还是很大的，例如在 1956 年，全国水稻平均每亩产量为 360 斤左右，“而广东潮汕地区却出現了平均單位面积产量一千斤的五个千斤县，福建也出現了三个千斤县，其他各省也出現了不少的千斤乡、千斤社”，④ 这說明一般粮田的生产潜力还可以大大提高。水稻田增产的措施很多，即以單季稻改双季稻一項而言，成績即非常显著。“如 1956 年全国單季稻改双季稻的面积，比 1955 年增加了三，二一六万多亩，相当于解放前双季稻面积的 49.3%；間作稻改連作稻，亦达七〇九万亩，占原有間作稻面积的 50.7%，从而使双季稻的面积，接近于一一，〇〇〇万亩。据估計，这一年由于扩种双季稻而增产的粮食，約占总增产量的四分之一。……在自然条件适宜的地区，單季改双季，間作改連作的增产措施，并不是什么秘密，群众也早有此經驗”，⑤ 又“据調查全国尚有四亿亩耕地可以增加复种”。⑥ 棉花 1956 年平均每亩产量三十五斤，最高产量則达 540 斤，相差十多倍。至于产量在百斤皮棉左右的有三百万亩，在五十斤的有一千七百万亩。如果“第二个五年計划以內，可以爭取全国棉田有一千万亩达到亩产百斤皮棉，那就等于新發展了二千万至三千万亩棉田”。⑦ 中央依据我国耕地面积少，人口众多而土地潜在能力很大的特点，提出提高單位面积产量是当前增加农業生产的主要途徑。在 1956 年到 1967 年全国农業發展綱要（修正草案）中提出，全国粮食产量要求在 1955 年基础上提高一倍以上，分别达到四百斤、五百斤、八百斤；棉花由 1955 年平均每亩三十五斤分别提高到四十斤、六十斤、八十斤和一百斤。全国有些地区現在已經达到了这一指标，全国各个地区的人民群众也都积極爭取提前完成这个宏偉的計划。这許多生动的事实給予了費孝通的謬論以坚决的回击，俗語說：“人定胜天”，中国人民既有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資本主义斗爭到底，取得澈底胜利的勇气，也有战胜大自然的一切困难，爭取以尽可能快的速度来不断發展物質資料生产的决心。

費孝通所說的“乡土工業”是农民增加收入的重要手段，能够維持所謂不飢不寒的小康生活水平，根本是有意顚倒黑白，混淆是非。我們可以从以下二方面进行分析批判：一方面，可以分析一下，“乡土工業”在封建經济中的地位和作用，它是不是农民維持小康生活水平的决定性的因素？我們的答复显然是否定的，我們認为，正是由于殘酷的封建剝削，使得农民不能維持必要的生活水平，因此广大农民才不得不从事副業及家庭手工業的生产。当然，由于从事副業及家庭手工業的經营，增加了一些收入，或多或少地緩和了死亡对于广大农民的威胁。但是，从这里根本不能得出“乡土工業”是农民維持小康生活水

①② 华恕：粮食增产縱横談，粮食 1957 年 10 期。

③ 中国农报評論員：丰产旗帜处处飄，中国农报 1957 年 18 期。

④ 粮食生产年年創造新記录，大公报 1957 年 10 月11日。

⑤ 华恕：粮食生产縱横談，粮食 1957 年 10 期。

⑥ 肖弓：增产潜力之所在，中国农报 1957 年 10 期。

⑦ 程照杆：八年来經济作物生产上的成就，中国农报1957 年 19 期。

平的基本环节，以及近代中国农民生活的更为恶化仅只是由于"乡土工業"破坏的結果的結論。陈伯达同志在近代中国地理概說一書中，所引用的1933年千家駒、韓德章、吳半农在广西郁林县作的調查材料，可以充分說明这一問題。根据該調查材料所列举的二十六戶佃农的收支情况加以分析，如果他們仅只从事农業生产，其所負担的地租剝削則不仅攫取了他們的全部剩余劳动，而且侵占了必要劳动量的百分之二六·七三，加上副業及家庭手工業的收入，地租剝削仍然侵占必要劳动量的百分之十七·六。又根据对七戶佃农兼雇农的調查，他們如果仅只从事农業生产，即使不負担地租，其收入也無法抵偿必需的生产費用与生活費用，加上地租剝削的話，則將侵占必要劳动量的百分之三四，把副業及家庭手工業的收入計算在內，他們負担的地租除了攫取了全部剩余劳动以外，仍然侵占必要劳动的百分之六·九。事实很清楚，封建剝削是农民不能維持必要生活水平的根本原因，而費孝通为了模糊广大农民的斗爭方向，有意識的顚倒事物的因果关系，耍了一个極其恶毒的花招。但是，不管費孝通多么隐蔽、多么狡猾，他的陰謀終究是欺騙不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另一方面，我們还必須进一步分析一下，即使在費孝通所謂的傳統經济（也就是封建經济）时代，"乡土工業"沒有遭破坏，农民能够維持不飢不寒的小康生活水平嗎？事实的答复也是否定的，我們知道，几千年来，封建压迫一直是广大农民身上沉重的枷鎖。由于主要生产資料——土地，掌握在少数貴族、地主手中，农民为了生存不得不忍受高額的地租負担。农民不仅要养活地主、貴族，而且还要供养地主阶級龐大的国家政权組織。关于封建时代的农民生活，古代曾經有过不少人加以描画。如汉代董仲舒曾經說过："耕豪民之田，見稅什伍（顏师古注：下戶貧人，自無田而耕垦富豪家田，十分之中，以五輸本田主也。）故貧民常衣牛馬之衣，食犬彘之食。"①宋代苏洵也說过："富民之家，地大業广，……田之所入，已得其半，耕者得其半。有田者一人，而耕者十人，是以田主日累其半，以至于富强；耕者日食其半，以至于穷餓。"②杜甫的"兵車行"，反映了当时农民由于担任繁重的徭役，以致妻离子散的悲慘狀况。文中曾說："爷娘妻子走相送，塵埃不見咸陽桥。牽衣頓足攔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这种例子不胜枚举，特别是每个朝代的末期，土地兼并現象更是严重，加以天灾人禍，广大农民往往是家破人亡。毛主席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一書中，曾經总結了中国封建社会农民的生活。指出："中国历代的农民，就是在这种封建的經济剝削和封建的政治压迫之下，过着貧穷困苦的奴隶式的生活。农民被束縛于封建制度之下沒有人身的自由，地主对农民有随意打罵甚至处死之权，农民是沒有任何政治权利的。"因此，毛主席指出："迫使农民多次起义，以反抗地主阶級的統治。"，"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級斗爭，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爭，才是历史發展的动力。"历史的事实和費孝通所謂的"不饑不寒的小康的生活"，难道有絲毫相同之处嗎？自从資本主义、帝国主义侵入中国之后，清况發生了变化，但是，变化的并不是封建統治势力的消灭，相反的，它憑借了帝国主义势力更加强了对广大农民的剝削，百分之十左右的地主、富农，不仅依旧榨取高額地租，盤放高利貸，还作为帝国主义在农村收刮原料，推銷商品的工具。农民所負担的其他苛捐什稅，也是有增無已。广大农民無法承受这样严重的剝削，因此农村經济破产現象日益严重，农村中的阶級斗爭也日趋尖銳。中国共产党正是客观地分析了这些情况，指出旧有封建的生产关系已經严重的阻碍了中国社会生产力的發展。必須澈底改变封建土地所有制，才是解决問題的关鍵。我們和費孝通是二种截然不同的結論，費孝通完全是站在地主阶級立場上捏造了事实，歪曲了历史。

既然我們和費孝通对土地問題产生原因的分析是不同的，因而在解决土地問題的道路上也必然是根本对立的。我們認为，几千年来中国农民为爭取土地和自由而作的斗爭，是極其偉大的革命行动。但是由于缺乏先进阶級的領导，这些斗爭都沒有能获得澈底的胜利。中国共产党認眞总結并研究了这些革命斗爭的丰富經驗，并在自己的革命实踐中，进一步运用和發展，使广大农民能在先进的工人阶級領导下取得自己的解放。在第一次国內革命战爭时期，中国共产党即在农村領导了群众性的反封建斗爭。1927年以后，党把农民反封建斗爭更引向了深入，提出土地革命的口号，規定了完整的土地革命路綫。在第二次国內革命战爭时期，革命根据地的土地革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由于封建土地所有制的澈底廢除，广大貧苦农民获得了經济上、政治上的解放，生产和革命积極性迅速高漲，解放区农業生产有了显著發展，农民生活也得到了改善。为了保衛胜利果实，根据地掀起了参加和支援革命战爭的热潮。因而革命战爭的規模日益扩大，革命形势由大革命失敗后的低潮又逐步推向高潮，并为爭取革命在全国的胜利作了必要的准备。相反的，費孝通就怕地主阶級垮台，因此他污蔑"缺乏团結力，缺乏組織，缺乏科学知識"的农民不敢反对破坏乡土工業的帝国主义势力，却选擇力量脆弱得多的，生活不太过于小康水平的地主作为斗爭对象，他一再宣揚恢复和建立"乡土工業"是农民唯一的"福音"。

---

①② 轉引自陈伯达著：近代中国地租概說。

四

为了澈底揭露費孝通的陰謀，現在，我們有必要进一步从以下三方面来分析一下“乡土工業”这一所謂“福音”的反动的阶級实質。

首先，“乡土工業”謬論是維护封建地主阶級的利益和統治，为地主阶級策划的一条新的剝削道路。費孝通在“乡土工業”謬論中，特别假意地强調它的合作性質，他虛伪地把这种由农民自己集資兴办的合作企業，說成是定能符合农民的利益和要求。他一再强調說：“这种工業的所有权是屬于参加这工業的农民的，所以应当是合作社性質的”，“最主要的是这种工業所得到的收益是能最广的分配給农民”。然而，馬克思列宁主义教导我們，合作社經济性質是决定于国家政权性質，决定于占統治地位的生产方式的性質。列宁曾經說过：“無疑义的，在資本主义国家情况下，合作社是集体的資本主义組織。”①只有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單純的合作制發展，就等于社会主义發展。”② 因为小生产时刻自發地在产生資本主义，在資本主义条件下，由小生产者所組織的合作社不可避免地被作为富农、手工業資本家操縱，利用为进行剝削的工具，使这些合作社变成为整个資本主义經济体系中一个組成部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这种农村合作組織，只能为封建地主所支配、控制。費孝通为了蒙蔽广大农民，不过是給这种封建剝削加上了一件美丽的“合作社”外衣。事实也确是这样：被費孝通称为“乡土工業”典范的开弦弓合作絲厂，即为当地地主周宝山、陈杏蓀所壟断。該厂原由农民集資創办，但开工十年，只分过一次微薄的紅利，其他一切农民不能过問。最后，連該厂机器也被周宝山、陈杏蓀等拆散卖掉，这就是这个合作工厂的下場，这件事实已足以說明，由农民集資所創办的合作工厂究竟由誰来作主人，农民呢？还是地主呢？

費孝通还强調指出，“乡土工業”必須建立在乡村里或乡村附近，以便农民能不放弃农業而参加工業。从表面上看起来，这样就給农民增加了就業机会，从而增加收入。事实怎样呢？費孝通主張乡土工業分散在乡村里的主要目的之一是在充分利用农村賤价劳动力，使剝削阶級能把工資远远压低在劳动力价值之下，从而获得更大的利潤。为了証明这一点，且看費孝通的自白，他說：“乡土工業在經济上的优点却有都市工業所不易得到的。最主要的在我看来，是乡村工業中工資較低，維持同样的生活程度，乡村中所需的費用較都市便宜。”他曾經研究了云南玉溪的織布業，指出“乡民向布庄領取原料織成布匹后交回布庄，所得的工資，經我們的計算，竟低于劳动者个人所需要的食粮。”但是当地农民仍然要做，他認为：“一方面这是說生产机会的狹小，使她們沒有其他选擇，另一方面是說在这情况下，农業正津貼工業。”“农業正津貼工業”，这一下費孝通的原形畢露了，使人一望即知复兴“乡土工業”，究竟是对农民有利呢？还是对剝削阶級有利？在这里，他还恬不知耻地介紹了日本地主資产阶級發財致富的經驗。他指出：日本工業所以能和西洋工業相竞爭，也正是因为設法降低产品成本中的工資因素这一点；另一方面，乡土工業分散在广大农村里，还可以充分利用农村廉价的原料。中国农民在長期劳动实踐中积累了極为丰富的生产經驗，他們除了以經营农業生产为主外，还具有多种經营的历史傳統。正如費孝通所說：“其实每个小区域，甚至許多村子都有一二样附近知名的土产，土产中又有很多是制造品。”按照他的意見，剝削阶級对这些都应該加以利用，以便扩大其剝削面。“乡土工業”能够使广大农民生活得到改善和提高嗎？上面的分析已完全为我們作了否定的答案。那末，“乡土工業”謬論的作用是什么呢？它不仅是开辟了封建地主阶級一条新的剝削道路，同时，还充当了欺騙农民，引誘农民脫离党所領导的革命斗爭的一顆糖衣炮彈！

其次，費孝通的“乡土工業”謬論，是企圖以資产阶級改良主义路綫来对抗中国共产党所領导的澈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路綫。費孝通打着为“国家”着想的幌子，借口反对“內战”，来反对人民革命运动。他一再强調旧中国要通过和平道路，进行社会改革。他說：“我的立場是想在和平方式中去解决这無法拖延的基本問題，所以特别願意强調和平解决所必需的条件。”他为地主阶級出謀划策并苦口婆心的劝地主阶級說：“这些市民应当覺悟，世界已經改变，依賴特权的收入終究是不可靠的，等人家来逼你放弃，还不如先找到其他合理的收入，自动放弃来得便宜，中国是否可以像英国一般不必經过革命，而得到社会进步主要的决定因素，就在这种人有沒有决心。”費孝通这里所謂通过和平方式取得社会进步，就是他所幻想的通过“乡土工業”的發展来实现中国的工業化。的确，实现国家工業化，永远摆脫貧困落后狀态，是全中国人民的迫切願望。可是究竟这条“由土地里長出乡土工業，在乡土工業里長出民族工業”的道路，能不能实现呢？事实是最好的回答，我們且回顧一下旧中国民族工業的發展历史罢！十九世紀中叶，中国开始出現新式的民族工業，但是在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官僚資本，特别是帝国主义在华工業的压制下，始終不能得到正常的發展。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間，由于帝国主义忙于战爭，暫时放松了对中国的侵略，中国民族工業出現了曇花一現的黃金时代，在輕工業方面有了較大的發展，可是帝国主义在战爭結

①② 列宁：論合作制。

来后馬上又繼續加强了它对中国的侵略和压榨，并且它們在华的工業逐漸形成了一种壟断势力，从此民族工業就長期地处在停滯的狀态。此外，帝国主义还控制了中国的金融、交通运輸等事業，民族工業簡直無法与之抗衡。1927 年国民党劫夺了政权以后，憑藉着反动政权逐漸成長起来的四大家族官僚資本，又在民族工業头上加上了一座新的大山。即使在抗日战爭时期，因为四大家族官僚資本的膨脹，蔣管区的民族工業也并沒有能改变自己悲慘的命运，抗日战爭胜利后，蔣管区日益發展成为美帝国主义的殖民地，美帝国主义和四大家族几乎壟断了一切的生产部門，控制了原料及銷售市場，再加上恶性的通貨膨脹的影响，民族工業已处于奄奄一息的狀态。这就是通过和平方式發展民族工業的悲慘的失敗的簡單历史。理由很簡單，正如毛主席所說："帝国主义列强侵入中国的目的，决不是要把封建的中国变成資本主义的中国。帝国主义列强的目的和这相反，它們是要把中国变成它們的半殖民地和殖民地。"① 我們認为，中国人民只有以革命的手段，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資本主义的联合統治，才能实現国家工業化的理想。毛主席在"論联合政府"一書中，曾經指出："解放中国人民的生产力，使之获得充分發展的可能性，有待于新民主主义政治条件在全国境内的实現。""就整个說来，沒有一个独立、自由、民主和統一的中国，不可能發展工業。"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就把領导全国人民进行澈底反帝、反封建革命斗爭的任务担当了起来。經过二次国内革命战爭以及抗日战爭，革命力量有了巨大的發展，爭取最后胜利已經具备了足够的条件，全国人民正在欢欣鼓舞的迎接着革命胜利的来临。就在这个时候，費孝通竟还甘冒天下之大不諱大肆宣揚他的和平方式"，宣揚資产級阶改良主义政治路綫，其居心何在，不言可喻。他这种行动不是有意的来破坏革命，以达到長期維持反动統治的目的，是什么呢?!

最后，費孝通的"乡土工業"謬論还具有極其濃厚的买办性，是为帝国主义利益服务的，費孝通在提出他的国家工業化的道路的时候，要求"和西洋工業相竞爭"，表面看来似乎是为了中华民族的利益，可是究竟問題的实質是怎样呢?讓我們来进一步分析一下。費孝通所主張大力發展的"乡土工業"，指的是一种小型的、手工与机器相結合的輕工業。他反对建立国家的重工業，他曾經說过："中国在經济建設中如果利用政府收税的力量，积蓄了財富，投資于一时不易在生活上見效的重工業里，在相当長的时期中很可能遭遇到类似苏联早年所碰着的困难。要广大的农民明了吃不得，穿不着，换不到，看不見的重工業的重要性是一件極繁重的教育工作，不是輕而易举的。"在这里，費孝通是用了歪曲和污蔑苏联实行工業化的历史經驗的卑鄙手法，企圖阻撓中国走上工業化的正确道路，其用心可謂陰毒險恶之極。讓我們再看一下，按照費孝通所指出的那条道路，能不能实現他自己所謂的"对外迎战"呢?我們知道，重工業特别是机器制造業，是工業化的基础和核心。沒有自己的重工業，就無法巩固国防，也無法取得眞正經济上的独立，也就是說要永远处于挨打的地位。旧中国近一百年的历史，不是最現实的教訓嗎?事实上，帝国主义并不反对，也無法反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有某些小型輕工業的存在。相反的，帝国主义为了进一步加强对中国农村的掠夺，为了更好的搜刮农村原料和土特产，还需要建立一些小型的农产品加工工業以及恢复某些家庭手工業，来为它們服务。由此可見，費孝通恢复"乡土工業"的主張，正是适应了帝国主义的要求，成为帝国主义进一步扩大侵略中国的尖兵，費孝通自己也明白的表示了这种願望，他說："在我訪問英国时曾見过他們全国消費合作总社的朋友，交談之下，他甚至向我建議，中国这类生产合作社如果發达到一定程度，他們消費合作总社極願意發生关系，……这話虽則現在說来还是太早，但是这种可能性是值得注意的。"利用中国的廉价原料，廉价劳动力为帝国主义服务，这算是"向外迎战"？还是"向外投降"？另一方面，帝国主义要剝削中国人民，必須扶植国内的封建势力作为控制中国农村的工具。費孝通"乡土工業"謬論要求地主阶級逐漸轉化为資产阶級，繼續維持其統治，这也就是企圖使帝国主义在中国农村中的支柱加强，这对帝国主义当然是有益無損的。相反地我們認为，要"对外迎战"，首先在于以革命手段澈底摧毀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势力，然后在人民政权領导下，逐步实現国家工業化，才能保証中华民族的眞正独立。費孝通則不过是以"向外迎战"的招牌来掩飾他的出卖祖国的买办洋奴的丑恶面目而已。

五

从以上的分析中，我們可以很清楚的看到費孝通"乡土工業"謬論的反动实質，它集中反映了帝国主义、封建势力企圖进一步統治中国人民的願望。难道象这种买办的、封建的反动謬論，仅仅是犯了"輕視重工業"的錯誤嗎?把它当作为"資产阶級思想"狠狠地批判一下，难道冤枉了費孝通嗎?即使"現在平心静气的想来"，回答也只能是否定的。事实証明，过去的批判还沒有能充分揭露这一謬論的反动实質，还不够狠，所以費孝通現在又利用听

(下轉第 19 頁)

① 毛澤东：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

其他未加注的引語都是引自費孝通著"乡土重建"一書。

駁斥厉德寅等反对学習苏联反对学習中国人民大学的謬論

楊国璋　桂世祚　陈善林
柴作揖　邱　淵　葛霖生

一

学習苏联是我国建設社会主义坚定不移的方針。这个方針应当在我国一切建設事業中得到貫徹，对文化教育事業来說，特别是对高等学校中社会科学的教学工作和科学研究来說，也决不能是例外。大家知道，社会科学具有强烈的阶級性和党性。为要把我国建設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毫無疑問必須發展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社会科学，并以此来教育国家建設工作的干部。因此，对社会科学来說，学習苏联就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几年来，在社会科学的教学和科学研究方面，我們已經貫徹了这一正确方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高等教育部就提出了学習苏联的任务。接着，又創办了以苏联高等学校为榜样的中国人民大学，作为全国高等学校在社会科学方面学習苏联的先导。1952年以后，又在院系調整、專業設置的基础上，普遍展开了学習苏联先进經驗进行教学改革的工作。可以肯定地說，由于我們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工作，我国社会科学方面的教学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已經起了根本的变化。在高等学校中，教学改革工作已經取得了巨大的成績，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社会科学已經确立了它的領导地位。这些都說明了我們几年来在社会科学的教学工作上坚持向苏联学習的方針是完全正确的，并且也是正确地被执行了的。

由于中国共产党正确地执行了团結教育改造知識份子的政策，所以絕大部份教师都願意团結在党的周圍，并积極地向苏联学習。在学習苏联的过程中，大家都深刻体会到馬列主义社会科学和苏联先进的高等教育工作的無可比拟的优越性，从而更加清楚地認識到資产阶級社会科学的腐朽性和旧高等教育为反动統治服务的本質。为了更好地学習苏联在科学上和教学工作上的先进經驗，許多教师几年来坚持不懈地学習俄文。今天不少教师已經掌握了閱讀俄文書籍的能力，开始直接吸收苏联科学上和教学工作上最新的成就。

但是，在高等学校中也还有少数右派份子别有用心，坚持反对学習苏联。由于他們反对向苏联学習，他們当然也反对向中国人民大学学習。在去年五六月間，这些右派份子公然和社会上的資产阶級右派相互配合、相互呼应向社会主义和党的領导进行了猖狂的进攻。他們利用各种机会从各个方面来誣蔑苏联先进的社会科学和教学工作。他們的目的显然是企圖借此使資产阶級的社会科学复辟，重新占据高等学校的講台来毒害青年，为資本主义制度的全面复辟鋪平道路。

在我們上海財經学院中，去年五六月份党委所召开的几次座談会上，一些右派份子也發出了不少荒謬言論。到目前为止，在深入徹底进行反右派斗爭的过程中，这些右派份子都已經一个个地被揪了出来。为了徹底打垮右派的复辟陰謀，我們必須对这些謬論坚决加以駁斥。右派份子們在反对学習苏联学習中国人民大学上是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攻击的：（1）反对学習馬列主义的社会科学，并企圖复辟資产阶級的社会科学；（2）反对我們根据苏联先进經驗所制訂的教学計划；（3）反对我們采用苏联和中国人民大学的教材；（4）对誠心誠意向苏联学習的广大的国家工作干部进行誣蔑。以下我們对这些謬論逐一加以駁斥。

二

右派份子反对学習馬列主义的社会科学，企圖复辟資产阶級的社会科学。

在去年六月份我院党委所召开的一次座談会上，統計系的右派份子厉德寅發表了一系列的謬論。厉德寅說："財經科学在学習苏联和教学改革上有些犯了割断历史，粉碎傳統的偏差作風。……几年来，有些教条主义者和一些宗派主义者借学習苏联和教学改革的名义，或者其他名义对我国原有的傳統的政治学、經济学、社会学、法律学和統計学以及这些科学的專家学者完全否定了。他們没有根据政策方針的精神办事，完全从主观願望出發，定了自以为是的标准。凡不合乎这个标准的一概不要，也不加以审察，也不再过問，这种割断历史、粉碎傳統

的做法是違背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点的，亦是脫离实际的。”厉德寅的这些話尽管是很隐蔽的，却是非常恶毒的。从表面上看，似乎他并不反对学習苏联，而只是說我們不应該粉碎历史傳統，在他看来，这样做是錯誤的。从这里可以看出厉德寅把学習苏联和繼承社会科学的历史傳統完全对立起来，正是在这一点上暴露了他的眞正目的。厉德寅实質上是企圖在保衛他的所謂历史傳統的幌子下反对学習苏联的社会科学，以圖实現其复辟資产阶級社会科学的陰謀活动。

我們坚决反对厉德寅說我們“在学習苏联和教学改革上犯了割断历史粉碎傳統”的謬論。我們認为几年来我們对資产阶級社会科学采取了从根本上加以否定的态度是完全正确的，也是完全必要的。和我們大家相反，厉德寅却要保衛他的所謂历史傳統。很明显，厉德寅所謂的历史傳統与社会科学的眞正历史傳統毫不相干。就社会科学而言，自十九世紀中叶开始，只有一个眞正的科学傳統，那就是馬克思列宁主义社会科学的傳統。厉德寅的所謂历史傳統則完全是另一回事，有他自己的特殊解釋。厉德寅所謂的傳統，就是不久以前蔣介石統治时期所流行的学术傳統，也就是由資本主义国家販来的所謂現代的社会科学。由此可見，厉德寅所要保衛的傳統乃是資产阶級社会科学的傳統，而保衛这个傳統也就是反对学習馬列主义社会科学的傳統。

事实上，資产阶級究竟有没有眞正的社会科学呢？这个問題在历史上早就有了結論。当資产阶級还在上升的时期，資产阶級在社会現象的研究方面是有过一定貢献的。但即使資产阶級在这个上升的时期，也由于剝削阶級狹隘利益的限制，而没有能够建立起眞正的社会科学。到了壟断資本主义时期，資产阶級的社会科学就墮落为專門制造謊言，以維护資本主义剝削制度的反动的假科学。資产阶級右派所要恢复的，也就是厉德寅所謂傳統的，主要还不是上升时期的資产阶級社会科学，而是壟断資本主义时期的社会科学。这种資产阶級反动的社会科学是資本主义制度的上層建筑，是为資产阶級的利益服务的。这种反动的假科学和我們的社会主义制度是根本不可調和的。因此，对我們来說，我們必須粉碎这个傳統，并且要把它粉碎得越徹底越好，不能有絲毫的留恋。粉碎了这个反动的傳統，才能进一步巩固馬列主义的社会科学在我国已經取得的統治地位，并以馬列主义的社会科学作为国家工作的理論基础，来指导我們国家的各項工作。

应当指出，厉德寅特别反对学習馬列主义統計学，并企圖恢复資产阶級統計学。厉德寅在他的發言中曾經說：“数理統計学自1951年被“数学游戏”的大帽子压着起，如今七年了，……科学的研究發展中断了七年，这不能不說是中国統計学方面的一个不小的損失。”这里，厉德寅是有意把統計学和数理統計学混淆在一起，他企圖以数理統計学来頂替統計学，这是我們絕对不能同意的。統計学是一門独立的社会科学，而数理統計学則是数学的一个分支，它們屬于不同的科学部門，有着不同的研究对象和不同的科学基础。資产阶級的社会科学，如上面所指出，在壟断資本主义时期，已逐漸变为騙人的假科学。这种趋向表現在統計学上，就是以数理統計学来頂替作为社会科学的統計学，以粉飾資本主义制度的腐朽和矛盾。因此，資产阶級統計学是一門欺騙人民和粉飾資本主义面貌的假科学。厉德寅所要保衛的中国原有的統計学的傳統，也就是这个資产阶級統計学的傳統。資产阶級統計学对我們社会主义国家来說，是根本没有一点用处的。依靠这个反动的假科学，我們將不可能实行国民經济的計划管理。社会主义的国家只能向苏联学習为馬列主义所武裝起来的統計学，才能建立科学的統計工作，才能正确地制訂計划和决定政策。

从上面，可以看出我們的立場和厉德寅的立場之間的根本区别。我們認为資产阶級社会科学的傳統是非加以徹底粉碎不可的，而厉德寅却偏要千方百計来保衛这个傳統。我們認为粉碎这个傳統是一种正确的措施，是符合社会主义的利益的，而厉德寅却把正确的措施看成“偏差作風”。我們認为这样做是符合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点的，而厉德寅却說我們“違背了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点”。我們認为这样做是符合中国建設的实际需要的，而厉德寅却認为“脫离实际”。厉德寅反对学習苏联的态度是这样的坚决，不是由于他根本站在反动立場上，坚决反对社会主义，又是由于什么呢？

大家知道，資产阶級右派企圖复辟資产阶級社会科学的陰謀，是在章罗联盟所提出的反社会主义科学綱領中集中地透露出来的。与此同时，資产阶級右派在各个科学部門在各个地方进行了一系列的宣傳工作和組織活动。譬如說，已經揭發的右派分子陈振汉等的反动經济学綱領的目的就是要推翻馬列主义在經济科学領域中的思想領导，使資产阶級經济学的統治复辟。另一个已揭發的右派分子林和成則企圖使資产阶級統計学复辟，并陰謀进一步篡夺統計工作的領导权。在这一点上，可以这样說，厉德寅的野心比其他右派份子更大，其反动立場也更坚定。厉德寅不仅要恢复資产阶級的統計学，而且他企圖要使所有的資产阶級社会科学包括資产阶級政治学、經济学、社会学和法律学等等統統复辟。这里說明了厉德寅的謬論决不是思想問題和学术問題，而是資产阶級右派的整个政治陰謀的一个組成部分。这个陰謀的目的

就是要实現資产阶級社会科学的全面复辟，为恢复資本主义制度的血腥統治創造条件。

三

右派份子反对我們根据苏联高等学校的先进經驗所制訂的教学計划。

右派份子厉德寅在我院教师座談会的發言中有相当大的一部份是对教学計划的攻击，照他所說，我們的教学計划完全搞糟了。厉德寅誣蔑說："1952年时因为要学習苏联，把財經学院各系(包括統計系)的原有課程完全廢除了，同时把数理統計和工業产品品質的統計等課說成脫离实际的数学游戏，亦廢除了。……可是不到二年，高教部又說是根据苏联經驗要財經学院各系学生都要修讀数学課程一年……。"他認为这是"朝令夕改的現象"。他还硬說："数理統計学自1951年被数学游戏的大帽子压着起，如今七年了，…… 科学的研究發展中断了七年……。"

我們坚决反对厉德寅的这些歪曲和誣蔑。我們要指出，在教学計划方面，学習苏联先进經驗，結合我国具体情况，稳步前进地修訂教学計划是完全正确的。教学計划关系到培养人材的政治質量和業务水平。培养社会主义建設者的教学計划必須是社会主义教育的教学計划。这样的教学計划，只有向建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苏联，才能学習到。右派份子要破坏我們走社会主义的道路，看到我們根据苏联的經驗来制訂計划，当然是不会贊成的，因此他們就無中生有地进行恶毒的誣蔑。

厉德寅所說在1952年院系調整时，把旧有的統計課程全部廢除，完全与事实不符。实际上，教学改革的工作在全国解放后早已进行了，極端反动的課程早已廢除，迫切需要的課程也早已設立。到了1952年，只是根据較全面的苏联經驗更徹底地进行一次較大的改革而已。在院系調整以前，所开設的合用的新的課程，在院系調整以后的新教学計划中都肯定了下来。除开一些政治課不說，就是有些專業課也有保存下来的。另外有些課程当时确是廢除了，有些是因为課程內容包含資本主义毒素太多，或內容空洞，有些是从培养目标来考虑的。总之，并没有像厉德寅所說的什么全部廢除。

厉德寅有意歪曲地把当时不开設数理統計的原因說成是有人用数学游戏的大帽子在压数理統計，也完全不符事实。在此，我們必須指出：厉德寅这种說法实在是别有用心。他有意地把几件本質不同的事硬拉在一起以圖混淆視听，从而达到他的以数理統計学頂替社会經济統計学的陰謀。

苏联和我国統計学者所批判的"数学游戏"是什么呢？簡單地說，数学游戏就是純粹以数学方法代替經济分析。我們所批判的是以数理統計方法頂替社会經济統計主要內容的資产阶級統計学。我們从来没有說数学或其分支数理統計等科学本身是什么数学游戏。当时教学計划中所以少开这几門課程的眞正原因是为了适应国家建設的需要和学習年限的縮短。厉德寅不会不記得，在院系調整前后的一段时期，当时学生的学習年限是三年。在实行三年制的条件下，当然应当首先保証学生对于基本課程的学習时間，这就必須取消一些輔助的課程，又有什么不对呢？到恢复四年制时，首先增开了数学課程，也当然是正确的。这是随着發展情况的必要措施，而不是什么朝令夕改。

由此可見，高教部对于教学計划的修訂工作，一貫是适应需要，稳步前进的。实际上，各次的修訂，都是一方面根据苏联先进經驗，一方面从我国經济工作發展情况和学制演进的需要来着手的。在我們学校中，过去对教学計划的某些改变，也都是根据上列原則和学校的具体情况，經过有关教师的反复討論，才决定的。右派份子厉德寅对这些情况不是不知道，而是有意的歪曲事实。这种欺騙手法無論如何是騙不了人的。

四

右派份子都不遺余力地反对采用苏联和中国人民大学的教材。

右派份子厉德寅就是如此。照他的說法，我們采用苏联和中国人民大学的教材，就是教条主义。为了克服教条主义，那就只好停止向苏联学習，而去向資本主义国家学習了。这就是厉德寅所要达到的目的。厉德寅假借其他教师們的口吻說："教师們願意学習苏联先进科学技术，但他們对于生吞活剝的全部搬来是有意見的。过去的作法就是要他們完全依据苏联專家廖佐夫在中国人民大学所写的講义来編講义来講課，弄得許多教师們……变成了"留声机器""陈年唱片"。从这里可以看出厉德寅反对学習苏联、反对学習中国人民大学是何等的坚决。

应当指出厉德寅的这些謬論和我院已揭發的另一个右派分子王士章的謬論有許多相同之处。王士章这个右派分子曾誣蔑說："苏联文化科学水平不高，只有普及而没有提高，学者是販卖教条，缺少独立思考。学术上的根本毛病是教条主义和权威思想。"他又說："苏联人写的文章都空洞無物，只是把几句話搬来搬去，十足教条主义。"为了反对学習苏联，王士章还进一步反对学習俄文。他說："学習什么外国文都有用，包括最小的国家在內，只有学習俄文没有用，因为俄文書中没有一本是有价值的。"这里，厉德寅的所謂"留声机器""陈年唱片"不是

和王士章的所謂"把几句話搬来搬去"完全一样嗎？除厉德寅和王士章之外，我院还有貿易系右派分子徐曰琨和統計系右派分子陈啓运也發表过类似的謬論。徐曰琨曾誣蔑說："目前大家所看到的东西都是一样的，都是苏联的东西和中国人民大学的講义。我們今天的教材都是搬苏联与中国人民大学的，是何道理？"陈啓运誣蔑說："过分相信中国人民大学，造成教条主义販卖，中国人民大学講义天經地义。我院教員有兩个类型：一为無判断力，照抄；一为怕負責任，照本宣讀。"他更惡毒地罵誠心誠意向中国人民大学学習的同志是"男盜女娼"。一句話，他們都有坚定的反动立場，借口反对教条主义来反对学習苏联、学習中国人民大学的。

我們的看法和厉德寅等完全相反。我們認为学習苏联是完全正确的，也是完全必要的。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它在建設社会主义的各个方面，有着極其丰富的、宝貴的經驗，值得我們来学習。我們国家既然是要走社会主义的道路，那么不向苏联学習，还向誰学習呢？事实上苏联四十年来文化科学事業早已大大超过資本主义国家。苏联最先把原子能利用于和平建設事業，最近苏联發射了第一个洲际彈道导彈，接着又成功地發射了第一个和第二个人造地球衛星，这更加充分証明了苏联在科学和技术上的卓越成就。至于社会科学，那就更不必說了。社会科学是研究社会發展規律的、并为一定的阶級进行阶級斗爭而服务的科学。由于苏联是第一个無产阶級革命取得徹底胜利的国家，它有着最丰富的阶級斗爭的經驗。因此，馬列主义在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設中获得了巨大的發展。这样看来，苏联的社会科学当然也是最先进的，值得我們好好学習。在第一个五年計划剛开始的时候，毛主席就号召全国人民誠心誠意向苏联学習。毛主席說："我們要进行偉大的国家建設，我們面前的工作是艰苦的，我們的經驗是不够的，因此，要認眞学習苏联的先进經驗。無論共产党內、共产党外、老干部、新干部、技术人員、知識份子、以及工人群众和农民群众，都必須誠心誠意地向苏联学習。我們不仅要学習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論，而且要学習苏联先进的科学技术。我們要在全国范圍內掀起学習苏联的高潮，来建設我們的国家。"今天我国的第一个五年計划已經胜利完成了，而且在不少的方面超額完成。我国的經济面貌已經大大改变，这是和我們向苏联学習分不开的。对我們高等学校的教师来說，也同样只有遵照毛主席的英明指示，才能找出正确的道路。事实上，高等学校在采用苏联教材上，所取得的成績是很大的。根据高等教育部的統計，自从1952年开始到1956年底，在我国共出版了苏联高等学校教材譯本达一千三百九十三种之多。

同样，我們認为学習中国人民大学也是完全正确和完全必要的。我国創办中国人民大学的目的与任务，本是为了創办一个以苏联高等学校为榜样的适合于中国建設需要的社会主义性質的大学，以便正确而有效地学習苏联先进的科学技术与社会主义建設的經驗以及苏联高等教育建設的理論与实踐，因此学習中国人民大学正是为了学習苏联。我院几年来已經陆續派遣了一百多位教师到中国人民大学进修，这对教学質量的提高和师資的培养，都起了很大的作用。

在学習苏联教学經驗时，我們走的是通过中国人民大学来学習苏联的途徑。这在当时来說是絕对必要的。因为中国人民大学在財經課程方面最早得到苏联專家的指导，在学習苏联方面，比我們其他学校先走一步。中国人民大学在学習苏联方面积累了很多的宝貴經驗，如編写教学大綱和教材，就分别了課程的类型，有步驟地把苏联先进經驗和中国实际情况逐步結合起来，其中如統計学、会計学等則在苏联和我国所教的內容应当基本上相同。因此結合的步驟是：先按苏联教学大綱講授，适当加些中国材料，經过一定的准备期間，再把更多的实际材料提升为理論。加到教材中去。这种作法是符合逐步把苏联先进經驗与我国实际情况相結合的原則的。就我院的情来况說，最迟到了1956年已經普遍使用自編的教材了。

当然，我們在学習苏联学習中国人民大学的过程中，也不是沒有缺点的，但必須肯定成績是基本的是主要的。我們不同意厉德寅等把学習苏联学習中国人民大学描写得一团糟的說法。我們向苏联学習基本上是結合中国的实际需要的，我們从来沒有生吞活剝地学習苏联，因此厉德寅所說"教师們对生吞活剝的全部搬来有意見"这一点，根本不是事实。我院許多教研組从1953年起，就开始編写自己的講义，因此也并不象右派分子所說的把中国人民大学講义当作"天經地义"。只有厉德寅等这一小撮人，由于他們反对社会主义，想把过去中国資本主义教材重新搬上講台，才惡毒地否定了教师們的辛勤劳动，把他們的教課比作"留声机器""陈年唱片"。厉德寅等的这些謬論，不仅誣蔑了我們学習苏联的正确方針，也是对广大教师的一种侮辱。我們要正告他們，向苏联学習向中国人民大学学習的正确方針是絕对不能改变的。广大的教师們要在党的領导下，繼續向苏联学習向中国人民大学学習。

五

右派份子还对誠心誠意向苏联学習的广大的国家工作干部进行了無耻的誣蔑和謾罵。

右派份子陈振汉等是用过这种手法的，他們說財經

領导同志不懂得客观經济規律，連通貨膨脹会引起物价上漲的"經济常識"都不懂得。厉德寅这个右派份子則恶毒地說"中国国家統計局二千工作人員中沒有一个人懂得統計常識。"这一無耻的謊話必須徹底地加以揭穿。

我国国家統計局自1952年底成立以来，經过全体統計工作干部的共同努力，已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这些成就是：在全国范圍內自上而下地建立了統計机構，培养了大批干部，系統地建立了完整的科学的統計核算制度和报表制度，通过各种調查取得了国民經济各方面的大量的、丰富的統計資料，經常地进行了国民經济計划执行情况的檢查，提出了不少專題性的和綜合性的分析报告。我們要問厉德寅，沒有統計常識的人能做出这样大的成績嗎？

为什么厉德寅要对广大的統計工作者进行誣蔑呢，这是不难理解的。广大的統計工作者都誠心誠意向苏联学習，这是厉德寅所坚决反对的，所以他就从反对苏联出發，对广大的統計工作者进行無耻的誣蔑和謾罵，說沒有一个人懂得統計常識。

事实上，厉德寅的目的还不止于此，他还有进一步的陰謀，这一点也是非常明显的。他說国家統計局工作人員沒有統計常識，那末就非請教那些右派先生們不可了。这样一来，他們就可以从复辟資产阶級統計学，轉到篡改我国統計工作的方向，从而篡夺我国統計工作的領导权。他們的野心还不是明明白白的嗎？我們要正告厉德寅等，这仅仅是他們一小撮人的夢想。广大的統計学研究者不同意这种謬論。我們認为全国統計工作的成績是巨大的，我們都願意坚决团結在共产党的周圍，坚决抛弃資产阶級統計学，学好馬列主义統計学，在社会主义事業中發揮我們的作用。

从上面所駁斥的內容中，可以看出右派份子厉德寅的反动政治立場是極其坚决的。还应当指出，他的反动政治立場也有其長远的历史。厉德寅在蔣匪叛变革命屠杀人民的时候投靠匪帮。出洋留学也是国民党的特别名額和經費，回国后又为四大家族处处献策求荣。在抗日战爭紧急关头曾写过鼓吹"东方慕尼黑会議"的卖国文章。解放前夕成了身居高位的搜括民脂民膏的得力帮凶。解放后虽然在几次运动中受到了教育，但可以看出他的反动立場却絲毫沒有改变。他这次的大放謬論，絕非偶然。实际上，他处心积虑已久，一旦認为有机可乘，于是大放厥辞，陰謀复辟資产阶級的社会科学。

除厉德寅以外，王士章、徐日琨、陈啓运等几个右派份子，都是同样坚决反对学習苏联、反对学習中国人民大学的。他們都企圖复辟資产阶級的社会科学和資产阶級的教学制度。他們都不願意走社会主义的道路，而坚决要走資本主义的道路。

非常明显，右派份子厉德寅等的謬論不是什么思想問題，更不是学术問題，而是極其严重的政治問題。

为了保衛社会主义，为了保衛馬列主义的社会科学，我們每一个从事社会科学教学工作和研究工作的人，必須勇敢地站起来，坚决地加以揭發和駁斥，徹底粉碎这些右派謬論。我們要正告厉德寅等，你們只有深入檢查自己的錯誤，低头認罪，痛改前非，才有重新做人的出路。如果坚持自己的錯誤主張，終將自絕于人民。

我們相信，經过这次对于右派言論徹底的揭發和駁斥以后，馬列主义的社会科学將更加壯大起来，我們將在社会科学領域中作出更大的成績。讓我們高举馬列主义的旗帜为社会科学的更大發展，为建設社会主义取得更大的胜利而战斗吧！

財經研究（双月刊）

（自1958年起每逢双月15日出版）

16开本60面　每册定价0.40元

本刊是学术性刊物，主要內容有：①貫徹理論結合实际方針，反映我国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設中重大問題的論著；②各門財經学科中基本理論問題的研究成果；③右派言論、修正主义、資产阶級財經学术思想的批判；④貫徹百家爭鳴精神，特辟討論欄展开学术爭論；⑤財經学科中国化教材的系統講座，本年第四期起發表政治經济学中国化教材社会主义部分的講座；⑥調查研究成果、有关經济資料、業务部門專題报告及学术动态等。主要讀者对象是財經院校师生及一般財經干部。

上海財經学院"財經研究"編委会編

駁斥厉德寅复辟資产阶級統計学的讕言

肖　車

根据右派份子厉德寅在鳴放时間对党所提的意見来看，既不是一个思想問題，也不是一个学术研究問題，而是一个政治問題。他企圖趁我們党整風运动中，复辟資产阶級一套反动的統計理論，否定我国統計工作中学習苏联的必要性与学習苏联的偉大成就，进一步企圖推翻我党对統計工作的領导。一句話，是为企圖推翻我党的領导事業，推翻我国的社会主义的建設事業，以恢复資本主义在我国的罪恶統治扫清道路。这是一个大是大非的問題，我們統計工作者一定要同他把問題說清楚，而且要右派分子厉德寅在这个問題上徹底交代自己的罪恶勾当与目的。

一、应不应該否定資产阶級統計学？

在这个問題上我們与厉德寅有根本不同的看法：

厉德寅說"有些教条主义者借学習苏联和教学改革的名义，或者其他名义（？）对我国原有的傳統的政治学……統計学以及这些科学的專家学者，完全否定了"。厉德寅說这是一种"割断历史粉碎傳統"的做法。是"違背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点的"，亦是"脫离实际的"。厉德寅說我們在"不破不立"的掩盖下，把中国原有的統計学全盤否定了、把中国原有的統計專家学者亦采取了全盤否定的态度，他們的学識、經驗和研究方法亦曾一度不值得重視了。

从上面这一段話中，我們不难看出，厉德寅一方面反对我国否定資产阶級統計学，公开企圖恢复"旧統計学"的傳統。另一方面它却用了最毒辣的手法，来离間我們党与政府同許多專家学者的关系，破坏党与高級知識份子間的团結。

資产阶級統計学应不应否定？应該否定。这是肯定的。因为資产阶級統計学是單純建立在数理統計基础上的統計学，資产阶級統計学者，根据一些資产阶級庸俗的經济理論来規定一些指标体系与分組方法，对各种社会現象，抹杀阶級社会內阶級存在的客观事实，以及社会現象复杂因素，單純利用数学上的几个抽象公式，求得几个簡單的統計数字，它既不能說明社会經济現象的本質，相反地却利用数字来掩盖資本主义社会剝削的本質，掩盖資本主义社会內在的阶級矛盾，这种統計学，即使在資本主义社会里，已成为資产阶級剝削与統治的工具和帮凶。在我們这样一个社会主义社会的国家里，有何存在的必要呢？当然，从單純的数理統計上来說，数理統計作为方法来說，对于社会經济統計还有一定的用处，因为任何一个統計工作者，对社会經济的研究分析，是用数字来表現的，因此数学与数理統計对于社会主义統計有一定的作用，国家統計局也在号召全国統計工作者，虛心学習，批判地掌握这一方面的知識。但这絕不是說，我国的社会經济統計就应該建立在資产阶級統計学的基础上，我国的社会經济統計，是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設与社会主义改造的这个总任务而服务的，因此在我国必須建立"以馬列主义的历史唯物論为指导思想的統計学"，必需建立"为社会主义建設与为社会主义改造服务的、系統的完整的社会主义統計工作"，一切統計工作者与統計学者，必須認眞学習馬列主义的統計理論和統計方法，特别是一切过去受过資本主义教育的旧統計学者，更要認眞进行思想改造，学習馬列主义的統計理論与統計方法，才能更好地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設服务，因此在这里我們說"我們把原有的資产阶級統計学否定"这是做对了，而不是做錯了。象厉德寅所吹噓的資产阶級統計学是为資产阶級統治服务的，而我們的社会主义統計，必須是为了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設服务，难道我們能企求象他这样的資产阶級統計学家来帮助我們建設社会主义統計工作嗎？厉德寅所以提出这样一个問題，其目的就是企圖恢复資产阶級統計学，这是我們不能允許的。

中国眞的有"統計学"的傳統嗎？四五十年来，欧美資产阶級的統計学傳入中国以后，中国資产阶級統計学者，傳播了一套資产阶級的統計理論，但这是欧美資产阶級統計学的傳統，絕不是中国人民所需要的傳統。至于統計工作情况，在国民党反动統治的二十二年間（从1927—1948年）究竟获得了多大的成績呢？毛主席在"农村調查"的序言中就早已指出："一般地說，中国幼稚的資产阶級还没有来得及也永远不可能替我們預备关于社会情况的較完备的甚至起碼的材料，如同欧美日本的資产阶級那样，所以我們自己非做搜集材料的工作不可"。实际上旧中国除了海关、邮政方面有比較經常的統計以外，就只有几个城市的几种物价指数与生活費指数的編制，以及很不完整的工商業調查、人口調查、生命統計、民政司法、治安統計而已，而且数字絕大部分是零零碎碎，断断續續，有的甚至是伪造，象解放前上海市伪統計处所編物

价指数与职工生活費指数更是有意捏造，歪曲事实(这个問題我已在最近一期的統計工作上已予以揭發)。这叫什么傳統呢?如果这就是厉德寅所謂的"傳統"，那末这是一种公开伪造的"傳統"，是一个欺騙人民的"傳統"，翻了身的中国人民，决不承認这种傳統，一切有良心的、正义感的学者專家，也决不会承認这种傳統的。实际上我国人民及党有自己的調查統計工作的傳統，这就是党与毛主席所經常教导我們的"必須加强調查研究工作"的傳統，在第一次国內革命时期，毛主席就在江西兴国地区进行了有名的兴国农村調查，这是我国社会經济調查工作的典范，这个調查报告以及其他調查报告，为我国革命工作者如何进行調查工作开辟了科学的广闊的道路。广大的革命工作者，以及許多进步的知識分子，在学習了毛主席所倡导的調查工作以后，在抗日民主根据地建設过程中，以及在战爭頻繁的时期中，进行了許多农村經济調查，为根据地的建設(包括政权建設与經济建設、軍事建設、文化建設等各方面工作)，提供了丰富的資料。仅仅因为根据地处在極端頻繁的战爭与被分割的狀态下，才影响党沒有建立全面的調查統計工作。但是"为什么要进行調查工作"，"如何进行調查工作"，"如何根据阶級分析来綜合分析調查資料"，以及"調查工作如何为当时基本任务与具体任务服务"等問題，不但在进行这項工作的同志中有比較明确的認識，并且获得較丰富的經驗，就是一般不接触这項工作的同志，也能深切地理解这項工作的重要性与它的必要的科学性而重視調查研究工作。要說傳統，这就是我国調查統計工作的光荣傳統，这个傳統就是"建立在馬列主义基础上的科学的調查研究工作，是建立在阶級分析和历史發展观点，以及馬列主义政治經济学基础之上的科学的眞正群众路綫的調查研究工作"。厉德寅所宣揚的一套資产阶級統計学的傳統，正是企圖否定我党領导的科学調查統計工作的革命傳統。这究竟是誰在割断我国人民光荣的历史呢?

我們否定旧的資产阶級統計学的反动本質，但并不否定数理統計中的某些可用的方法，只要对于我国社会主义建設有用，我們应当选擇应用。近几年来，我国統計工作者在国家統計局領导下，对于"抽样調查"这个調查方法的比較广泛的应用就是一个很明显的証据。

否定資产阶級統計学的反动本質，与承認数理統計中某些方法对于我国經济統計工作的应用，这就是我們的看法，而厉德寅企圖以数理統計来頂替社会經济統計学，企圖推翻工人阶級自己的統計学，这足以証明他的别有用心。

厉德寅为了达到他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目的，在他的發言中，还企圖挑起党与專家学者的隔閡，企圖拉攏一些旧統計学者在他的周圍向党进攻，厉德寅說我們在否定旧統計学过程中，"把中国原有的統計学專家学者亦采取了全盤否定的态度"。这句話眞是惡毒極了。难道說我們否定資产阶級統計学的反动本質，就是否定"原有統計專家学者"嗎?大家知道，解放来，党对于一切專家学者是采取团結、教育、改造的方針，为了使一切專家学者能更好地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設服务，党号召一切知識分子加强对馬列主义的学習，改造自己的立場、观点，这也正是使我国广大的專家学者的学識、經驗經过改造能更好的發揮出来。因此只要旧統計学家能認眞进行思想改造，認眞学習馬列主义的統計理論和統計方法，眞正願意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設服务，我們都願意合作共事，事实上，确实有一部份旧統計学者已經認眞地在改造自己的旧思想、旧作風，願意为社会主义建設服务。但象厉德寅那样，滿腦子的資本主义思想，拒絕思想改造，甚至想在我国社会主义社会中来复辟資产阶級統計学，我們之間还有什么共同思想和共同語言呢?厉德寅坚持这样做，并以这些話煽动旧統計学者来向党进攻，不但証明他已墮入反党的泥坑，而且也在所有統計学者面前暴露了丑惡的面目。

二、我国統計工作应不应学習苏联？难道我們学習苏联沒有成就嗎？

厉德寅在这个問題上，認为学習苏联会使專家学者"变成了留声机器、陈年唱片"，并且要我們"对学習苏联統計学作出总結"。厉德寅提出要我們"总結本国經驗，学習苏联經驗，吸收其他国家的好的东西来作出今后建設方針"。他这些話的实質在哪里呢?剝开来看，既然他对学習苏联已經等于作了"总結"，在他的眼中苏联的經驗已經是"陈年唱片"了，过时了，也不中用了，那末，我国統計工作的建設方針，也就只有"总結本国的傳統"和"吸收其他国家(就是英美資本主义国家)好的东西"了，而所謂的"学習苏联經驗"不过是一个陪襯罢了。因此也就是說，中国要建立社会主义統計工作，一是向有傳統經驗的旧統計学家学習，也就是只有向象厉德寅这样学者学習，一就是向資本主义国家学習。学習的結果，当然是在中国建立資产阶級統計学、建立为資产阶級服务的統計工作。那时候象厉德寅輩，就可掌握領导大权，为恢复資本主义开鑼喝道，这还不明显嗎?

毛主席很早就告誡我們，要我們好好学習苏联的建設經驗。由于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建成社会主义的国家，苏联革命和建設的經驗，是最完备的，而我們国家所要走的道路就是苏联走过的光輝道路。因此坚定不移地向苏联学習是我国一貫的方針。苏联在建設社会主义統計工作上，經过四十年的努力，已經取得輝煌的成就，

这是無可否認的事实，我国从統計工作开始建立的一天起，党与政府領导同志就曾經明确的指示过，如李富春副总理就在1951年第一次全国財經統計会議上指示說："我們要建立統計工作，只能向苏联学習社会主义的、为馬列主义所武裝的統計学"，又說："在統計工作的思想領域里，同样要实行毛主席所說的一边倒的政策"。問題很明显，因为我国建立的統計工作，是为着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設和社会主义改造，为着我国的計划經济的建立而服务的，我們当然不能向着"为了加强剝削，为了替將要垮台的資本主义經济粉飾現象、本質的資本主义統計学"学習，厉德寅的謬論中，虽然也偶然地用上几句"向苏联学習""学習苏联經驗"等几个字样，但它是把苏联的先进經驗当成"陈年唱片"，这同北京陈振汉等右派分子否定馬列主义的科学性，說馬列主义已經是陈旧的学說，正是异曲同工，这种企圖販卖其資产阶級的反动毒物，其用心是狠毒的。

苏联在四十年間对于統計工作的建設，所取得的輝煌成就，根据国家統計局孙冶方副局長去年赴苏考察的体会，覚得主要有下列各方面：

1.根据馬列主义政治經济学的理論，及社会主义建設的需要，建立了国民經济統一的核算制度，以及完整的經常的統計报告制度，实行着全国集中統一的領导。

2.利用科学方法系統的积累了国民經济各方面的完整而正确的历史資料。

3.系統地建立了国民經济平衡統計，建立并确定一套科学的平衡表体系和計算方法。

4.广泛的开展了統計分析研究工作，研究了国民經济生活中的許多重大問題和比例关系。

5.培养了大批統計工作干部，苏联的統計干部，不仅具有丰富的实际工作經驗，而且理論水平相当高。

6.計算工作的广泛的机械化，中央統計局有1800多人的一个計算工厂，全国有80多个計算工厂、机器計算站，最近还积極計划將基層区一級也开始試办机器計算站，这不但使行政人員大大减少，而且大大提高了报表資料的迅速及时与正确。

从这里看到了，四十年苏联統計工作取得了多么巨大的成就，也証明了社会主义統計学、社会主义統計工作的巨大优越性。

苏联政府对于我国統計工作建設上的無私援助，也同其他各項国民經济建設上的援助一样，在解放以后不久，就派遣了現任苏联中央統計局副局長叶儆夫等几位同志，来我国帮助我們建立社会主义統計工作。当我們許多統計工作干部还不懂得如何进行社会主义統計工作的时候，苏联專家不辞艰辛地为我們講解社会主义統計工作的重要意义，介紹苏联建立統計工作的經驗，帮助我国設計国民經济各部門的报表制度及調查工作的方案，为我国訓練統計工作的干部，并亲自到各省市地区指导統計工作的建立。苏联專家的大公無私的态度，眞可称得起是我們的良师益友。正因为这样，才使我国能从無到有，順利地把我国社会主义統計工作建立起来了。

我国社会主义統計工作的建設，从国家統計局的成立到現在不过是五年的历史。但是在这五年过程中，由于党中央的英明領导，全体統計工作同志的积極努力，特别由于苏联專家的热心指导，不但使我国能从無到有地建立了系統的統計工作，建立了坚强的統計机構与統計队伍，而且搜集与整理了国民經济各部門的基本資料，为国家提供了許多編制計划、檢查計划、反映国民經济量与質变化發展的許多重要資料，眞正發揮了統計工作在社会主义建設与計划管理中重大作用。这方面的情况，我們过去没有有系統的介紹，这里限于时間和篇幅，也只能大略的介紹一下。

1.在第一个五年計划时期內，我国已基本上建立起适合社会主义建設与国民經济計划管理需要的統一的科学的統計核算制度、統計体系和报表制度。这些体系与制度，是完全建立在馬克思主义政治經济学的理論基础上，因此它能正确地反映我国国民經济量和質的变化，保証了資料的科学性与正确。同时这些体系与制度又是全国統一的，它保証了各地区、各时期資料的可比性。国家統計局不但在国民經济各部門如工業、农業、交通运輸、基本建設、物資供应、貿易、文化、教育等各部門建立了統一的报表制度（即核算制度的具体表現），而且在近年来还建立了巨大的农家收支与职工家庭收支情况的抽样調查工作，并开始进行对国民經济平衡工作的計算（象国民收入的計算工作）。虽然在这方面还有許多缺点，但建立这样一項統一的全面的核算制度，这在資本主义国家是無論如何不可能的。厉德寅認为"国家統計局只守着陈旧的全面調查和大样本方法，而把現代数理統計所發展的新的小样本方法放弃了不用是不明智的"的說法，只証明他对于社会主义国家建立統一核算制度与統一报表制度的無知。因为在資本主义制度下，企業是資本家私有的，資产阶級政府只是为資本家的剝削利益而服务，資本家为了保守它的"秘密"，决不允許他們的政府来建立这样一种統一核算制度，資产阶級統計学家更無权来建立这样制度，否則它就不称为資本主义。而社会主义国家里，由于全民所有制的經济單位是由国家直接管理，集体所有制經济單位也有高度的集中性，公私合营經济也由于它是四分之三的社会主义經济，基本上已納入国家計划管理范圍之內，因此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設过程中，就有可

能建立以全面調查为主的各种定期报表。而这种定期报表制度(这是一种嶄新的、社会主义独有的取得資料的方法),就是統一的核算制度与科学的統計体系、分組法的体現。厉德寅否定我国全面調查与統一核算制度的正确,不但証明它对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無知,而且也証明它对我国社会主义統計工作的恶毒污蔑。

2.几年来在全国进行許多次全国性調查工作。主要的計有1950年的全国国、合营工矿企業普查;1951年根据毛主席指示进行了全国的工农業总产值和劳动就業兩項調查;1953年进行全国人口普查;1954年进行了全国私营工業和手工業的普查;1955年进行了全国私营商業的普查及农業合作社的收益分配調查;从1954年起每年十月一日进行了全国主要物資的普查;而在1955年与1956年开始进行全国性的农民和职工的家計調查;国家統計局并开始进行对历年国民收入的計算。上海市除完成上述各項調查任务外,曾經根据上海市的社会主义建設与改造的需要,在1953—1954年間进行了私营工業的各行業的調查摸底工作;1956年的对私改造中"私营企業資金利潤及資方收入"等調查;同时也按国家統計局的計算方案于去年开始計算上海市的国民收入資料。上述各項調查工作,在方法上有全面調查,重点調查,也有抽样調查与典型調查等各种方法的运用,有时往往在一种調查工作中运用了几种調查方法,經过反复核对查証与分析研究,才最后确定調查資料。这也証明厉德寅認为国家統計局只知道运用"陈旧的全面調查和大样本方法"对"小样本方法放弃不用是不明智的"的說法,完全是一种閉着眼睛說瞎話。

3.由于上述大規模定期报表的执行,以及大規模調查工作的进行,我国各級統計部門已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統計資料,特别是有关国民經济各方面的統計資料,成为我們国家宝貴的財产。各級統計部門,根据搜集到的資料,进行了科学的加工、整理与分析研究,这些經济資料就为全国編制計划时研究我国工农業的比例、工業中生产資料与消費資料的比例、各种經济类型的比例,工業分布狀况、工業生产能力,以及在各个年度檢查計划、总結国民經济發展变化等提供了系統的資料。近年来国家統計局与各省市还开始进行对旧中国工業、农業、商業、物价及人民經济生活統計資料的搜集整理,这些資料整理的成果目前已可以在政府首長的各項报告中看出。在这里使我們看到过去国民党政府没有为我們准备好这些基本資料,但我們却在短短几年中已取得了一定的成績,在厉德寅看起来,可能也是非常"不明智"的。特别还要指出一点,近年来国家統計局在国家計划机关共同配合下,进行了对解放后几年来国民收入的計算以及国民經济綜合平衡統計工作,从国民收入計算作用来看,它不但計算和研究了第一个五年計划期間的消費和积累关系,国民收入中的分配与再分配关系,消費基金的合理分配問題,及工农間的分配关系,而且对于領导机关正确地安排国力和国家建設的关系,安排建設和人民生活的关系等重大問題都起了相当大的作用。上述各种資料,国家統計局与省市統計局在历年發表公报中及历届人代会上首長的报告中已有公布,更詳細的資料也陆續分送各級党政領导机关及各科学研究机关与大專院校。

4.几年来在全国各地各企業事業單位以及政府部門建立了統計机構与培养了統計干部。全国現任專职統計干部即在十万人以上,而且这些干部普遍均受到統計基本知識的訓練。

上述这些成就說明我国几年来統計工作的成就是巨大的,是不容否定的。我們也清醒地看到我国的統計工作水平比苏联还相差很远,我們工作中还有許多缺点与錯誤,特别是由于我們开始建立社会主义統計工作时,缺乏必要的知識,因此在最初几年中对苏联經驗往往有机械搬用結合我国实际情况不够的缺点与錯誤,但是,平心靜气的說,这种情况总是难免的。而且这些錯誤与缺点,决不能否定我国建立社会主义統計工作的巨大成就与学習苏联的必要,如果我們不向苏联学習,不說我国統計工作得不到上述如此巨大的成績,并將严重影响我国社会主义建設的进展,这还不明白嗎?

厉德寅否定学習苏联的必要性,閉眼不承認我国学習苏联統計工作的所获得的巨大成就,他的根本目的就在于复辟資本主义統計学。

三、最后我想对厉德寅有意污蔑我国国家統計局的領导說几句話:

厉德寅罵国家統計局"二千工作人員中没有一个人懂得統計常識"或者說"国家統計局是一定有很多很多的統計專家,恐怕他們没有被重視,所以不說話或少說話,或者說了没有被采納"。这样,在厉德寅的眼光中,国家統計局簡直成了一个不学無术的陰森森吓人的官僚机关,是一个十足的宗派主义的机关。这与北京的右派分子李景汉、林和成叫囂說国家統計局的領导上殘存着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封建殘余思想是同出一轍。厉德寅很明瞭,要攻击全国統計工作,复辟資本主义統計学,最关紧要的一着就是把全国統計工作的領导机構罵臭,这样才能达到他們复辟的企圖。厉德寅無事生非,捏造出上面的說法作为向国家統計局进攻的武器。这里看出厉德寅用心的卑鄙与陰毒。

厉德寅的陰謀鬼計是騙不了人的,如果說国家統計局没有一个人懂得統計常識,上面所講的这許多工作的

布置与組織进行，如何进行呢？几年来，我国已基本上建立了社会主义統計工作，这难道又是“那些不懂統計常識”的人所能做得到的嗎？大家都知道，国家統計局的領导同志中，大都是我国著名的馬克思主义的經济学家，他們不但有丰富的統計学識，而且有丰富的馬列主义經济学的学識，正由于他們正确地貫徹执行了党中央对統計工作方針任务的指示，領导国家統計局全体干部与全国統計工作同志，才打下了我国社会主义統計工作的基础，厉德寅有什么理由憑空捏造来污蔑国家統計局的領导呢？厉德寅在这里又从紅臉轉成白臉，說“我相信国家統計局里一定有很多很多的統計專家”可惜他們没被“重視”或者他們說了話没被采納，大家看，厉德寅把自己裝得多善意多公正的“專家”。但这里我們不禁要反問厉德寅：你要他們說什么話？你要国家統計局“重視”他們什么？我所知道国家統計局在几年来，以及在鳴放过程中，全体工作同志对工作提了許多有益的建議，国家統計局領导上也重視他們的意見，也采納他們許多有益的意見。不但如此，国家統計局还經常邀請社会上各大学、專科，研究机关的統計專家，請他們研究問題，商討各項業务上的許多問題，象邀請过巫宝三，吳景超共同研究国民收入問題，邀請陈达参加人口統計的討論，邀請李景汉討論农戶調查問題，但就是这几位所謂專家教授，他們都参加了右派分子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活动，就是他們这几位“專家”說共产党不信任他們，說我們領导同志輕視他們。在这里，厉德寅的話就得到了印証，原来他同这些右派分子是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他的要求“重視”要求“采納”他們的話，眞正的用意是便于他們干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勾当而已。

对厉德寅的揭露、駁斥，使我想起了北京社会科学界及經济学界对右派分子陈振汉等的批判。，厉德寅和陈振汉的手法是一样的，用的都是挑撥党和政府同整个統計学界的关系，虽然字句不同，但其用心則一，都是为了复辟資产阶級的政治学、社会学，以至統計学，为資本主义复辟扫清道路。因此我以为厉德寅的問題，不是一个学术問題，而是一个政治問題，是兩条道路的斗爭問題。摆在厉德寅面前的只有老老实实，低头認罪，徹底交代的一条路，否則是自絕于人民。

（上接第9頁）

了“关于第二个五年計划的說明”和“百家爭鳴”的时机，进行反攻、倒算，这里还必須指出，費孝通是恶意地歪曲了党中央的方針政策。党中央制訂第二个五年計划，是依据了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所規定的政治路綫，“就是要依靠已經获得解放和已經組織起来的几亿劳动人民，团結国内外一切可能团結的力量，充分利用一切对我們有利的条件，尽可能迅速地把我国建設成为一个偉大的社会主义国家”。①党中央充分考虑了我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設的經济方面的基本特点，例如国民經济落后，生产力水平低，人口众多等等因素，从而提出了“統筹兼顧，适当安排”的战略方針，以調动一切积極因素，改变不利条件为有利条件以加速社会主义建設，因此在第二个五年計划的工業建設方面，便进一步提出了重工業与輕工業的关系，大型企業与中小型企業的关系等問題，使生产建設能够合理安排，充分發揮全部潜在的生产能力。这个方針和費孝通所提倡的“乡土工業”之間，难道有絲毫相同之处嗎？費孝通主張在江村重新恢复蚕絲厂，就必然会影响到城市絲織工業生产的减少和职工的生活，也將破坏太湖里的东山和浙江山区等傳統产桑区的养蚕事業，其最后結果就是扩大人民内部矛盾，造成工农群众之間以及与国家之間关系的对立，这也就是費孝通卑鄙無耻的政治陰謀，难道这种具有政治陰謀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歪曲党的政策的謬論，我們也能允許它参加“百家爭鳴”嗎？关于这一点，陆定一同志講得很清楚，他說：“我們所主張的‘百花齐放，百家爭鳴’，是人民内部的自由”，②“‘百花齐放，百家爭鳴’，既是为了动員一切积極因素，所以又是一个加强团結的政策。在什么基础上的团結？在爱国主义的基础上，在社会主义的基础上。团結起来干什么？建設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并且同向国内外敌人作斗爭”。③“百花齐放，百家爭鳴”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根本方針，可是資产阶級右派份子却企圖借此以毒草冒充香花来販卖他們的私貨，費孝通的“乡土工業”謬論就是这种私貨。但是人民的覚悟在党的教育下都大大提高了，私貨没有市場了，毒草絕难冒充香花，既是毒草，就必須徹底鏟除掉。

費孝通是个民主革命时期的老右派，但是党和人民仍然尽力爭取他参加革命队伍，特别在解放以后，將他安置在相当重要的崗位上。然而他長期拒絕思想改造，始終坚持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立場，并且恩將仇报，企圖利用整風运动来推翻中国人民革命政权，使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反动統治在中国复辟。历史終究是無情的，已經站起来的中国人民，絕不允許中国再回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老路上去。問題很明确，这一小撮反动渣汁，如果再不向人民徹底投降，痛徹悔悟，只有永远被人民所唾弃。

---

① 刘少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員会向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

②③ 陆定一：百花齐放，百家爭鳴。

坚决粉碎右派分子复辟資产阶級統計学的陰謀

王思立　朱　元　蔣士駒
楊　惠　郑德如　王建民

去年五六月間，正当党开始开展整風运动的时候，資产阶級右派分子們却丧心病狂地利用党的整風，向党、向人民、向社会主义發动了猖狂的进攻，企圖在中国也制造一个"匈牙利"事件，以达到他們复辟資本主义制度的罪恶目的。

資产阶級右派的进攻是多方面的。他們在科学文教方面的进攻，首先集中表現在章罗联盟所提出来的反动"科学綱領"中。他們接着在各个地方各个科学部門进行了一系列的陰謀活动。其中，如右派分子陈振汉等在北京所制訂的"我們对当前經济科学工作中的一些意見"，是企圖推翻党在經济科学和財經工作中的領导，以达到复辟資产阶級經济学的目的；如右派分子林和成在国家統計局座談会上的發言，是企圖推翻党在統計学和統計工作中的領导，以达到复辟資产阶級統計学的目的。上海方面的右派分子們也和北京遙相呼应。如上海經济研究所筹备处的右派分子沈志远、吳承禧、楊蔭溥等制訂"改进工作方案"是章罗联盟反动"科学綱領"的具体化，企圖借以篡夺党在該所的領导权，使資本主义的研究道路复辟。我院右派分子厉德寅甚至發出叫囂，要恢复所有的資产阶級社会科学。

右派分子厉德寅在去年六月十一日我院党委召开的教师座談会上發言时說："財經科学在学習苏联和教学改革上有些犯了割断历史粉碎傳統的偏差作風。……几年来，有些教条主义者和一些宗派主义者借学習苏联和教学改革的名义，或者其他名义对我国原有的傳統的政治学、經济学、社会学、法律学和統計学以及这些科学的專家学者完全否定了。他們沒有根据政策方針的精神办事，完全从主观願望出發，定了自以为是的标准。凡不合乎这标准的一概不要，也不加以审察，也不再过問。这种割断历史、粉碎傳統的做法是違背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点的，亦是脫离实际的"。

厉德寅在發言中的提法無論怎样隐蔽，而其实質則是企圖使資产阶級社会科学复辟。陈振汉等右派分子还只是企圖恢复某一門資产阶級社会科学，厉德寅是企圖恢复所有的資产阶級社会科学，包括資产阶級政治学、經济学、社会学、法律学和統計学等等。因为他是統計系的教授，他才从統計学下手，企圖从統計学方面先打开一个缺口。他在这次發言中，对于新中国統計的各个方面放出了許多毒箭，其中最恶毒的是：

第一，他企圖用数理統計学頂替作为社会科学的統計学；

第二，他对国家統計工作进行誣蔑中伤；

第三，他挑撥党和統計学者間的关系，企圖煽动他們向党进攻；

第四，他坚决反对学習苏联和教学改革。

右派分子厉德寅的这些荒謬言論决不是学术問題，而是資产阶級右派整个政治陰謀的一部分，他的目的是使資产阶級社会科学全面复辟，从而为資本主义制度的复辟創造条件。我們要坚决粉碎右派分子复辟資产阶級統計学或任何其他資产阶級社会科学的陰謀。因此，对于右派分子厉德寅所放的这四支毒箭，必須严厉地一一加以駁斥：

第一，厉德寅在發言中一再提到数理統計学，說什么"数理統計学被数学游戏的大帽子压着"，"数理統計学被打死了七年"，"把数理統計学和工業产品品質的統計檢查等課……廢除了"等等。首先必須指出，这些話都只是他的手法，他的烟幕。他不敢明目張胆地要求恢复資产阶級統計学，因此把自己打扮成为数理統計学的發言人，为数理統計学叫屈，企圖仿效現代資本主义国家反动統計学者的故技，以数理統計頂替社会經济統計学，来达到他破坏社会主义統計，复辟資本主义統計，在統計科学以至一切社会科学領域内，以資产阶級思想代替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不可告人的目的。

大家都知道，統計学是一門社会科学。作为一門社会科学，它具有高度的阶級性和党性。社会主义統計学必須为社会主义服务，必須是掌握在劳动人民手中的、为劳动人民的利益而斗爭的武器。因此，它必須建立在辯証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和馬克思列宁主义政治經济

学的基础上。只有这样，才能够正确地确定統計研究的对象，才能够規定出一套完整的、能够反映社会主义經济發展的指标体系，才能够用阶級的观点来选擇分組标識，正确地运用分組分析和其他各种統計分析。只有这样取得的資料和这样的分析，才能揭露社会經济現象的本質，才能有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設。解放后的中国人民，自己掌握了政权，正在一心一意地建設社会主义，我們所需要的，必然只能是切切实实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社会主义統計学，决不是为反动統治帮凶，或为反动势力复辟扫清道路的資产阶級統計学。这一坚定不移的方向，决不容許任何人用任何借口加以纂改。

事实上历来剝削阶級的統計学也是打上了鮮明的阶級烙印的，只是他們不敢明說罢了。在封建統治下，萌芽时代的統計就是为封建帝王服务的。在資本主义初期，資产阶級統計学对于社会現象的研究方面，也曾有一定的貢献。但即使在这个时期，也由于剝削阶級狹隘阶級利益的限制，而沒有能够建立起眞正的統計科学。到了壟断資本主义时期，資本主义面临着不断加深的危机和沒落死亡的前景，資产阶級統計学者为了要維护資产阶級已得的壟断利益，为了掩盖阶級矛盾，为了蒙蔽事实，欺騙人民，也就漸漸走上了以数理統計学来頂替社会經济統計学的道路。他們假借了数理統計学中的抽象公式和抽象方法，完全不考虑社会現象的本質、特点和規律性，把这些公式和方法强加在社会經济統計学的头上，使它完全丧失了認識社会的現实意义，变成了計量不計質的、玄之又玄的、除了模糊事物眞相外不能解决任何問題的数学游戏。稍稍領教过資产阶級統計学的人都很清楚，那些資本主义国家的御用統計学者們怎样計算虛構的平均数；怎样乱用数学中常态曲綫和机率論的公式来研究次数分配，来抹煞資本主义社会中的严重矛盾；他們怎样利用抽象的数学公式来測定所謂循环变动；又怎样不考虑事物的發展規律，單純地乱用数学中的直綫和曲綫公式来配合所謂長期趋势，借以掩盖資本主义危机的实質，把資本主义制度描繪成为永存不朽的理想社会；他們怎样不考虑現象的本質和內在的联系，單純地用数学公式来計算相关系数；又怎样用毫無經济意义的指数公式来歪曲物价、生产量和工資水平等等的动态眞相。資产阶級統計学中諸如此类的騙人把戏，难道可以用来为工人阶級的利益服务，为我們建設社会主义服务嗎？

右派分子厉德寅口口声声說，新中国在对待財經科学上"割断历史，粉碎傳統"。他所說的"我国原有的傳統"就統計学来講，当然是指着解放以前从資本主义国家販运到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的那种蒙蔽事实、欺騙人民的資产阶級統計学的"傳統"。我們坚决要粉碎这种"傳統"，而且我們已經有成效地把它粉碎了。正告厉德寅和其他一切右派分子，历史是不会开倒車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是一去不复返了。中国人民坚决地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决不走資本主义的道路。你們妄想搞資本主义复辟，是我們全国人民所絕对不允許的。

当然，我們批判資产阶級統計学中的数学游戏，决不等于反对数理統計学本身。数理統計学是数学的一个分支，正像生物統計是生物学的一个分支，統計力学是力学的一个分支一样。我們所說的"数学游戏"是純粹以数学方法代替經济分析。我們批判的"数学游戏"，就是以数理統計方法頂替社会經济統計主要內容的資产阶級統計学，我們从来沒有說数学或其分支数理統計等科学本身是什么数学游戏。苏联1954年統計科学会議后，大家看法更一致了：(一)数学和数理統計是統計学以外的科学。(二)以数理統計方法頂替社会經济分析的資产阶級統計学是"数学游戏"。总之我們批判的是資产阶級統計学，不是数理統計学。这点，厉德寅不会不懂，他只是有意地混淆視听，以企圖移花接木地閃开我們对于"数学游戏"的正确批判，在伪裝为数理統計抱不平的面貌下企圖使資产阶級統計学死灰复燃。

作为数学分支的数理統計学是一門很有前途的科学。在我們社会主义国家中，它不但沒有被否定，相反地，和其他科学一样得到了蓬勃的發展。大家都知道，苏联在数理統計方面的地位是世界公認的。甚至早在帝俄时期。数理統計方面就有很多的貢献。車比雪夫、利亞普諾夫、馬尔柯夫、柯罗莫果洛夫等已經是大家所熟悉的名字。在数理統計的科学研究方面，也如許多其他科学一样，苏联的水平就是国际最先进水平。

我国解放以来，数理統計在学术上也一直保持着应有的地位，和解放前比，是大大地發展了。中国科学院中关于数理統計学的研究正在大力的开展，高等学校中开設的机率論、数理統計、产品質量統計檢查等課程也在不断增加中。因此，右派分子厉德寅所說的数理統計"被打死"，"中断了七年"等讕言是沒有事实根据的。

不过，必須着重地指出，作为数学分支的数理統計学和作为社会科学的統計学是屬于兩个不同知識領域的兩門完全不同的科学，所研究的对象不同，研究所用的方法也不同，所依据的理論基础更是不同，它們間有着本質上的区别，絕不能混为一談。不錯，在社会經济統計中，也需要使用数理統計的一些方法和其他的数学方法，正好象任何一門科学往往要用到数学一样；但这种使用是有一定的条件的，必須在經济分析的基础上，只有根据經济分析認为需要运用这些方法的时候才加以使用，也只能根据正确的立場观点来加以使用。而且，即使用到，也只

是作为一种輔助的工具，处在从屬的地位，不可能構成社会經济統計学的重要內容，更絕不是主要的或唯一的內容。事实上，需要应用数理統計方法的科学是非常多的，象生物学、天文学、物理学，以及研究微观世界的各种科学等等。我們从来没有因为这一緣故，就把这些科学說成数理統計学。同样，我們也没有任何理由把社会經济統計学和数理統計学等同起来。上面已經說过，資产阶級統計学者所以要用数理統計学来頂替作为社会科学的統計学，使它丧失現实意义，成为毫無經济內容的数学游戏，是有其不可告人的动机的。因此，事情非常清楚。数理統計学是一回事，别有用心地把数理統計学和社会經济統計学混同起来，甚至用数理統計学来頂替社会經济統計学，却完全是另一回事。在社会主义国家中，数理統計学是肯定要發展的；但模糊事物眞相的数学游戏，用数理統計学的幌子来复辟資产阶級統計学的陰謀，却必須坚决地加以粉碎。厉德寅故意把数理統計和数学游戏拉在一起，决不能阻止我們反对数学游戏，也决不能阻止我們反对資产阶級統計学的复辟。

第二，厉德寅在發言中說："中国国家統計局二千工作人員中没有一个人懂得統計常識；""国家統計局只守着陈旧的全面調查和大样本方法，而把現代数理統計所發展的新的小样本方法放弃了不用是不明智的"。这是对新中国的統計工作加以全盤的否定，对新中国的統計工作人員加以恶毒的誣蔑，这和右派分子陈振汉等所說的財經領导同志連"經济常識"都不懂得的說法，有什么兩样呢？

建国八年多来，特别是国家統計局在1952年底成立以来，全国統計工作者在党和政府的正确領导下，勤勤恳恳地工作，从無到有，建立起各級統計机構，培养出来大批統計干部，建立并貫澈了整套的科学的統計核算制度和报表制度，举行了我国有史以来第一次科学的全国規模的人口普查和各种全面的以及非全面的專門調查，取得并發表了大量的統計資料。这些工作和这些資料，在帮助国家了解情况、决定政策上、在編制第一个五年計划和监督其执行上，在准备編制第二个五年計划上，总之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的一切工作上，都起了而且正在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除了一小撮右派分子外，誰都不会否認这些事实，誰都不会否認八年来統計工作的巨大成績。厉德寅等的狂妄叫囂是在夢想。

关于統計調查，和統計稍有接触的人都知道：全面調查是統計工作的一个重要內容，世界上几乎没有一个国家不进行人口普查和国情普查。特别是在我們社会主义国家中，有着进行全面調查的一切有利条件；同时，也有着通过报表制度就国民經济各个方面进行全面調查的絕对必要性，因为我們进行統計，不仅仅为了对經济現象的某些个别方面取得一些資料，更重要的还要为整个国民經济的計划工作和管理工作服务，还要对計划的执行进行經常的监督，而这些任务显然不是單憑抽样調查所能完成的，更絕不是單憑运用小样本的方法所能济事的。厉德寅的"全面調查是陈旧的"的說法是完全没有根据的。

当然，我們决不否認非全面調查的作用。事实上，远在全国解放以前，解放区的統計工作者們对非全面調查的运用早就积累了丰富的經驗，国家統計方面的領导同志也曾一再指出，在适当的情况下，有采用典型調查和各种抽样調查的必要。在苏联，抽样調查方法在农業統計和工業統計中应用得非常广泛。我国国家統計局这几年来也已經用过抽样調查的方法。例如，1954年的农民家庭收支調查和1956年的职工家庭收支調查，都是抽样調查方法的实际应用。此外，国家統計局还曾邀請波蘭数理統計学家菲兹教授和印度数理統計学家馬哈蘭諾比斯教授和高善必教授来我国講学。至于在我国各綜合性大学数学系中关于数理統計学教学和研究工作的迅速發展，就更加不必說了。

不过，我們必須再一次的着重說明，数理統計所提供的抽样理論，大样本抽样也好，小样本抽样也好，只是我們进行統計工作时可以利用的許多种方法中的一种方法，远不是統計的全部。正如薄一波副总理在第六届全国統計工作会議上所指出的，"統計工作的任务应当是占有材料，加以分析，找出矛盾，提出办法。"要是脫离了經济現象內容的研究，仅仅依靠数理統計的抽象公式，首先就無法决定应該占有些什么材料，应該进行些什么分析，更談不上找出矛盾和提出办法。因此，不适当的夸大数理統計对統計学的作用。特别是不适当地夸大小样本方法的作用，甚至認为不用或少用小样本方法就是"不懂統計常識"。显然是严重的歪曲，显然是别有用心的。

第三，厉德寅在發言中說："把中国原有的統計学專家学者亦采取了全盤否定的态度，他們的学識，經驗和研究方法，亦曾一度不再得到重視了。"这完全是企圖挑撥党和一部分統計学者們的关系，誣蔑党对知識分子的政策。这和右派分子陈振汉等所說的党和政府对过去研究現代資产阶級經济学說的学者实行"政治歧視"全然是一脉相通的。

我們对右派分子們这种挑撥和誣蔑必須加駁斥。前面說过，反动的資产阶級統計学必須加以否定。但是我們絕对没有否定原有的統計学者。我們的党在解放后对知識分子一向采取团結、教育、改造的政策。这个政策是一貫的，又是一致的。所謂一致，就是这个政策对于

自然科学的知識分子适用，对于社会科学的知識分子，包括旧統計学的学者們在內，同样地适用。解放八年来，我国統計学者專家們有的在高等学校当教授，有的参加科学研究工作，有的担任具体的統計工作。就我們上海財經学院統計系来說，共有教授副教授19人，其中10人是解放前担任統計和其他行政工作的，5人是在旧大学教書的，4人是解放后从美国回来的。另外，还有兩位同志，参加院部領导工作兼教統計学，也是解放前在旧大学里教書的。总之，我們全系的教授副教授全是旧統計学者。这些同志們和新社会所培养出来的青年的統計学者們在一起勤勤恳恳地参加教学工作，进行科学研究工作，編写各种統計教材，而且他們所写的書在解放后也都有出版的机会。就以他厉德寅而言，他在解放前長期参加反动政府工作，騎在人民头上，又在反动的"中央政治学校"教过几年書，为害广大的青年。但党和政府仍不咎既往，解放以后，一直讓他在大学里教課，做教授。

我們極大多数的知識分子，包括旧統計学者在內，解放八年来，在党的領导教育和帮助下，經过五大运动和三大改造，都获得了不同程度的进步和提高。我們迫切地要求进一步的改造，好符合于社会主义建設的要求，为社会主义事業貢献出自己的一分力量。而厉德寅呢？却是一貫地对党严重不滿，一有机会就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他并且極恶毒地挑撥党和旧統計学者中間的关系，煽动他們离开党，而到他这一边去，共同策划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勾当。但認識提高了的知識分子是不会上他的当的，他的这种手法是騙不了人的。

第四，厉德寅在發言中对于我們学習苏联和进行教学改革表現出極端的仇恨。他說"財經科学在学習苏联和教学改革上有些犯了割断历史粉碎傳統的偏差作風"。他說我們在院系調整以后根据苏联專家在中国人民大学所編的講义备課和講課是"生吞活剝，全部搬来"，开"留声机"放"陈年唱片"。这和校外右派分子楊蔭溥、姜庆湘等以及校內右派分子王士章、陈啓运等如出一轍。右派分子們总是借口反教条主义来反对我們学習苏联，甚至把我国在建設中所發生的某些个别缺点也認为是学習苏联的結果。这是严重地破坏中苏团結，企圖把中国从社会主义道路拉回到資本主义的老路上去。

在这个問題上，我們的看法和資产阶級右派完全相反。学習苏联是我国在建設社会主义过程中坚定不移的方針。周总理在1957年6月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講的非常明确："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建成社会主义的国家，有着丰富的先进經驗，我們从事社会主义建設不向苏联学習，难道向美国学習建設資本主义的經驗嗎？事实上，正是因为我們認眞地学習了苏联先进經驗，才使我們的建設工作少走了許多弯路，获得了很大的成績。"

苏联建国四十年以来，由于社会主义制度的無比优越性，科学文化事業的迅速發展使資本主义国家望塵莫及。苏联是全世界第一个国家把原子能利用于和平建設事業上，苏联發射出世界上第一顆洲际导彈，苏联發射出世界上第一顆和第二顆人造衛星。至于作为阶級斗爭知識的社会科学，正是苏联得到了蓬勃的發展。我們向苏联学習，并且进行教学改革，不但是絕对正确的，也是絕对必要的。

在进行教学改革的初期，由于我們是边教边学，即使是把苏联教材全部搬来，也未可厚非。我們要建設社会主义，难道我們不搬用馬列主义統計学，而搬用資产阶級統計学嗎？在当时，我們通过中国人民大学来学習苏联也是必要的。因为中国人民大学先得到苏联專家的指导，在学習苏联方面，比其他兄弟学校先走一步。我們先用苏联專家在中国人民大学所編的教材，接着用中国人民大学編的教材，然后用我們自己編的教材。这种作法是合乎逐步把苏联先进經驗和我国实际情况結合起来的原則的。厉德寅竟誣蔑我們通过学習中国人民大学来学習苏联是"生吞活剝"，放"陈年唱片"，显然是别有用心的。

* * *

綜合以上各方面，不論在对社会經济統計学的看法上，在对統計工作人員和統計工作的看法上，在对知識分子政策的看法上，在对学習苏联和教学改革的看法上，我們和厉德寅等右派分子之間存在着根本的分歧：我們要巩固并發展馬列主义統計学，厉德寅却要用数理統計学来頂替馬列主义統計学；我們为国家統計工作人員多年来辛勤劳动所获得的成績而欢欣鼓舞，他却誣蔑我們"国家統計局二千工作人員中沒有一个人懂得統計常識"；我們坚决拥护党对知識分子团結、教育、改造的政策，并且以脫胎換骨的方式来改造自己，他却說"对这些科学的專家学者完全否定了"；我們坚决要学習苏联并进行教学改革，他誣蔑学習苏联和教学改革是"割断历史，粉碎傳統"。总之，他把馬列主义統計学、国家統計机关、新中国的一切、社会主义的一切全恨得刺骨，并發出一系列瘋狂的叫囂。因此，这决不是学术問題，而是政治問題，是資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兩条道路的斗爭問題。

右派分子厉德寅，我們要正告你，你的反动面貌已經被揭穿了。你的出路只有一条，那就是抛弃你的資产阶級复辟的念头，向人民低头認罪。

論社会主义和資本主义的經济竞賽

胡世杰

社会主义体系和資本主义体系和平共处的原則，是由偉大的列宁根据客观發展的規律提出的，他并对这一原則奠定了理論的基础。列宁曾指示說，由于帝国主义时代資本主义各国的經济和政治發展的不平衡性規律的作用，使得社会主义不可能在所有的資本主义国家內同时取得胜利；資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將占着整整一个历史时期；在这个时期內，个别的国家將先后从世界資本主义体系中摆脫出来，而形成和扩大社会主义的世界体系。社会主义和資本主义这兩个对立的体系的同时存在，以及这兩个体系之間彼此的竞賽，是我們时代的基本特征；而社会主义体系的扩大和不断向上發展及資本主义体系的日益衰退和沒落，是我們时代的主要內容。

偉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始了人类历史由資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新时代。在十月革命烽火中誕生的第一个無产阶級專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在国內反革命的武裝反抗和国际帝国主义的武裝干涉下、在国內經济的巨大破坏和極度困难中，肩負起了开辟社会主义道路的偉大历史使命，肩負起了社会主义和資本主义这兩个对立的社会經济制度之間进行竞賽的任务。列宁曾指示說，必須"昭然若揭地向所有的人証明：社会主义蘊藏着巨大的力量，人类現在已經轉入一个新的、有着光輝燦爛的前途的發展阶段"。①苏联的劳动人民在苏联共产党的英明、正确的領导下，遵照着列宁的这一指示，以卓越和艰巨的創造性劳动，充分地發揮了社会主义蘊藏着的巨大力量、發揮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而在短短的历史时期內建成了社会主义社会，迈步跨上了建設共产主义的康庄大道。苏联已由建国初期的經济力量和技术水平極为落后的农業国家，一躍而成为具有强大的現代工業和完整的工業体系的世界上第一等工業强国。苏联工業的总产量，1957年已發展到了1913年的33倍，1917年的46倍，而生产資料的生产則發展到了1913年的74倍，机器制造業和金屬加工業的生产則为1913年的200倍。这样的工業發展的速度，是任何資本主义国家在其历史發展的任何时期中所望塵莫及的。

苏联在与資本主义的經济竞賽中最显著的成就之一，是苏联在解决基本的經济任务方面所达到的重大成果。苏联在按人口平均計算的产量方面与最發达的資本主义国家間的距离已一年比一年的縮小了。1913年，俄国按人口平均計算的工業产量低于美国13—14倍，而現在，則已縮小为2.6倍。

在兩个体系的竞賽中特别重要的一个指标，是国民收入的增長。从1913年到1956年期間，按人口平均計算的国民收入，苏联增長到了13倍，而美国則仅增長到2倍，英国和法国——1.6倍。

在这里我們还必須指出，如果不是由国际帝国主义所准备的、由希特勒德国發动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則苏联經济建設的成就自必更为巨大。据苏联經济学者的計算，苏联在这次战爭中所蒙受的人和物質的巨大損失，至少使苏联的經济發展推迟了兩个五年計划。

仅仅从上述的这些数字中，我們已足以看到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在同資本主义进行的經济竞賽中，不仅取得了有决定性意义的成就，而且毫無疑問地証明了社会主义在經济竞賽中必然压倒資本主义而得到光荣胜利。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全世界踏上十月革命道路而赢得胜利的，已經有欧洲和亞洲的一系列国家，包括了九亿多人口，形成了强大的社会主义的世界体系。資本主义早已丧失了优势，社会主义早已变成了不可战胜的力量"。②現在，社会主义和資本主义的經济竞賽已超出了一个国家的范圍，而变成了社会主义世界体系和資本主义世界体系之間的竞賽。社会主义在竞賽中所表現出来的优势和成就，也就比过去更为显明、更为突出。

整个資本主义世界在1956年所达到的工業生产水平約为战前的兩倍，而社会主义体系各国，虽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蒙受了比資本主义国家大得不可胜計的損失和破坏，在同一年度內工業生产的水平超过了战前：苏联——4倍，捷克斯洛伐克——2.7倍以上，罗馬尼亞——3.3倍，波蘭——6倍以上，保加利亞——6.5倍以上，民主德国、阿尔巴尼亞、匈牙利和南斯拉夫的工業生产也都有巨大的增長。我国的工業生产約已增長到解放前的3倍。

---

① 列宁全集中譯本第33卷452頁，人民出版社。

② 毛澤东主席在苏联最高苏維埃庆祝十月革命四十周年会議上的講話。

社会主义体系各国經济建設的巨大成就，証明了社会主义是比資本主义远为优越的社会制度。社会主义保証了生产力以資本主义所从来没有过而且也不可能有的速度不断地向前發展，保証了劳动人民的物質和文化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

社会主义之所以比資本主义远为优越，这是因为它是高于資本主义的一种生产方式。社会主义把生产資料私有制消灭了，而代之以生产資料公有制；它把創造一切物質和精神財富的劳动从剝削的桎梏下解放了出来，而使劳动者和生产資料这兩个"生产的因素"从"彼此分离狀态"过渡到了新的高級的互相結合的基础上。①从而，生产的目的也就随之而發生了根本的变化。在劳动者和生产資料"彼此分离狀态"的資本主义制度下，生产的直接目的是資本家通过对雇用劳动的剝削而吸取利潤，而在劳动者以主人翁身分与生产資料互相結合的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的直接目的就只能是为滿足經常增長着的全体劳动者和全社会的需要。由此也就产生了社会主义的决定性的优越性：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給生产力打开了無限广闊的發展前景；而现代資本主义和它的陈旧的生产关系則在步步妨碍着现代生产力的發展。

社会主义国家的国民經济，是在認識、掌握和自覚地运用客观經济規律的基础上有計划地發展的。恩格斯在談到由資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时，曾指出："随着人类成为自己社会关系的主人翁，他們也就以同样程度成为自然界的眞正的及自覚的主人翁。他們自己的社会行动的規律直到现在都是与他們相对立，而成为一种异己的、統治于他們之上的自然規律；现在則为人們所完全自覚地运用起来，因之也就处在他們的統治之下了。"②在社会主义下，对客观經济規律的認識和自覚运用，是在共产党領导之下通过广大人民群众的实踐而發展起来的一种过程。共产党根据馬克思列宁主义理論，并通过实踐，而日益完全地認識和掌握了客观經济規律，并在每一个發展阶段中自覚地把它們具体运用到社会主义建設的各个方面。社会主义体系各国的經济建設的进程，工業化和农業集体化—合作化方針的实施；我国社会主义建設和私营工商業、手工業、农業的社会主义改造方針，以及不久前提出的"在优先發展重工業的基础上，發展工業和农業同时并举"的方針，都是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共产党在認識和掌握了客观經济規律后而在具体条件下自覚地把它們加以运用，以推进社会主义建設的發展的。

国民經济的有計划發展，是廢除了生产資料私有制而代之以生产資料公有制的社会主义所固有的一种完全新的經济發展的形态。它使社会經济的發展，摆脫掉資本主义所絕对不能避免的生产無政府狀态、經济危机、失業現象，以及破坏性的竞爭、寄生現象各种形式的对生产力的破坏和浪費。国民經济有計划的發展，使全国經济得以密切地配合全体劳动人民和全社会的利益而加以發展，使生产力得以均衡地分布，使人力、物力和財力得以节約地、合理地調度、分配和使用，使对全国經济的經营和管理能不断改进而日益趋于完善。

社会主义在同資本主义經济竞賽中必然获得胜利的一个根本性的因素，是社会主义有着远比資本主义增長得快的劳动生产率。列宁曾指示說："在任何社会主义革命中，在已經解决由無产阶級夺取政权的任务以后，随着剝夺剝削者的任务在大体上和基本上得到解决的程度，必然把創造高于資本主义的社会經济制度的根本任务，提到首要地位；这个根本任务就是提高劳动生产率。"③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在它們的經济建設的实踐中，已經达到了比資本主义快得多的劳动生产率的增長速度。例如，苏联工業中的劳动生产率，在1913年到1955年期間增長到了8倍，而在同期内美国則仅增長到2.2倍，英国——1.4倍，法国——1.75倍。苏联在战前十九年(1922年—1940年)和战后十一年(1946年—1956年)的和平建設时期中，工業中的劳动生产率是年年都有提高的；而美国則有八年(1929年—1932年，1934年，1937年—1938年，1949年)劳动率都比上一年度低落。这在实际上証明了馬克思的話："对于資本，增进劳动生产力的規律，并不是無条件适用的。"④

社会劳动生产率，这是一个包涵着許多經济現象和經济过程的概念。提高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斗爭，虽然是以每一个从事于物質生产的劳动者的产量为基础的，但是这一点远没有包括全部。为要达到高度的社会劳动生产率，还有以下的因素在起着作用，如更为合理地分配生产領域和非生产領域之間的劳动力資源，如在經济机構和其他机構的一切环节内节約活劳动和物化劳动，等等。

---

① 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曾指示說，不同的社会經济形态是以劳动者和生产資料的不同的結合方式来区别的。他說："不論生产采取何种社会形态，劳动者与生产資料总是它的因素。但它們在彼此分离狀态中，就只在可能性上是它的因素。为了要有所生产，它們必須互相結合。社会結構的各种不同的經济时代，就是由这种結合依以实行的特殊方法和方式来区别。"("資本論"第二卷20頁，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

② 恩格斯："反杜林論"，366頁。1953年三联書店版。

③ "列宁全集"俄文版第27卷227頁。参看"列宁文选"下册中文版387頁。

④ 参看"資本論"第3卷314頁，1953年人民出版社版。

这些因素，只有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才能充分地体現出来。我們的勤儉建国方針和最近在全国范圍內掀起的下放干部和上山下乡支援农業生产的运动，即可以說明这一点。

在社会主义和資本主义的經济竞賽中的根本問題之一，是积累問題。积累的过程不仅直接影响到扩大再生产的过程，而且也是牽及到社会进步和人民的生活水平。資本主义的积累过程，是完全操縱在資本家們的手中；而他們之所以要进行积累，其动机并不是为了社会的需要，而正如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所指出的，是出于貪婪和为了竞爭。由此就产生了富者愈富和貧者愈貧的兩極化的深刻矛盾；这种矛盾，尤其是在生产規模空前巨大的現代資本主义的条件下，更是显得特别尖銳，其灾害性的后果也就比資本主义發展的任何时期都要求得严重。社会主义的积累，与資本主义相反，是为了提高劳动人民的物質和文化生活水平和全社会的需要，它是社会主义扩大再生产的泉源。社会主义提供了远比資本主义快得多的积累增長的速度，从而也就保証了生产規模的迅速扩大和增長、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和科学、技术的飞躍进步。

随着社会主义扩大再生产的高速度的發展，社会主义体系各国的教育、科学、文化事業的發展規模也就一年比一年地大大扩增起来了。苏联在这一方面已远远超过了資本主义国家。苏联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原子能發电站，制成了世界上第一批噴气式客机，制成了世界上第一批洲际彈道火箭，發射了世界上第一个和第二个人造地球衛星。全世界公認苏联兩次發射人造衛星的成就，开辟了人类征服自然界的新紀元。苏联在科学、技术上的所有这些偉大的成就，"不但是苏联人民的驕傲，而且是全世界無产阶級的驕傲，而且是全人类的驕傲。对此感到不高兴的，只是一些反动派"。①

在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內，科学已眞正成为人們征服自然界的工具，它是为社会主义的和平建設和全体劳动人民的利益服务的。在这些国家里为科学的繁荣和进步建立了一切必要的条件，科学正在大跨步地向前迈进。而在資本主义国家內，科学是为資产阶級服务的、人剝削人的一种工具。現代資本主义，由于它束縛着生产力的發展而使現代科学技术的許多主要方面都没有用来服务于社会进步，而是用于扩軍备战的目标。这不仅使資本主义国家的科学技术發展趋于畸形化，而且阻碍了科学技术的發展。

社会主义所具有的另一个巨大的优越性，在于它不像資本主义世界那样受到經济發展的不平衡性規律的作用所支配，——資本主义世界体系中只能在个别年代和个别国家內有着較高的經济增長的速度，从而表現出了資本主义發展的不平衡性和偏畸性；而在社会主义世界体系中則可以看到所有国家的普遍的和不断的經济高漲和迅快的發展速度。而且，由于社会主义的經济發展規律所賦有的、消除由資本主义遺留下来的各国間不平衡狀态的發展方向，使得社会主义体系中过去在經济上比較落后的国家得到了較高的發展速度。例如，1950年—1955年期間工業發展的每年平均速度：苏联——13.3%，而我国則为24.9%，阿尔巴尼亞——24.2%，罗馬尼亞——15.7%。

社会主义体系各国，在完全平等、互利和体現着無产阶級国际主义原則的同志般互助的基础上，建立了日益扩大的相互間的广泛的經济和文化合作。这对于巩固社会主义各国的經济和政治地位，对于巩固整个社会主义大家庭，起着重要的作用。这对于加强社会主义在同資本主义进行的經济竞賽中的地位，有着重大的意义。

社会主义国家的經济合作和互助，并不排斥同任何資本主义国家發生經济貿易关系；相反的，"社会主义各国同样主張在平等、互利和不干涉內政的基础上全面扩大同一切其他国家的經济和文化联系，只要那些国家也有同样的願望"。②

四十年来社会主义和資本主义竞賽的进程和結果，在事实上証明了社会主义是远比資本主义优越的社会制度，令人信服地証明了社会主义的偉大的生命力。社会主义正在向上發展，而帝国主义却在衰退。由于殖民主义体系的瓦解，帝国主义的陣地已經大大削弱。"現在，世界形势正在进入一个新的轉折点：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陣营的力量，不但在人心归向、人口众多方面，而且在若干最重要的科学技术方面，确定地超过了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陣营的力量。按照毛澤东同志的通俗說法，現在是东風压倒西風，而不是西風压倒东風"。③

社会主义国家在若干产品的数量方面目前虽暫时还少于帝国主义国家，但由于社会主义是世界大势所趋、人心所向的最先进的社会制度，它加上一定的物質力量，这就使我們能够在整个力量对比上占优势。赫魯曉夫同志在庆祝十月革命四十周年的演說中說，在十五年以后，苏联將在按人口平均計算的产量方面超过美国。我国也要在十五年时間內，在鋼鉄和其他重要工業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或者超过老牌資本主义国家英国。到那时候，社会主义陣营將在和平竞賽中把帝国主义陣营更远地抛在后面。

---

① 毛澤东主席在苏联最高苏維埃庆祝十月革命四十周年会議上的講話。

② 引自1957年11月14日到16日在莫斯科召开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議宣言。

③ 1957年11月25日"人民日报"社論"偉大的宣言"。

十五年内赶上英国、超过英国！这是我們的一个远大的目标，我們也一定能够达到这个目标。又勤劳又勇敢的我国劳动人民在共产党領导下所能發揮的力量是無穷無尽的。劳动人民在他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下，已經在他們的坚强不拔的劳动奋斗中，創造了旧中国所完全不能想像的偉大成就。最近五年来，即在第一个五年計划期内，我国工業总产值增長了132.5%，超过了旧中国一百多年的工業發展；而資本主义最發达的美国和英国，在1952年到1956年(1957年的統計数字尚未發表)五年内的工業增長速度，美国为19%，英国为16%。五年来，我国生鉄产量从一百九十万吨增長到了五百九十万吨，平均每年增長25.4%；鋼——从一百三十五万吨增長到了五百二十四万吨，平均每年增長31.2%；煤——从六千三百五十三万吨增長到了一亿二千二百四十四万吨，平均每年增長14%；电——从七十二亿六千万度增長到了一百九十亿零三千万度，平均每年增長21.4%以上。我国工業的这样高的發展速度，是任何資本主义国家在任何时期所从来没有过的。拿英国来說，它历史上从相近于我国1952年的主要工業产品产量的水平提高到相近于我国1957年的水平，就經过了比我国多了几倍的时間，如：英国鋼的产量从一百三十一万吨提高到五百一十一万吨，經历了二十三年；煤的产量从六千二百万吨提高到一亿二千四百万吨，經历了十七年；电力从九十四亿度提高到一百八十六亿度，經历了十一年。

今年起，我国第二个五年計划开始实施了。根据中共"八大"对第二个五年計划建議的輪廓，今后五年内，在現有的基础上，鋼的产量要提高到一千二百万吨，煤要提高到二亿一千万吨，电要提高到四百三十亿度。这些数字，說明了我国今后五年内工業的發展將繼續保持着比任何資本主义国家快得多的速度。再拿英国来說，它从相近于我国1957年的主要工業产品产量的水平提高到相近于我国1962年的水平，經过了比我国多了好几倍的时間，如：它的鋼从五百一十一万吨增加到一千二百万吨，經历了三十三年；煤的产量从一亿二千四百万吨增加到二亿零二百万吨，經历了二十五年；电力从一百八十六亿度增加到四百二十七亿度，經历了十三年。

从上述的我国主要工業产品产量的增長速度和英国的对比中，可以看到資本主义的英国是远远不能与社会主义中国相比拟的，英国是远远落后在我国的速度后面。目前，在鋼鉄和其他重要工業产品的产量方面，我国虽然与英国还存在着相当大的距离；但这些距离，將随着我国蓬勃前进的工業發展速度而一年比一年縮小，到十五年后，我国將毫無疑問地在鋼鉄和其他重要工業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或超过英国。为了要更具体地說明这一点，可以拿我国和英国目前的生鉄和鋼的产量及其增長速度和今后十五年逐年增長速度的展望来作一个对比：1952年到1957年，我国生鉄产量从一百九十万吨增加到了五百九十万吨，每年平均增長速度为25.4%，1957年到1972年如按逐年增長10%計算，則1972年我国生鉄产量將达到二千四百七十七万吨；英国从1941年到1956年的生鉄产量，从七百五十一万吨增長到了一千三百三十八万吨，每年平均增長速度为3.9%，1956年到1972年如按逐年增長3.9%計算，則1972年英国生鉄产量也將达到二千四百七十七万吨。1952年到1957年，我国鋼的产量从一百三十五万吨增長到了五百二十四万吨，年平均增長速度为31.2%，1957年到1972年如逐年增長13.8%計算，則1972年我国鋼的产量將达到三千六百四十六万吨；英国从1941年到1956年的鋼产量，从一千二百五十一万吨增長到了二千零九十九万吨，年平均增長速度为3.5%，1956年到1972年如按逐年增長3.5%計算，則1972年英国的鋼产量也將达到三千六百四十六万吨。从上述的中国和英国鋼鉄产量及增長速度的对比計算中，我們可以明显地看到十五年内赶上或超过英国是完全能够实現的。

自从党提出了在十五年时間内，在鋼鉄和其他重要工業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或超过英国的任务后，立即在全国劳动人民中掀起了汹涌澎湃的劳动高潮，大家都滿怀信心地开始来完成这一个历史任务。我們有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領导，我們有远比資本主义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我們有坚强的决心、充分的力量和乘風破浪、勇往直前的革命干勁，那我們就一定能够在和英国的竞賽中取得光荣的胜利。

* * *

社会主义在苏联的胜利和共产主义建設的迈步前进、中国和其他人民民主国家社会主义建設的輝煌成就，在世界各国工人阶級和劳动人民的广大群众中引起了日益深刻的同情，社会主义在我們时代里已成为大势所趋、人心所向的不移目标了。在这种有利于社会主义、不利于資本主义的情况下，帝国主义資产阶級和我們国内的資产阶級右派分子就竭力地企圖从思想上腐蝕群众、歪曲社会主义、污蔑共产党和馬克思列宁主义。因而我們就必須加强对群众的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坚决反对修正主义和各种形式的机会主义，徹底揭穿帝国主义和国内右派分子破坏社会主义制度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造謠污蔑，坚决在政治上和思想上同右派分子斗爭到底。

关于目前时期大力發展农業的几个問題

丁日初

1957年2月，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講演中指出："我国是一个大农業国，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以上，發展工業必須和發展农業同时并举，工業才有原料和市場，才有可能为建立强大的重工業积累較多的資金。"① 根据毛澤东同志的上述倡議，1957年9、10月間举行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扩大)，就确定了今后我国要实行在优先發展重工業的基础上、發展工業必須和發展农業并举的方針(为使文字簡單起見，以下用"在优先發展重工業的同时必須大力發展农業"来表述这方針)。这是一条更加明确地指明了我国工業化道路的根本性方針，也是一条关系着我国今后的社会主义建設的根本性方針，我們应該很好地学習它，正确地理解它的意义和內容，并为实現这个方針而尽自己的一份力量。

一 当前提出"在优先發展重工業的同时必須大力發展农業"的可能性与必要性

党中央提出了上述方針以后，某些人認为，党中央所以提出这个方針，是为了糾正过去只重視工業"不重視"农業的"錯誤"。这种看法是不正确的，也是不符合事实的。

我們知道，我国是一个經济落后的农業国，在第一个五年計划期間，为了初步建立对国民經济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物質技术基础，为了建立現代化的国防，为了保証人民对于工業品的基本需要，我国集中主要力量进行了以發展国家的重工業为中心环节的社会主义工業化的工作，是完全必要的和完全正确的。現在，我国的第一个五年計划已經完成和超額完成，我国的社会主义工業化的初步基础已經建立。目前，化学肥料工厂的設备，国內已經完全能够制造；农業机械的制造也已有了許多經驗；冶金工業、电力工業、煤炭工業的發展，也为促进农業生产准备了物質条件。这就是說，我国的工業現在已有更多的力量来支援农業了。

但是，党和政府过去也是重視农業的。"第一个五年計划"就曾明确指出，在發展工業的同时，必須相应地發展农業。党和政府在过去五年中，用很大的力量推进了农業的發展，首先是組織、領导了广大农民在全国范圍內基本上实現了农業合作化。据最近的統計，現在已經有97%以上的农戶加入合作社；根据1957年6月的統計，加入高級社的有93%多一点。这就大大地解放了农業生产力，为农業生产的發展开辟了最广闊的道路。在合作化的过程中和基本上实現了合作化之后，国家都花了大量的財力、物力和人力去支援农村的增产运动。五年来，国家对于农業、水利和林業方面的撥款达到75亿元以上，农業貸款累計已达80亿元。国家供应了农村六百几十万吨的化学肥料和大量的农具、水利机械和一部分拖拉机。五年內，我国扩大了耕地面积达7,756.5万亩、复种面积达14,400万亩。在水利方面，国家已經着手根治淮河，开始治理黃河等河流，并且依靠农民的积極性，在国家支援下，五年內增加灌溉面积20,746万亩。此外，在党和政府的动員之下，农民自己用于生产的投資約有一百多亿元。党和政府还領导广大农民积極进行了精耕細作、推广良种和防治病虫害等等。經过这样大的努力，虽然在1954年和1956年遭受了严重的自然灾害，但是农業总产值和粮食总产量还是逐年有所增加的。

总之，由于过去五年內，党和政府集中主要力量發展了重工業，基本上实現了农業合作化，才为今天党提出"在优先發展重工業的同时必須大力發展农業"的方針創造了条件。过去，虽然不可能提出这个方針，但是党仍然用了很大的力量去帮助农民發展农業生产，因此，說党是为了糾正过去"不重視"农業的"錯誤"才提出新的方針是完全不对的。

又有人問道：既然过去党和政府是重視农業的，五年来农業生产也有了相当的發展，为什么現在又有必要提出在优先發展重工業的同时必須大力發展农業呢？我們說，这是因为，在第一个五年計划期間，全国农業生产虽然获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农業發展、尤其是在許多工業原料作物方面，仍然赶不上工業和整个国民經济發展的需要。粮食虽然增产許多，也仍然感到不足。这种情况，特别是在1955年和1957年，使得整个社会主义建設事業都受到了相当的影响。第一个五年計划的实踐証明了

① 毛澤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人民出版社版，第37頁。着重点是引用者加的。

毛主席所說的，在我們这样一个拥有六亿以上的人口、而农民占人口$\frac{5}{6}$以上的农業国的社会主义建設中，农業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根据对于我国經济情况和建設工作經驗的更加深刻的認識，在第二个五年計划即將开始实行的时候，党中央就及时地提出了在优先發展重工業的同时大力發展农業的方針。

現在我們来看一看，第一个五年計划的实踐，怎样証明了农業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設事業有巨大的影响。

首先，第一个五年計划的实踐証明：农業發展的快慢在很大的程度上决定着工業發展以至于整个国民經济發展的速度。为什么农業在我国經济建設中有这样的重要性呢？

第一，几年以来，我国的工業虽然有了很大的發展，它的發展速度要比农業快得多，可是我国还是一个农業国，农業在国民經济中仍然占优势。根据1957年的計划指标計算，在工农業总产值中，工業（包括手工業）約占49.7%，农業（包括副業）約占50.3%，但是如果按净产值（总产值扣除物質消耗）估算，那么农業大約占到$\frac{2}{3}$。因此，农業还是現在我国国民收入的主要来源，它对于增加国家的积累、保障人民的生活，都起着非常重大的作用。

第二，目前在我国工業总产值中，还有將近一半是輕工業。因为我国的重工業还不够發达，它不能为輕工業提供更多的原料；我們又不能从国外購进过多的輕工業原料，以致削减机器設备的进口，影响重工業的建設：因而目前輕工業的原料，約有80%依靠农業来供給。所以，工業生产的增長，特别是輕工業生产的增長，主要决定于农業的增長。例如，由于1956年棉花减产，棉紗的产量1957年計划比上年减少61.1万件，使棉紡織工業的产值將减少14.4亿元，仅此一項，就使全部工業总产值的增長速度降低約2.5%。① 根据有关部門的計算，1957年中我国以农产品为原料的几种主要消費品工業的設备利用率，紡織工業为85%左右，食糖工業为66%左右，榨油工業为75%左右，卷烟工業为52%左右，面粉工業为68%左右，皮革工業为69%左右。② 設备利用率不高的主要原因就是农产原料供应不足。

第三，我国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80%以上，因而农村是工業品的重要市場。据估計，我国輕工業产品有70%以上銷售在农村。重工業产品在农村的銷售量也是很大的。"我国目前大規模的农業技术改革还沒有进行，但是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农村需要重工業品的数量也很大。比如市場供应的重工業品中，供应农村的比重，生鉄占12%以上，煤占50%以上，煤油占80%以上，木材占30%左右，化学肥料和农藥几乎全部供应农村，此外还有大量的农業、水利等机械。"③显而易見，如果农業迅速發展起来，农民的購买力增加了，农業合作社的公共积累增多了，他們就需要更多得多的輕工業品和重工業品，从而大大促进我国輕工業和重工業的發展。

我国工業建設和生产中需要的机器設备、建筑器材和原料，很大部分依靠从外国、首先是从兄弟国家进口，它們約占全部进口貿易額的85%，这些进口物資主要是靠出口农副产品和农副产加工品去交换的。1957年我国出口商品的構成中农产品占40.7%，农副产加工品占27.8%，④而在前几年，它們所占的比重还更大，大約共占到75%左右，可見农、副業的生产，对于出口貿易关系極大。1956年我国自然灾害严重，棉花和油菜籽等减产，且因国内需要日益增長，对外貿易部門就不得不在1957年的出口計划方面，减少了粮食、食油、猪肉、棉紗的出口数量，如粮食比前一年减少54万吨，食用植物油减少10万吨，猪肉和活猪减少85,000吨，棉紗减少12,209件。⑤ 其中仅仅猪肉和活猪的减少，就会使我国少进口几千輛拖拉机。虽然經过对外貿易部門的努力，增加了矿产品、工業品、手工業品和各种小土产的出口，所以1957年仍然保持了相当的出口額，能够适当地滿足国家建設所需要的重要設备、工农業生产的主要原材料和某些市場必需物資的进口，但是，如果我国的农業能够增产，在适当滿足国内市場的需要的同时，可以扩大农产品及农副产加工品的出口数量，那么就能够更有力地支援我国的工業建設，加快我国工業化的速度。

第四，农業的丰歉对国家的財政收入有極大的关系。农業稅是直接受农業的丰歉的影响的。前面講过，农業的丰歉同輕工業生产有極大的关系，当然它在很大的程度上影响輕工業部門的收入。我国供应国内人民生活需要的商品，有80%左右是农产品和农副产加工品，因此农業的丰歉会影响到商業部門的收入。我們已經知道，我国出口物資中，农产品和农副产加工品占的比重很大，所以农業的丰歉又会影响到对外貿易部門的收入。我国鉄路、公路、水路的貨运量中，很大一部分是农产品和农副

---

① 参看薄一波同志作的"关于1956年度国民經济計划的执行結果和1957年度国民經济計划草案的报告"，載1957年7月2日人民日报。

② 資料引自楊波同志作的"試論我国国民收入的分配問題"一文，載經济研究1957年第6期。

③ 資料引自"新华社記者就發展工業必須和發展农業并举問題訪問中央有关部門的負責人"，載1957年11月14日人民日报。

④ 資料引自王迪同志作的"妥善安排出口貿易，积極組織貨源"一文，載1957年10月13日大公报。

⑤ 資料引自叶季壮同志在一屆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議上的發言："談对外貿易"，載新华半月刊1957年16期，第91頁。

产加工品，农業的丰歉既会影响貨运量的增减，当然就要影响运輸部門的收入。据估計，在全部国家的財政收入中，直接和間接依靠农業生产而取得的各項收入，約占当年国家財政收入的55%。农業的丰歉既影响到国家財政收入的多少，就不能不影响到基本建設投資的大小。关于这个問題，我們可以拿1957年国家預算的安排来証明。1957年国家預算收入只比1956年增加1.91%，各項稅收和企業事業收入增長不多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1956年农業生产遭受了灾害。由于1956年某些工業原料作物生产不足，有些輕工業品的生产增長速度下降了，有些輕工業品的产量甚至比上年减少。例如按計划产量，棉紗减产61.1万件，就要减少財政收入三亿多元，估計实际执行中棉紗减产还不只此数。1956年秋征，因为灾荒减免較多，减征細粮約20亿斤，合現款一亿七千万元，影响了1957年的农業稅收入。同时，1956年农業生产遭受了灾害，又是1957年商業、对外貿易等部門的收入比1956年减少的一个主要原因。由于1957年国家預算收入比1956年增長很少，同时也鑒于1956年預算执行的結果是支出大于收入，出現了赤字，所以1957年基本建設投資就比1956年减少了，計划只达到79.37%。①

現在我們进一步再来观察一下1952年到1956年各年度的农業收成对第一个五年計划时期各年度的国民經济主要部門的發展速度的影响。

1952年是丰年，这一年的粮食比1951年增加了387亿斤，棉花比1951年增加了546万担，②这样就給1953年国民經济的迅速發展帶来了極为有利的条件。

1953年是平年，这一年的农副業总产值比1952年增加了3.1%，粮食只比1952年增加了50亿多斤，棉花則比1952年减少了268万担，③因而1954年国民經济的發展速度就比前一年减低了。

1954年是歉年，这一年的农副業总产值虽然比1953年增加了3.3%，粮食作物也比1953年增加了71亿斤，但棉花产量比1953年减少了220万担，因而使1955年国民經济的發展速度受到了相当的影响。

1955年又是丰年，这一年的农副業总产值比1954年增加了7.7%，粮食比1954年增加了288亿斤，棉花比1954年增加了906万担，而且1955年下半年又是农業合作化高潮时期，因此就給1956年国民經济的發展帶来了極为有利的条件。

1956年又是歉年，这一年农副業总产值虽比前一年增加4.9%，粮食比1955年增加了154亿斤，但棉花則比1955年减产了146万担，因而又使1957年国民經济的發展速度受到了相当的影响。

現在，我用下表来說明1952年到1956年各年度的农業收成对下一年度的国民經济主要部門的發展速度的影响。

1953年—1957年国民經济的主要部門發展速度如下：④

部　　門	1953年为上年的%	1954年为上年的%	1955年为上年的%	1956年为上年的%	1957年为上年的%
工業(包括手工業)总产值	131.7	116.7	107.8	131.1	106.9
生产資料生产	136.9	119.8	117.1	141.7	111.9
消費資料生产	128.4	114.5	101.0	122.0	102.2
商業机構零售总額	133.1	112.9	102.3	119.2	101.8
对外貿易进出口总額	136.0	104.5	130.0	缺	91.6
运輸事業貨运量	126.3	125.6	105.1	132.5	缺
基本建設投資額	175.3	115.2	115.1	162.0	79.4

① 資料引自李先念同志作的"关于1956年国家决算和1957年国家預算草案的报告"，載1957年6月30日人民日报。

② 資料引自王光偉同志作的："大力發展农業，加速我国社会主义工業化的过程"一文，載1957年11月10日大公报。

③ 1953—1956年各年度的农副業总产值比前一年增長的百分比数字，和粮食、棉花比前一年增减的絕对数，是引自"国民經济統計提要"。該"提要"收在統計出版社出版的"关于1956年度国民經济計划执行結果的公报"一書中。

④ 这一張表的資料来源如下：1、1953—1956年的工業总产值（包括生产資料生产和消費資料生产）和商業机構零售总額的百分比数字，引自"国民經济統計提要"；运輸事業貨运量和基本建設投資額的百分比数字是根据該"提要"中的絕对数計算出来的；对外貿易进出口总額的百分比数字是引自各年度国民經济計划的执行結果公报（1956年"公报"中沒有对外貿易总額增長的百分比数字，故缺）。2、1957年的工業总产值（包括生产資料生产和消費資料生产）的百分比数字，引自1957年12月31日人民日报第1版；商業机構零售总額的百分比数字，是借用經过估算的社会購买力增長的百分比数字，它可以近似地反映同一个問題，資料来源同第29頁注①；对外貿易进出口总額和基本建設投資額都是計划数字，資料来源同第29頁注①。

以上就是过去几年农業的丰歉对于工業發展以及国民經济其他部門發展所起的影响的大致情况，它也就是党中央現在提出在优先發展重工業的同时必須大力發展农業这个方針的客观根据之一。

其次，第一个五年計划的实踐証明：农業發展的快慢在很大的程度上影响到我国人民的生活。

据初步估計，在第一个五年計划时期的头四年中，全国消費資料的80%都是农产品和农副产加工品，由此可見农業生产对保証全国人民生活的需要有多么大的作用。以1957年与1952年比較，农業及其副業的总产值大約增長25%，①其中粮食产量增長19.8%，即610多亿斤，棉花产量增長25.7%，即670多万担，②这样的增長速度是很高的，因而使人民的生活有可能得到改善。例如：按1957年产量計算，同年全国人民平均占有粮食578斤，比1949年的421斤多157斤；按全国人口平均，1949年每人只有七尺多民用布，而1957年9月—1958年8月的棉布計划供应的第四个年度內，国家保証供应每人一丈以上的民用布。③

但是，1957年职工的平均工資比1952年提高了40%以上，④产業职工总数大約增加了800万人，农民的总收入又大約提高了30%，⑤因为就業的人多了，最大多数人民的收入增加了，所以大家都要求吃得好一些，穿得好一些，以致某些消費品的生产不能滿足广大人民的日益增長的需要，結果常常發生供应緊張的情况。同时，几年以来，我国的人口每年大約增長2.2%，即1300万人左右，超过世界上别的一切国家。我国每年增加的人口所需要的粮食和棉布，再加上每人每年的粮食和棉布的消費水平仅以提高2%計算，那么每年就大約需要增产130亿斤粮食和60万担棉花。⑥此外，国家对于粮食、棉花和其他一部分工業原料作物，在可能的条件下，还要有必要数量的儲备，以調剂歉年之后的生产和消費，減輕社会經济生活的波动。农業生产合作社和社員自己，也要儲存相当的余粮，以备緊急时候的需要。由于以上各种原因，为了逐步提高我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就必須大力發展农業。如果农業得不到进一步的發展，由于人口的增加，人民的生活將不仅不能改善，还有降低的危險。这种情况，就是党中央現在提出在优先發展重工業的同时必須大力發展农業这个方針的客观根据之二。

再次，第一个五年計划的实踐証明：农業的發展对于巩固我国的工农联盟有極大的关系。

关于过渡时期的工农联盟，斯大林同志曾經說过："农民經济是工業的市場，正像工業是农民經济的市場一样。但农民对于我們不仅是市場，而且是工人阶級的同盟者。正因为如此，农民經济的提高，农民的普遍合作化，农民物質生活狀况的改善，是一种前提，沒有它就不能保証我国工業有較大的發展。反过来說，發展工業，生产农業机器和拖拉机，以大量工業品供給农民，又是一种前提，沒有它就不能推进农業。这就是工人阶級和农民的联盟極重要的基础之一。"⑦我国現在的情况是农業落后于工業發展的要求，而农民在我国农業基本上实現合作化以后，生产积極性大大提高，同时也迫切地要求繼續改善生活。虽然以前国家曾經用了很大的力量帮助农民發展生产，但我国的农業生产水平仍然很低，因而解放几年来，虽然"我国农民生活显然提高了很多，但总的說来还是很差的，很多地区还談不上丰衣足食"。⑧1957年春天党开始整風期間，城市中的右派分子和农村中的反对社会主义分子就故意在这个問題上大做文章，說政府一向"不重視"农業生产，"不关心"农民生活，以此来破坏工农联盟。个别农民由于不了解实际情况，也上了他們的当。經过农村中的社会主义教育，上述的謠言已經遭到了破产，广大农民的社会主义覚悟也提高了一大步。但是，教育农民是一件長期的工作，而且要进一步从根本上巩固工农联盟，那么今后国家就必須用更大的力量来領导和帮助农民發展生产，使他們的生活繼續得到改善。只有这样，才能使他們持久地發揮政治积極性，更加坚定地巩固人民民主專政的基础——工农联盟。反之，如果农業得不到迅速的發展，农民的生活得不到繼續不断的改善，广大的农民就会逐漸不滿意工人阶級領导的国家，發展下去，就会十分不利于工农联盟和国家政权的巩固。正如毛主席所指示的："我国有五亿多农業人口，农民的

① 資料引自1958年1月6日人民日报社論："在偉大成就的基础上奋勇前进"。

② 1957年粮食及棉花产量数字見1958年1月1日人民日报社論"乘風破浪"。

③ 1949年全国人民平均占有粮食的数字，引用自时事手册編輯部編写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参考提綱"，載时事手册1957年第21期，第13頁；1957年全国人民平均占有粮食的数字，是按3,700亿斤除以64,000万人口得出来的；1949年全国人民平均占有的民用布数字和1957—1858年度棉布供应数字系引自1957年8月20日人民日报社論："人人都要节約棉布"。

④ 資料引自"国家計划委員会負責人談第一个五年計划执行情况和成就"，載1957年10月1日人民日报。

⑤ 資料引自李富春同志作的"关于我国第一个五年計划的成就和今后社会主义建設的任务方針的报告"，載1957年12月8日人民日报。

⑥ 資料引自"新华社記者就發展工業必須和發展农業并举問題訪問中央有关部門的負責人"，載1957年11月14日人民日报。

⑦ "关于苏联經济狀况和党的政策"，見"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128—129頁。着重点是引用者加的。

⑧ 邓子恢："發揚英雄气概全心全力發展农業生产"，載1957年11月11日人民日报。

情况如何，对于我国經济的發展和政权的巩固，关系極大。"①这种情况，就是党中央現在提出在优先發展重工業的同时必須大力發展农業这个方針的客观根据之三。

总之，現在为了促进整个国民經济、首先是工業的高漲，为了保証全国人民的物質生活得到繼續改善，为了进一步巩固工农联盟和国家政权，我們必須在第二个和第三个五年計划期間用較大的力量来發展农業生产。正如朱德同志所說的："怎样对待發展农業的問題，在目前就成为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設中的一个关鍵性的問題。"②正是从这种情况出發，所以党中央認为有必要向全国人民提出在优先發展重工業的同时必須大力發展农業的方針。

二　克服保守思想，努力实現全国农業發展綱要的增产要求

党中央在提出了在优先發展重工業的同时必須大力發展农業这个方針以后，为了具体地組織农業生产大躍进，根据兩年来情况的变化和工作經驗，把1956年一月份公布的全国农業發展綱要草案加以修改和补充，作为領导全国农民在今后十年內积極奋斗的指針。全国农業發展綱要（修正草案，下同）的中心是增产，因为农業增产了，巩固农業合作化制度才有物質基础，提高农民的物質生活和文化生活才有可靠的保証。"綱要"最重要的是第二条，它首先要求大力增产粮食。因为，粮食生产是农業生产的基础：有了足够的粮食，就不会發生粮食和技术作物爭地的問題，棉花、烤烟、甜菜和油料作物也就可能进一步增产；有了足够的粮食，也就不会發生人、畜爭粮的問題，畜牧業也可以發展得更快。这一条要求，从1956年开始，在十二年內，粮食每亩平均年产量按不同地区分别增加到四百斤、五百斤和八百斤。"这个要求实現以后，根据初步的推算，到1967年，全国的粮食年产量將要达到七千亿斤左右。…… 这样，我国長时間內存在的粮食供应紧張問題，农業發展落后于工業發展的不适应問題，都將要初步地得到解决，同时还可以实現綱要对于合作社和国家关于儲积粮食的要求。"③它又要求把棉花每亩平均年产量按不同地区分别提高到四十斤、六十斤、八十斤和一百斤。"这个指标达到以后，1967年的棉花总产量，据推算將比1955年約增加兩倍"，④即九千多万担。这一条同时提出在优先發展粮食生产的条件下，各地应当發展农業的多种經济，保証国家所規定的紡織原料、油料、糖料、茶叶、烤烟、果类、藥材等項农作物的計划指标，还应当积極地發展其他一切有銷路的經济作物。华南各省有条件的地区，应当注意發展热帶和亞热帶作物。这些要求就是我們奋斗的目标。

同时，我們要了解：全国农業發展綱要所指的农業，是指国民經济当中广义的农業而說的，所以發展农業就包含了發展畜牧業（第三条）、發展山区經济（第十七条）、發展林業（第十八条）、發展漁業（第十九条）、發展农村副業（第二十四条）等等的內容。

全国农業發展綱要所規定的粮食和棉花的增長速度在我国是空前的，在世界上也是少有的；国家对于發展农業的多种經济和畜牧業、林業、漁業的計划也是很大的。那么这些要求和計划能不能达到呢？

应当認識，我国农業生产的發展是存在着不利条件的。耕地不足、自然灾害严重、技术条件落后、开垦荒地的困难較多等等，都是我国农業增产中的不利条件。但是我們同时又有有利的条件。农業合作化的基本实現、第一个五年計划中社会主义工業化的偉大成就，为农業增产創造了有利条件，这是前面已經說过了的。同时，由于以下的一些有利因素，使我国农業經济具有很大的潜在力量。这些有利因素就是：我国一般的自然条件还是比較好的；农村有众多的劳动力；农民勤劳儉朴，有丰富的生产实踐經驗，經过長期的革命斗爭鍛煉，覚悟比較高，最近又經过1957年的全民整風运动，他們的积極性空前高漲；兩年来农業生产合作社的干部已經积累了相当多的經营管理合作社的經驗；和农業有关的广大的干部，經过几年的生产实踐，工作能力、領导水平也有了很大的提高。此外，各級党組織的正确領导，尤其是党中央关于用較大的力量来發展农業的方針已經确定了，党中央和政府准备在今后十年內用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財力来支持农業生产的發展，这又是一項保証农業能够大大發展的重要条件。只要我們足够的估計上述有利的条件，采取各种措施来充分利用它們，并且設法变某些不利条件为有利条件，那么实現"綱要"中的增产要求是完全能够做到的。

过去和現在，在农業战綫上的干部和群众中，有相当普遍而严重的保守思想。他們总是强調不利条件那一面，而忽視有利条件这一面，因而对生产的潜力估計不足。所以目前要組織农業生产大躍进，首先要有思想上的大躍进。这就是說，只有人們克服了保守思想，才会訂出先进的生产規划，坚决貫徹有效的增产措施，达到生产实际上的大躍进。

---

① 毛澤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人民出版社版，第16頁。着重点是引用者加的。

② "朱德副主席号召全党和全体国家干部在农業战綫上鼓足勁前进"，載1957年12月28日人民日报。

③④ 逢先知："关于我国农業發展綱要的几个問題"，載学習杂志1957年22期。

1956年，即全国农業發展綱要草案公布的第一年，全国就有二十九个县、市提前十一年达到了或超过了"綱要"里規定的粮食單位产量指标。1957年，据同年12月份举行的全国农業工作会議的初步統計，已有六十五个县、市的粮食每亩平均产量提前达到"綱要"規定的粮食增产指标，其中有八个县、市的粮食亩产量达到了千斤以上。此外还有四个县在1956年达到指标，1957年因受灾所以没有达到。据十三个省的不完全統計，有25,806个农業社实現了"綱要"的增产指标。棉花产量超过"綱要"最高指标(亩产一百斤皮棉)的，已經有五个县、市。上述提前实現"綱要"的粮食增产指标的地区，有些原来就是富饒高产粮区，有些原来却是貧瘠的低产粮区，有些自然条件較好，有些却遭受了比較严重的自然灾害。这就証明，自然条件較好的地区，經过努力，固然可以实現或提前实現"綱要"的增产要求，就是自然条件較差、甚至遭到自然灾害的地区，只要干部和群众發揮高度的主观能动性，把工作做好，也是可以实現或提前实現"綱要"的增产要求的。因此，当前在农業战綫上的工作同志，首先要克服保守思想，發揚革命精神，根据"綱要"的規定，采取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互相結合的办法，發动群众来討論和制定各省、各县、各乡和各个农業社的、眞正切合实际的規划。这样的規划，对于农業生产的發展將起巨大的推动作用。

三　目前时期为發展农業而采取的几項主要措施

第二个五年計划是实現全国农業發展綱要的关鍵。在第二个五年計划时期，为了促进农業生产大躍进，必須进行一系列的工作。在下面我只簡略地談以下几个主要措施。

第一是运用和巩固农業合作化制度。农業合作社是实現农業發展綱要的基础。只有合作化才能把农村一切劳动力充分地利用起来，实行統一經营、因地种植、精耕細作，改善栽培方法，改进耕作制度，不断地提高單位面积产量。"如果不充分依靠和运用合作化的优越条件，要在一个县的几十万亩耕地上获得平均亩产四百斤、五百斤、八百斤、一千斤的高額产量，是不能想象的事。没有农業合作化，要达到这样的目的固然不可能，实現了农業合作化以后放松了农業社的巩固和改进，要达到这样的目的也不可能。"①因此，"綱要"第一条的內容就是"巩固农業合作化制度"。这一条根据各地的办社經驗，对于如何巩固合作社問題作了总結，提出了巩固合作社的六个条件，就是：保持原来的貧雇农和下中农在合作社的領导成份中的优势；貫澈执行民主办社的方針；貫澈执行勤俭办社的方針；不断扩大再生产，爭取在第二个五年計划时期內，使大多数合作社赶上或者超过当地富裕中农的生产水平和收入水平；合理地处理分配問題，在發展生产的基础上，使合作社的公共积累和社員收入逐年有所增加；加强政治思想工作。这一条的內容，应該認眞地貫澈到办社、整社的工作中去。

第二是增加国家对农業、水利、林業的投資。同时，农業合作社应当把增加的积累大部分用之于發展农業生产。

过去五年內国家在农業、水利和林業方面的基本建設达到38亿元以上，占国家的基本建設投資总額的8%左右。中共"八大"关于第二个五年計划的建議中，曾經提出应該將农業方面的基本建設投資提高到10%左右。在党中央确定了今后大力發展农業的方針以后，这方面的投資比重又有提高。李先念副总理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議上所作的"关于1957年国家預算执行情况和1958年国家預算草案的报告"中告訴我們，1958年的国家預算充分体現着国家大力支援农業的政策。在經济建設方面的投資中，除首先保証重点建設的需要外，着重地增加了农業、水利、化学肥料工業、农業机械工業的投資，同时也适当地增加了与發展农業有关的燃料工業、电力工業的投資。1958年国家預算中用于农業方面的支出大大增加，共有29.4亿元，比去年增長40.78%。此外，国家还通过發放貸款和預購农产品等信用方式对农業进行支援。可以預料，国家对于發展农業的投資的絕对数还將逐年有所增長。

發展农業生产的資金来源，主要还是依靠合作社在保証社員逐年增加收入的基础上逐年扩大公积金。全国农業的总产值，扣除生产費用以后，农業純收入(包括劳动报酬在內)不少于四百亿元，如按社章原来的規定，抽5%到8%的公积金，就有20—32亿元，这比国家預算中的农林水利一年的支出大得多。1958年1月6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員会第90次会議通过，决定对高級农業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第43条关于农業生产合作社所留公积金比例的規定作如下的改变：在生产不断增長的基础上，并且在保証絕大多数社員的收入逐年有所增加的原則下，农業生产合作社全年收入的实物和現金在依照国家的規定納稅并且扣除生产消耗以后，經过社員大会或者社員代表大会討論决定，农業生产合作社所留公积金的比例包括归还到期的基本建設的貸款和投資在內，可以超过8%，經营經济作物的合作社，可以超过12%。如果全国农業生产合作社將公积金比例平均提高1%，就增加

① 1957年12月28日人民日报社論："丰收再丰收，躍进再躍进"。

四亿元的公积金。合作社把大部分积累用于生产，那就是一笔龐大的生产資金。因此，促使各地农業生产合作社注意适当扩大公共积累，是非常必要的。

第三，抓紧几个重大的农業增产措施。

發展农業、林業、畜牧業和漁業，必須采取各种不同的增产措施。这里，只能講一講农業方面的几个帶关鍵性的增产措施問題。

农業增产的办法有兩个：一个是开垦荒地，扩大耕地面积；一个是依靠現有耕地，提高單位面积产量。我国易垦荒地不多，且多在边远地区，垦荒的投資大而收效既小且慢；我国制造拖拉机的工業企業尙在建設之中，而且縱使第一批拖拉机厂建成，一时也还不能大量制造拖拉机：因此垦荒的困难很多。可是，因为我国已有的耕地面积較少，粮食与經济作物爭地的現象日益严重，所以国家又应当有計划地开垦荒地。据估計，今后每年全国爭取开垦一千万亩以上的荒地，是完全有可能的。从上述情况出發，在今后相当时期内，我們必須在进一步巩固农業合作社的基础上，根据全国农業發展綱要的要求，积極地采取各种有效的技术措施，以提高农田的單位面积产量为主，輔之以可能条件下的开荒。

"目前时期發展农業的关鍵，主要是解决水利和肥料問題。而农業机械化問題，也日益提到日程上来。"① 因此，党和政府要抓紧这三个重大的扩大农業生产、增加單位面积产量的措施。

1、兴修水利是全国农業發展綱要提出的增产措施中的第一个措施。毛主席說过，"水利是农業的命脉"。目前我国农業迫切需要解决的是减輕水旱涝灾和扩大灌溉面积，因此必須大力兴修水利，一面除害保产，一面兴利增产。

关于除害保产。有人計算过：仅从1953年到1956年的四年中，全国遭受重灾的面积共达77,600万亩，因灾損失的粮食約750亿斤，棉花將近790万担。在这些灾害中，水灾占57%，旱灾占18%，兩項合計占75%。大力兴修水利，逐步减輕以至消除水旱灾害，就能使我們大大地增加农作物的收获量。

关于兴利增产。目前我国灌溉面积仅占耕地的30%，这个比例是很低的。根据我国农業生产的經驗，旱地改为水田，再加上必要的肥料和耕作技术的改进，每亩平均可增产一倍或更多。只要我們能够先改造兩亿亩旱地为水田，平均每年每亩增产150斤，每年就可以增产大約300亿斤粮食。

为了减少水涝灾害，增加灌溉面积，在第二个五年計划期間，政府將有計划地整治为害严重的河流，兴修一部分中型和少数大型的水利工程。我国河北、山东、河南和苏北、皖北地区有五亿亩土地，一亿六千万人口，又是經济作物区，但是因为常受淮河和海河流域的洪水和內涝灾害，平均亩产不到兩百斤，而且产量很不稳定。"綱要"的增产要求能否实現，关鍵在于这个地区。政府对于这些地区，將要繼續根治淮河，开始根治海河，特别是注意治涝工作。同时，党和政府將要組織农民广泛兴修小型的农田水利。小型水利工程投資少、見效快，而且可以依靠群众的力量举办，因此今后要大力發展。

2、增施肥料是全国农業發展綱要提出的增产措施中的第二个措施。农民常說："庄稼一支花，全靠肥当家。"所以增施肥料是保証农業增产的另一个关鍵性的措施。

化学肥料的肥效高，根据我国农村使用化肥的經驗，每斤氮肥能增产水稻三至五斤，小麦二至三斤，籽棉一斤多；每斤磷肥能增产粮食一斤半，籽棉半斤。我国現在已能自己制造化肥厂的主要設备。第二个五年計划規定要尽力發展化学肥料工業，建設大量的中、小型化学肥料工厂。1958年全国进行建設的限額以上的化学肥料厂就有十七个。李富春同志在工会"八大"会議上的报告中說，我国要爭取到1962年化学肥料产量达到七百万吨左右，即約为1957年的产量的十倍。

但是，我国化学工業基础薄弱，在今后一定时期内化学肥料的增产还不能滿足农業的需要，因此必須广泛發动群众开展积肥运动，利用自然肥料。我国的肥源是很多的，人畜粪便、綠肥水藻等都是丰富的肥源。只要把广大农民动員起来，就可以解决肥料問題。

3.使用农業机械，能够增加农業生产。根据許多拖拉机站的調查，机械耕作的小麦一般每亩可增产二、三十斤，棉花可增产籽棉十五到三十斤，水稻和杂粮可增产四十斤以上；并且机械作業的項目愈多，增产也愈为显著。同时，农業合作化以后，由于复种面积扩大，水利工程增加，耕作愈来愈細致，副業愈来愈多样，农村劳动力不但没有多余，而且日益感到不足。所以，随着农業生产合作社的發展和巩固，农民迫切要求使用新式农具以提高生产力，增加农業生产。据农業部初步統計，目前各地农民要求購买的新式农具共有六十多种、八百万件以上。1958年全国將繼續推广双輪双（單）鏵犁、播种机、收割机等新式农具140万部。国家决定，在第二个五年計划期間，除繼續大量推广現有的各种新式农具外，还將根据各地农業生产的需要，設計和制造更多的新品种新型号的农具，以支援农業生产大躍进。自然，农業机械部門同时还要注意改良現有的旧农具。

（下轉第59頁）

① "朱德副主席号召全党和全体国家干部在农業战綫上鼓足勁前进"，載1957年12月28日人民日报。

我国工業管理体制的偉大改革

汪鴻鼎　謝树森　屠修德

在苏联最高苏維埃第四届第七次会議于1957年5月10日通过了"关于进一步改进管理工業和建設的組織工作的法令"之后，我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員会也在同年11月14日批准了国务院通过的关于改进工業管理、商業管理和財政管理体制的三个規定。它們的內容虽然与苏联的有所不同，但是基本的方向是一致的，特别在工業管理方面都充分地体現了社会主义国家中关于工業管理的列宁式的民主集中制原則，不过由于中苏兩国工業發展的阶段不同，而有不同程度的規定。

我們知道工業管理的必要性是由于工業生产劳动的社会性所决定，特别是現代的大机器工業，分工精細，要求高度而广泛的协作配合，就更不能没有严密的管理，正如馬克思所說"提琴独奏者可以独展其所長，但一个乐队却不能没有一个指揮者"。①但是在資本主义条件下由于生产資料的私有制，工業管理的权限是操在少数壟断資本家手中，其管理的范圍也只能局限于他們自己所經营的企業，国家根本不具有管理工業生产的职能。相反地，在社会主义国家由于生产資料的公有制，社会主义工業成为一个龐大的有机整体，并且是国民經济中的主导部門，这样就使得管理工業成为国家必然的职能。因此，社会主义国家就要制定整个工業的長远發展計划和年度計划，保証各个工業部門在国民經济当中相互协調的發展。还根据計划任务相应地調配劳动力，調配机器設备，調撥資金和原料，使各个工業企業能够充分胜任地完成其計划任务。国家还运用各种經济規律建立了社会主义所独有的經济制度和法令，像按照价值規律制定了經济核算制，根据按劳取酬規律建立了各种工資制度等等，国家通过这些設施来刺激和推动工業生产的發展。特别在我們国家还曾經进行对資本主义工業的社会主义改造，并且到現在为止还正在进行企業的改造和人的改造。主要由于这些原因，社会主义国家就有必要建立一整套的工業管理体系和机構，来承担上述一系列的任务。这种体系和机構还要随着各个时期工業生产的發展和經济情况的改变而有所不同。

列宁發展了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說，根据現代社会的政治經济情况，天才地总結了社会主义建設的实踐，創造了关于管理經济的民主集中制原則。

刘少奇同志說："我們的企業管理制度是高度的集中和高度的民主相結合的制度。一切企業必須服从党和国家的統一領导和統一計划，并且以严格的劳动紀律来保証千百万人的意志和行动的統一；同时又必須充分發揚职工群众的主动性和积極性，發揮群众的监督作用，吸引群众参加企業管理。②这就是我国在工業管理方面民主集中制的傳統，但是在体現这个原則当中，由于不同时期的不同情况，在实踐上是不相同的，我們可以再引用周恩来同志的說明，他說："民主集中制的具体运用，是要根据客观情况的变动而有所不同的。大家知道，过去在进行革命战爭的时期，在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时期，我們对于民主和集中这兩方面比較着重于集中，但是，即使在战爭和革命的时期，集中仍然是建立在广泛民主的基础上的，因为不如此就不能适应战爭的需要，不能保証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到了社会主义革命取得基本胜利以后，我們就有可能进一步扩大民主。近兩年来，在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上，在經济管理工作上，民主的扩大都是很明显的。但是在任何情况下，决不能因为民主的扩大而根本否定集中的領导"。③这几句話辯証地說明了党对民主集中制的正确的运用。

在解放初期由于接收了帝国主义和官僚資本主义的企業，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的国营工業。就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于政务院之下設立了紡織，燃料，輕、重和食品工業等部，受政务院的領导和全国財政經济委員会的指导，但是由于当时各地工業受到反动政权不同程度的破坏，其过去發展情况也不平衡，情况比較复杂，各工業部剛剛成立，情况还不可能全面了解，也还没有取得管理工業的經驗，因此在成立这几个部之后并没有把全国工業立刻管理起来，只有华北工業由中央各工業部直接管理，其他各大行政区的工業由中央委托各大行政区的人民政府（如东北）或軍政委員会管理，在大行政区人民政府或軍政委員会中設立綜合性的工業部，統一管理大区中的各种工業。

嗣后，随着国民經济的恢复和大規模建設的开始，就迫切要求加强經济建設的計划性，要求各个工業部門和企業的联系配合，对工業就要进一步集中領导。特别由于精簡政权的層次，在1952年11月中央决議將原来大

① 資本論第一卷第263頁。（三联版）

② 刘少奇——在工会八大的祝詞。（1957,12,3解放日报）

③ 周恩来——在全国人代一届四次会上政府工作报告第43頁。（人民出版社版）

区人民政府或軍政委員会撤銷，改設行政委員会，其性質也由原来的地方最高行政机关改变成为中央人民政府在地方的代表机关。因之，原来各大行政区的工業部也随之撤銷，改設工業局。其原来所領导的工業分成两个部分：一部分作为国营工業由中央有关工業部直接領导，一部分作为地方国营工業由各大行政区行政委員会下面的工業局領导。这时由于工業建設規模日益扩大，各个工業部各有其生产技术特点，必須深入掌握，具体領导，因而原有各工業部的業务日益繁重，有再进一步分工的必要。除了原有五个部中食品工業部成立不久因为当时業务还不算多曾經撤銷以外，添設了第一机械、第二机械和建筑工程三个部，还成立了国家計划委員会，統一进行計划工作。

在第一个五年計划开始执行以后，由于国民經济發展的突飞猛进，形势要求进一步再加强国家对工業的集中領导，就在1954年中央决定撤銷各大行政区的行政委員会，由中央直接領导各个省市，原屬各大行政区行政委員会的工業局也相繼撤銷，地方国营工業全部由各省市負責管理，中央先后設立地方工業部和第三机械工業部統一領导。以后由于建設規模扩大，出現了許多新的工業部門。为了使領导工作能够更細致更深入，就撤銷了重工業部、燃料工業部、地方工業部和第三机械工業部，新設立了石油、电力、煤炭、冶金、化学、建筑材料、电机制造、食品、水产和森林工業等部。同时为了提高計划工作質量，把年度計划和長远計划的編制分由新成立的国家經济委員会和原有的国家計划委員会掌管。还設立国家技术委員会管理技术發展和改造，設立国家建設委員会管理基本建設工作，还有物資供应总局負責国家物資的統一供应和分配事务。各个工業部都通过專業局对企業加强管理，使其能服从国家的統一計划。

我們这样的工業管理机構，在国民經济恢复时期和第一个五年計划期間改造了旧社会遺留下来支离破碎的工業，并建立起了大量的新的工業，对于工業生产的發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使我們的第一个五年計划能够超額完成。但是近年来由于在第一个五年計划中工業建設的迅速增長和政治經济情况的改变，許多条件变化了，要求对工業管理体制重新加以考慮，这些条件主要的是：(一) 工業和建設單位已大大增加，在第一个五年計划期間已施工的限額以上的單位就有825个以上，限額以下的更多得多，加上原有企業的改建改造，現在全国納入国家計划的国营和公私合营工業企業在六万个以上，各地工業管理的情况就更趋复杂。今后如果將这些为数很多的国营工業仍旧全部由中央各个工業部用一竿子撑到底的方法来管理，就不能应付当前形势的要求。特别由于各地工業的發展，各个企業在本地区之間的协作关系，以及因之而产生的各种經济問題，都需要地方上就地解决。(二) 我們在第一个五年計划当中已經确立了社会主义經济制度，并且建立了社会主义工業化的初步基础，今后我們工業建設的方針是要从六亿人口出發，在优先發展重工業基础上發展工業和發展农業同时并举，在今后的工作中对于城乡劳动和工农生活要統筹兼顧。就是說对于农業要給予較以前更大的注意，使工業和农業起着更好的相互促进和支援的作用，如化学肥料和农業机械以及工業原料等，地方工業特别需要而且也特别可能發揮这种作用。(三) 我們已經并且准备建設許多規模巨大的工業企業，这些企業是建立我国工業完整体系的骨干，但是为了对于国家建設和人民生活的統筹兼顧以及要求投資少收效快，还必須同时建設許多中小型企業，以便尽快地發揮它的投資效果，为社会生产产品。而小型企業的分布特别要着重就地取材和就地供应，它們和地方的关系就更重要。(四) 經过了三年的經济恢复和五年的計划建設，在我們工業企業里先后进行了民主改革和生产改革，建立了各种責任制度和計划管理制度，整頓和制訂了各种技术經济定額，改革了工資制度，健全了財务成本管理制度和統計报表制度，企業的管理水平已大大提高。并且通过了几年来实际工作和各种运动的鍛煉，培养了大批有經驗的管理企業的干部，已經有条件賦予企業較多的权力，来充分發揮企業的行政自主性。(五) 为了發展生产，提高积累，应該就目前企業管理水平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經济核算制，提高企業中的主动性和积極性，适当地改进原有对企業的一切財务管理制度。

因此为了适应目前形势的需要，就要对工業管理的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和主管机关与企業之間的关系重新考慮，来改进工業管理的体制。

在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方面改进的最主要的措施就是原屬中央管理的企業下放到省、自治区和直轄市作为地方企業，輕工業和食品工業大部下放，紡織工業先行小部下放再逐步下放，重工業中除大型企業以及关鍵性的技术复杂的和有关軍事的工業外逐步下放，森林工業除少数外基本全部下放，建筑工業中的土建部分逐步下放。对仍旧由中央各工業部管理的工業也加强地方的領导和监督，并实行中央和地方的双重領导。

在物資供应方面，中央的統配物資和部管物資虽然申請分配办法不变，但是地方有权在中央企業和地方企業所申請分配的物資中在保証国家計划完成的条件下，根据需要的緩急进行企業間数量、品种和使用时間的調剂，对于地方企業和大部中央工業（少数中央特别指定的企業和产品品种除外）所生产的統配和部管物資如果有

了超产，其超产部分可以按一定比例提成自行支配使用。这样既能保証計划的严肃性，又能保持一定的灵活性，对于充分利用物資資源及节約資金都有很大的好处。

在財务方面对于中央下放給地方的企業以及重工業以外中央管理的工業企業，地方政府可以提出全部利潤的二成自行支配，其余八成归中央所得。对人事管理方面也下放一定的权限給地方。这样給地方一定的权力，也就是加給地方一定的責任，使它能够更好地因地制宜，安排本地区的經济生活并积極地推动工業生产和建設的發展。

工業体制的改进也很显著地表現在扩大企業主管人員对企業內部的管理权限上面，把生产計划方面的指令性指标由原来的十二个减少为：(一)主要产品产量，(二)职工总数，(三)工資总額，(四)利潤等四个，其他都作为非指令性指标。計划編制程序也大为簡化，由兩下兩上变为兩下一上，并在年前11月大致确定，保証了計划的及时性和有效性，还規定国家只掌握年度計划，至于季度和月度計划由企業或主管部門自己掌握，保証了一定程度的灵活性。

对企業的財务管理制度主要把过去对利潤的滿收滿付改为国家和企業的全額分成，分成的基数根据各工業部在第一个五年計划期間所实际領取的四項費用（技术組織措施費，新种类产品試制費，劳动保护費，零星購置費），企業奬励基金和百分之四十的超計划利潤三笔收入的总額与該部同一时期实現的上繳利潤按部为單位算出比例，这比例确定后三年不变，每年根据各企業实际所实現的利潤，按比例使用。关于固定資产的管理也适当扩大企業的权限，并扩大企業主管人員对本企業的人事管理权。这样就同时也加重了企業主管人員对企業管理的責任，就更符合于經济核算制的原則，对企業生产經营的發展会起很大的刺激作用。

这种改革有什么好处呢？首先，在对企業的領导上就基本上改变了中央各个工業部远离所屬企業的情况。凡是由地方进行統一安排比較有利的工作，像原材料和产品的供銷組織，产品的成套供应，城市的規划，特别是地区协作組織都可以由地方机关充分發揮其作用。

其次在我們进行建立社会主义工業初步基础的时候，当然应該先抓重点工業和重点企業，主要是較大的中央国营工業。这在过去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因此中央各工業部在管理工作和計划工作上对地方工業就注意得較少。今后在第二个五年計划期間，由于形势的發展，要貫徹中央指示，在社会主义建設工作中执行从六亿人口出發統筹兼顧适当安排的方針，特别在計划工作中要做到全面照顧使大中小企業以及中央工業与地方工業能有适当的配合，就要对地方工業予以更大的注意。由于我国領土辽闊，各地的經济情况不尽相同，就不应該强求一致，中央工業分散在各个地方的也应該根据各地的情况因地制宜来領导。在第一个五年計划之后，各个地方都有許多新的工業出現，就更有必要使地方上能有更多的权力来調节本地区各个工業部門和各个企業之間的經济关系，来充分利用和發揮所有企業的潜在力量。

第三，过去由于工業管理从分散到集中，使得我們在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設上获得巨大的胜利，这是非常必要的。但是由于我国是一个大国，目前新建企業大批投入生产，旧企業也有許多改建扩建完成，使得中央各工業部管理企業的数目大大增加，地区也更为分散。如果仍旧采用过去集中較多的管理办法，一方面中央的工業部对各个企業的問題不可能深入研究，就会發生粗枝大叶和不切实际的指示；另一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束縛了各个單位的創造性和积極性。像中央掌握的計划产品在1956年有四百多种，到1957年就增加到七百多种，而这些品种在我們目前的計划水平看来只有少数是可以全面掌握的，那些对产供銷不易全面掌握而又集中管理的产品，在生产上很容易發生脫节和失調的現象。目前虽然申請分配的系統不变，但是已經授权地方可以就近斟酌情况和緩急，在各个企業之間进行数量品种和使用时間方面的調剂，这就可以适当地解决这个問題。

第四，过去由于企業管理水平还不高，中央对企業的管理就要比較严格，計划指标因而也訂得較多，这是必要的，但是目前就显出它缺乏灵活性，使企業主管人員和地方机关不能及时有效地进行調整。这些指标当中有些是經过仔細調查和精确計算的，正确性比較高；但由于我們的計划和統計制度建立还不久，其中就有些是通过一般估算得来，还沒有十分准确的根据，要把这些指标都作为指令性来頒發，要下面严格执行就發生困难，尤其在假若發生某一时期比例失調的現象时，下面無权变动，一定要經国务院批准，这样就会給国民經济帶来很大的損失。事实上中央掌握全面，可以从整体出發来考虑問題，避免地方和企業处理問題的片面性，这是对的，但是中央距离实际情况較远，对各地方和企業的具体情况不能过細掌握，因此这次下放一部分指标給地方或企業掌握是正确的。如在各种指标中这次国务院規定总产值不作为指令性指标，因为它固然可以表現企業的全部生产成果，但是其中包括很大比重的原材料消耗，如果拿它作为主要考核指标，就可能使企業为了超額完成这个指标而只願生产料重工輕的产品，不願意生产工重料輕的产品，会妨碍企業間的协作，也会妨碍原材料的节約，还会妨碍眞正产

（下轉第45頁）

我国商業管理体制上的一次重大改革

吳智偉　崔燄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組織問題具有着極其重大的国民經济意义。生产关系完全适合于生产力性質这一客观規律，为社会主义生产力的蓬勃發展提供了客观的前提，但要更好地推动社会主义生产力迅速地向前發展，必須从組織上保証能促进生产力向前發展的商業工作在不同时期的政治經济任务的胜利完成，無产阶級的党和国家还需要在这方面进行巨大的組織工作，合理地設置一套完整的統一的商業組織机構。这也是社会主义国家实現管理經济职能的保証。列宁从开始实行無产阶級專政的头几天起就說过："……要有成效地实行管理，除了善于說服民众以外，除了善于在国内战爭中获得胜利以外，还須善于实际地进行組織工作，这是一个最困难的任务，因为这里是要用新方式去組織千百万人生活上最深刻的經济基础"。①赫魯曉夫同志也曾在"关于进一步改进管理工業和建設的組織工作"报告中說过："在社会主义国家中正确地組織国民經济的管理工作，对于不断扩大物質生产，巩固国家經济实力，提高社会劳动生产率，提高人民的福利以及更充分地利用国民經济中的潜力，是有莫大意义的。因此經济建設問題，管理各国民經济部門的問題一向是共产党和苏联政府注意的中心。"②我們的党和政府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党和政府一样，十分重視这一中心問題，在我們党和政府的許多負責同志的报告里都曾多次地談到这一問題。刘少奇同志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員会向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所作的政治报告中曾說过："为了大大地發展我国的已經开始的社会主义建設并且澈底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我們必須繼續加强人民民主專政，繼續改进国家工作，……""我們必須認眞地、有系統地改善国家机关，精簡它們的組織机構。"周恩来同志在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关于發展国民經济的第二个五年計划的建議报告中也專門談到改进国家行政体制的問題。就以这次商業管理体制的改革来說，自从毛主席1956年在关于調动一切力量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报告中提出中央和地方的关系这个問題后，曾开过一系列的会議，不久前党的三中全会也專門作了研究。国务院在1956年的5月到8月曾召开过全国体制会議，对改进国家行政体制問題进行了討論，并且提出了关于改进国家行政体制的决議草案。第七届商業厅局長会議根据国家在对农業、手工業、資本主义工商業改造基本完成后国内市場出現的新情况，以及国务院"关于改进国家行政体制的决定"（草案）和"关于調整若干商業部門經营分工的决定"，研究草拟了"关于改进商業部系統組織机構設置和領导关系的意見"（草案），并呈請国务院批准在各省选县进行試点工作。第八届商業厅局長会議又根据試点經驗，重新作了修改。最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員会1957年11月14日第八十四次会議批准了国务院通过的"关于改进商業管理体制的規定"，从1958年1月1日起开始执行。这是我国商業管理体制方面一次重大的改革，这不仅說明党和政府十分重視这一中心問題，并且也体現了党和政府能够依据客观經济發展的要求及时而愼重地改进管理体制。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就成立了貿易部，它是国营商業的最高領导机关。但解放初期全国在商業方面虽有統一的方針政策，但未建立組織制度上的統一領导，仍以大行政区为單位分散地进行經营。在国民經济恢复时期和国家开始有計划的經济建設时期，商業工作的主要任务是：稳定市場物价，与投机商人作斗爭，保証市場供应，貫澈对資本主义工商業的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促进工农業生产發展。由于以大行政区为單位分散經营，独立与投机商作战，物資不雄厚，力量不集中，因此产生了組織領导和要完成的任务之間的矛盾，在稳定市場物价方面不能起到应有的作用，市場物价一年中發生四次較大的全国性的波动。依据当时商業工作所負的政治經济任务的要求，根据1950年3月原政务院关于統一国家財政經济工作的决定和关于統一全国国营貿易实施办法的决定，建立了大行政区貿易部、省（市）商業厅（局）、專署工商科和县（市）工商科，这样一套全国商業行政管理系統；同时也建立了若干全国性專業公司形式的業务机構，經营重要商品，如粮食、花紗布、百貨、鹽業、煤建、土产和工業器材等，并按需要在全国各地設置分支机構，形成全国統一的国营商業系統，在中央与地方双重領导下，实行統一管理和統一經营。1953年国内政治經济条件和市場情况發生了重要的变化，全国土地改革基本完成，工农業生产已經恢复，財政收支已平衡，物价稳定，1953年建立了采購供应站和核定各級企業的資金，逐步推行經济核算制，但專業公司業务系統的組織形式和領导关系基本未变，这一組織形式在保証上述商業工作的主要任务的完成上是起了很大作用的。

① "列宁文选"（兩卷集）莫斯科中文版第二卷第375頁。

② "新华半月刊"1957年第九号149頁"关于进一步改进管理工業和建設的組織工作"。

1956年初，由于国家对农業、手工業、資本主义工商業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統一的社会主义市場形成了。由于国内政治經济情况發生了重大的变革，商業工作所負的任务也随之而改变，这时商業的主要任务是：做好商品分配工作，供应人民消費需要，稳定市場物价，促进生产發展。由于全国市場是統一的，而我們国家是一个大国，商業組織机構的分布又是極为广泛而分散的，各地情况又各不相同，这就要求必須在国家統一領导、統一計划下因地制宜，因事制宜，充分依靠各級党政的領导和广大职工群众的积極性，才能适应不同地区的不同情况，把商業工作做好。因此又产生了專業公司系統的組織形式与因地制宜的矛盾，主要表現在不利于充分發揮地方党政对企業的領导作用，不利于因地制宜和合理地設置机構，須要加以改进。

專業公司的組織形式与因地制宜的矛盾就决定了此次商業体制改革的基本內容，必然是改变專業公司系統的組織形式和領导关系，把商業企業的領导統一到各級商業行政部門中，实行分級管理。为了便于說明此次的商業体制改革，簡單地將改革前后的組織形式列表于下，进行对比。

改革前：商業部——省(市)商業厅(局)——县(市)商業局
　　專業总公司——省(市)公司——县(市)公司

改革后：商業部——省(市)商業厅(局)——县(市)商業局
　　專業局　　專業处(公司)　　經理部(公司)

从改革前后的兩个簡單的組織系統圖表看来，好像改革不大，只是各級公司名称改成了專業局、处和經理部，專業局、处和經理部之間少了一条綫，实际上組織体系改革前后有了重大的变化。

首先，各專業总公司改組設立專業局，各省(自治区)商業厅在原有的各專業省(区)公司与厅內業务处的基础上，根据本省具体情况和工作要求，参照商業部各專業局的設置，分别設置專業处，县公司改組設立經理部。業务系統的双重領导改变了：改革前各級專業公司除受当地商業行政部門領导外，还受上級公司的領导；改革后，基本上改变了專業公司系統的組織形式和領导关系，各級企業由各該級商業行政部門直接領导，实行分級管理。同时，划分中央主管的企業和地方主管的企業，分别实行以中央領导为主或以地方領导为主的双重領导的管理方法。

其次，改革后的專業局、处的業务范圍和以前的总公司、省公司不同了。以前的总公司、省公司下面还領导着許多下級的省(市)、县公司，現在的專業局并不直接領导省(市)專業处(市公司)、省專業处也不直接領导县經理部。

再次，商業行政部門的性質改变了。改革前，商業部、省(市)商業厅(局)、县(市)商業局是單純的商業行政管理机構，而改革后，則不仅是商業行政管理机構，也是企業的管理机構，商業行政机構和企業管理机構合而为一。

总的来說，此次体制改革是將过去从專業总公司到县公司这一条綫的業务条条領导关系改为統一到各級商業行政部門，实行塊塊的分級管理。商業行政部門，从商業部到县(市)商業局这一条綫的領导仍然保留。

解放以来，国营商業的职权划分和組織領导，也即是国家商業管理体制的变化，是从以大行政区为單位的分散經营到1950年的統一管理、統一經营，又从1950年的統一管理、統一經营到1953年全系統地推行經济核算制和此次1958年的商業管理体制的重大改革，这一变化过程是管理职权由分散走向集中，又由集中走向分散的發展过程。

可能有人怀疑这样的發展是不是符合客观要求。管理职权既然又要从集中走向分散，那么1950年的集中領导是不是必要的，專業公司組織形式与企業双重領导是不是錯了呢？正如商業工作报社論所指出的：在1956年前，国家对农業、手工業、資本主义工商業的社会主义改造尙未完成，社会主义統一市場尙未形成，国营商業要貫徹对資本主义工商業的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要稳定市場并与投机商業作斗爭，为了統一作战，需要較高度的集中領导。同时社会主义商業部門之間的分工（包括一个貿易部發展成为粮食、商業、对外貿易、城市服务四个部，以及国营商業与供銷合作社之間的分工），到1956年底才較臻于完善，而我們全国性的商業工作历史只有七年，情况是逐漸了解的，經驗是逐漸积累的，在部少、任务重、情况不了解、工作無經驗的情况下，采取專業公司的組織形式与企業双重領导关系，使公司担負着一个方面的任务，在統一領导下摸索前进是必要的。事实証明，在完成商業工作任务方面，它是起了很大作用的。

也可能有人問道：既然統一領导必要，那为什么管理职权又要由集中走向分散呢？是不是又走回头路了？从而認为这次体制改革是不必要的，这是由于他們对商業的組織形式和領导关系必須与每一时期的政治經济情况以及根据政治經济情况决定的国营商業的基本任务相适应，不适应就要發生矛盾这一商業机構設置的根本原理了解不够。不仅是社会主义統一市場已經形成的現在，專業公司組織形式与發揮地方党政机关的积極性和因地制宜地設置机構有矛盾，需要改进体制，同时，近几年来，商業部通过各專業公司所屬的采購供应站，已經把主要工業品絕大部分貨源掌握起来，国家商業各部門分工已較細，商業部的業务范圍已較前縮小，这也是我們能够实施机構改革的重要条件，这一次的走向分散和1950年3

月以前以大行政区为單位分散經营的性質也是不同的。1950年3月以前的分散經营是由于当时还不具备統一領导的条件，而这一次的分級管理是为了在中央統一領导下更好地發揮地方和企業的积極性的，虽然同是管理职权分散，但这兩次的分散并不是簡單的循环重复，这一次的分散对上一次的分散来說是高一級的分散，是在統一領导的基础上的分級管理。

此次商業組織机構和領导关系的改革的原則是：

(一)保証国家对商業工作的統一領导和統一計划。这一原則是由以生产資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本質所决定的，它要求国家必須对国民經济实行有計划的集中領导，只有对国民經济实行集中領导，指导国民經济有計划地發展，社会主义經济的不断高漲才有保証，才可使党和政府能統一經济發展的目标和步調，最合理地利用我国的生产資源，把这些資源用来解决国民經济中最重大的任务。同資本主义下竞爭和生产無政府狀态相比，国民經济的集中計划管理乃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一个根本优越性。

(二)符合国家改进行政体制的原則，旣便于中央对商業工作的統一領导，又便于地方加强对当地商業工作的直接領导、發揮地方积極性。这一原則是此次体制改革总的精神所在，此次体制改革的总的精神是把一部分商業管理的权力，下放給地方行政机关，以便进一步發揮地方的主动性和积極性，因地制宜地完成国家的統一計划。

上述兩項原則，实际上就是集权和分权的問題，也就是民主和集中的問題。在社会主义下二者不可偏廢，正如人民日报社論所指出的：社会主义国家集权和分权的問題，实际上就是民主和集中的問題，是怎样更好为人民服务的問題，只强調集中，不强調民主，容易脫离群众，脫离实际，造成官僚主义；只强調民主，不强調集中，就会帶来極端民主化，容易發展本位主义、片面性，造成自由散漫、無紀律、無秩序的現象。因此社会主义国家解决集权和分权問題，也就是更好地貫徹民主集中制，在民主的基础上集中，在集中指导下發揚民主的問題。

八年来，我們的国家正是遵循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則，来解决集权和分权的問題的。实行民主集中制，在建国之初的共同綱領上，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上，都有明文規定，应該說，这个制度是被中央和地方普遍遵守了的。

八年来由于民主集中制的貫徹，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一直是正常的、健康的。但也应該承認，过去几年在商業管理上，比較起来，集中是比較多的，这种比較多的集中在当时是正确的，是同当时的政治經济情况和商業任务相适应的。但是我們国家是一个大国，各地的自然情况不同，經济基础不同，許多事情是很难强求一致的，事不分大小都由中央来管是不行的，所以須要充分發揮地方积極性。

(三)符合国家精簡編制与增产节約的原則、有利于商品流轉与經济核算。这也是社会主义机構設置所特有的原則。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之一就是它已摆脫像資本主义制度下竞爭和生产無政府狀态所引起的那种机構設置上的巨大浪費，社会主义国家国民經济有計划發展为合理設置机構提供了前提，但要使机構的設置能符合增产节約的原則和經济核算，还須要党和国家进行巨大的組織工作，这也是社会主义国家經济組織职能根本任务之一。

(四)适应商品采購的需要和消費者購买的方便。商業的基本任务是为生产为消費服务，因此商業机構的設置必須能保証此項任务的順利完成，这是設置商業机構的根本目的所在，这也是商業机構設置所特有的原則。

总的来說，商業机構的設置不仅要符合于社会主义国家其他国民經济部門所共有的机構設置的原則，保証民主集中制在經济領域中的貫徹，符合增产节約的原則，并須符合商業机構設置上所特有的原則，能保証商業基本任务的完成。上述四个商業机構設置的原則是統一的，不可强調或忽視其中任何一个原則，否則机構就不能完成它应完成的任务，因此設置机構时，必須統一地加以考虑和运用。此次商業管理体制的改革是一次重大的改革，它是具有很大的国民經济意义的，它从根本上为改进商業工作創造了有利条件。

首先，能更充分地發揮地方的积極性。

根据1955年統計(資料来自"統計工作通訊"1956年十八期)，国营批發机構七万二千个、零售机構七万一千个，在这次体制改革后，其中絕大部分机構，除中央各商業部門設在生产集中的城市或者口岸的采購供应站(一級站、大型冷藏庫、倉庫)实行以中央各商業部門的領导为主外，都要交給地方直接領导，改变了过去主要由总公司領导的关系，这样可大大加强地方党政对商業工作的直接領导。此外，此次体制改革也相应地改进了許多制度，在計划方面，允許地方在收購計划和銷售計划总数的执行中有百分之五以上或下的机动幅度，也下放一些价格管理权限，并規定中央各商業部門的企業利潤，实行与地方定額分成，中央各商業部門的企業利潤，都和地方实行二八分成，就是以利潤中的百分之二十归地方，百分之八十归中央。这些职权下放和使地方的業务經营成果和本身的財务情况密切地結合起来，这都將会大大地促进地方業务經营的主动性和积極性。

其次，能加强中央的領导。

此次体制改革，下放了許多职权，表面看来是地方权限扩大了，削弱了集中領导，实际上恰恰是加强了集中。

体制改革后，中央可摆脫許多事务性的工作，可加强对方針政策与全国統一制度的制定、長期計划与年度計划的制定并监督檢查其执行、商品在全国范圍內的平衡分配与掌握調度、督促檢查工作、总結交流經驗等帶有原則性的重大工作的領导。体制改革后，商業部所屬專業局只領导一級站，而不再領导省（市）專業处（公司）、县（市）經理部（公司），这样專業局就可集中力量加强对一級站的領导，而一級站是主管主要商品在全国范圍內的平衡分配工作的机構，因此專業局加强对一級站的領导也是中央領导加强的一个重要方面。

再次，可以精簡机構。

体制改革后，專業局、省專業处和县經理部不仅是業务管理机構，同时也是商業部、商業厅、县商業局內部的組成部分，一个职能部門，因此可减少管理机構和管理环节。此外体制改革后專業处、市公司、县經理部不再需要像以往那样依据專業公司業务系統条条地設置机構，而是因地制宜地按照地区特点和实际需要設置業务机構，因此業务机構也可得到精簡，如河北省束鹿县商業体制改革試点中將原有百貨、文化用品、石油等七个县公司适当合并改組为五个县經理部，精簡人員数达23.91%。

再次，可提高工作效率，克服官僚主义。

体制改革后，随着組織形式的改变相应地拟定了新制度，对原来过于复杂不切实际的办法、指标、表格、商品目录，都作了很大的修改和簡化，如計划制度在商業部系統內部一直是維持着商業行政部門和商業企業部門双綫上报下达的程序，而新的計划制度因取消了專業公司系統的領导关系，地方主管企業改由县商業局——商業厅——商業部的程序單綫上报下达，中央主管企業是双綫上报，單綫下达。新制度規定的計划表格比原来制度簡化了一半，1957年九种計划共有計划表四十張，新制度减为二十張。这些都大大地簡化了制度，提高了工作效率。此外体制改革后，不仅企業領导單一，企業有主要的領导者，是中央或是地方，上下职責分明，而且領导接近企業，为領导更切合实际、更具体化創造条件，这都有利于克服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

再次，为解决人民內部矛盾創造了有利条件。在鳴放中，各地商業部門对商業部和專業总公司，消費者对商業部門都提出了不少的有益意見，其中反映出領导和被領导之間的矛盾、中央和地方职权的矛盾、消費者和商業部門之間的矛盾等。其中有些矛盾是和商業体制設置有关的，如有人提意見說："商業部在安排部署工作中，方針左右摇摆，措施不够明确。"体制改革后，商業部摆脫事务性工作后，可加强对方針政策的研究和貫澈，这將有利于商業部工作的改进，有利于更好地完成商業任务。此次商業体制改革是一次重大的改革，我們認为还須注意下列問題，这也是体制改革后新情况对工作的新要求。

第一、中央不能放松領导。此次体制改革，目的是为了發揮地方积極性，更好地完成統一的国家計划，并不是为了减輕中央的領导。相反地，职权下放后，为了使全国各地商業工作能够协調、配合，更須加强綜合平衡工作。正如人民日报社論所指出的：不要以为权力下放了，中央有关的主管部門就可以完全撒手不管了。在职权下放的同时，必須更加加强綜合平衡的工作，有关的綜合部門、計划部門和中央各業务主管部門必須适应管理体制的改变，改进自已的領导方法和業务重点，着重綜合平衡工作和有关方針政策的指导，使地方能够在一定的范圍內，因地制宜地决定問題，而又不至影响整体和全面的平衡。

第二、防止本位主义和局部观点的产生。此次体制改革，职权下放，是为了發揮地方积極性，决不是为了各自为政，独搞一套。正如人民日报社論所指出的：地方負責同志和企業主管人員也应当更多地注意处处从整体出發，照顧全局，注意克服可能出現的本位主义情緒和局部观点，以免削弱社会主义計划經济。我們的国家是社会主义的国家，我們的建設是有計划的建設，我們的計划是建立在綜合平衡的基础上的，沒有全局的、整体的平衡，就不是有計划的經济，就会造成很大的浪費。

第三、正确估計此次商業体制改革的作用。过去商業工作有很大的成績，但其中也存在一些矛盾和問題，其中有些問題是直接与商業体制有关的，也有些問題是間接与体制有关的，也有一些問題是与体制無关的，因此我們既不能把体制改革前的商業工作中的所有問題都归咎于体制的关系，因而也不能要求此次体制改革能解决商業部門工作上所有的問題。此次体制改革只为解决与其有关的問題提供了有利条件，因此要做好商業工作还有賴于全体商業工作人員的努力。体制改革后的工作是一項新的工作，尤其是地方商業机構更須了解这一体制改革后所要出現的新情况，努力改进工作。正如人民日报社論所指出的：过去一些可以由上級决定的事，現在要由自己来决定了，必須兢兢業業，認眞学習，胜任愉快地把責任担当起来，把工作进行得比过去更好。現在我国正处在經济建設第二个五年計划的开始时期，一个社会主义生产的新的高潮正在日益形成中。正如人民日报社論中所指出的，在这种情况下，改进管理体制，無疑給了地方迎接生产高潮、組織生产高潮以很大的助力。地方的党組織和政府組織，有的是有这方面的經驗的，有的还缺乏这方面的經驗，这就需要立即行动起来，認眞研究本地区的經济情况，正确地运用下放的权力，組織广大群众因地制宜地、更好地完成国家統一的社会主义建設計划。

改进财政管理体制的重大意义

李民立

一

我国發展国民經济的第一个五年計划，在中国共产党的領导和全国人民的努力下，取得了偉大的成就，完成和超額完成了各項計划指标。在第一个五年計划胜利完成的基础上，从1958年起，又开始了發展国民經济的第二个五年計划。第二个五年計划期間国民經济的發展，应当"貫徹执行党中央提出的，在优先發展重工業的基础上，發展工業和發展农業同时并举的方針"①，我国第二个五年計划时期的經济建設，必須繼續优先發展重工業，建立起社会主义工業化的巩固基础，但同时也要充分注意农業的發展，以更好地适应人民生活和国家建設的需要。我国第一个五年計划的規模是很宏偉的，在五年內全国經济建設和文化建設的支出总数預計达到七百七十六亿四千万元，即將开始的第二个五年計划的規模又远較前五年为大。这里財政工作就担負了重大的任务，它必須为第二个五年計划时期的建設充分地积聚資金以及保証建設資金合理和有效地使用，同时也要通过加强財政管理监督，来促进企業、机关改善組織管理，厉行节約，充分發掘潜力。而財政工作要完成这样的任务就必須依据于一个与新情况相适应的健全的財政管理制度。

我們知道，健全的財政制度，是保証財政工作正常进行的重要依据。制度合理，就能够充分發揮各方面的积極性，更好地推动增产节約，促进建設資金的积累。反之，就会影响各方面的积極性，不利于工作的进一步开展。我国現行的財政制度，有的原来是有一些缺点的；有的原来适用，現在客观情况有了变化不适用了。現行的財政管理体制，过去是适用的，但随着形势的变化則需要加以修改。因此，国务院于1957年11月15日發布了改进財政管理体制的命令，并規定于1958年起施行。新的办法施行以后，將对于进一步推动社会主义建設事業，發生深远的影响。

二

为了更清楚地說明我国目前財政管理体制方面的情况，这里我們首先簡單談一点几年来財政管理制度的沿革。

全国解放之初，为了克服財政困难，适应当时的形势需要，就曾在1950年实行了財政收支的統一管理，把国家的主要收入都集中于中央。統一財政收支的管理以后，地方是有很多不便的，机动性很小。但是，在国家財政严重困难的时候，地方应該忍受一时的不便，照顧全局，使中央能集中財力，完成保証革命战爭的供給，恢复国民經济，平衡財政收支，稳定市場物价等最迫切的任务。

到了1951年，情况有了改变，国家財政經济初步好轉。我国地大物博，不可能事事都由中央办理，应該設置各級地方財政，以适应各地区的具体情况，因地制宜地进行管理。因此，1951年，又規定我国財政工作实行"統一領导、分級管理"的方針，实行三級財政制，即：中央、大行政区和省（市）三級，大行政区級和省（市）級財政統称为地方財政，同时也划分了中央和地方的財政收支。1953年，随着大行政区一級政权的取消，財政級别的組成也有所变动，但是几年来在財政工作上則一直执行着"統一領导，分級管理"的方針。

我国各級財政的职权范圍，从1951年实行統一領导分級管理的方針以后，虽然曾經作了划分，但是随着社会主义建設事業的發展和社会主义改造事業的胜利，就显得与当前的形势不相适应了。一般說，过去在財政管理上的集中是比較多的，中央管得过多过細，地方財政的职权范圍还不够明确。这样就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地方机关在管理財政上的积極性和主动性。

我們知道，地方財政是国家財政的重要組成部分。过去几年来，国家財政收入的60%左右要由地方收进，国家財政支出的26—29%要由地方支出，在今后的社会主义建設中，地方財政的作用將比以往时期更为重要。关于第二个五年計划时期的經济建設，党中央提出了在优先發展重工業的基础上，实行發展工業和發展农業同时并举的方針，对工業的發展，又确定了大、中、小型企業相結合的方針。这就要求地方大力發展农業，和兴办中小型企業。很显然，如果不适当地扩大地方的財政管理权限，地方發展这些事業是会有困难的。

这里也必需指出，虽然我們說今后应該适当地扩大地方財政的职权，但是也并不是說，过去財政管理上的較多集中是錯誤的。应該認識到过去比較多的集中，是和当时国家的政治經济情况相适应的。比方說，在全国解放初期，要克服財政困难，稳定物价，就必需有比較多的集

① 李富春：关于我国第一个五年計划的成就和今后社会主义建設的任务、方針的报告，人民日报1957年12月7日。

中。从1953年开始进行大規模的經济建設，需要集中有限的財力、物力，这也需要比較多的集中。所以，过去在財政管理上比較多的集中完全是正确的，也是必要的。但是，就目前来說，情况已經有了变化，比較多的集中就使財政管理体制上存在着如下一些問題。

首先，地方財政还沒有能够实現本身政治經济任务的独立收入来源，地方不能根据收入安排支出。根据国家財政分級管理的原則，地方应該有自己的收支体系，应該以自己的独立收入，来滿足本身支出的需要。过去划給地方財政的收入有三类：(1)固定收入：包括地方管理的地方国营企業收入、公私合营企業收入和地方稅收；(2)固定比例分成收入：包括工商業营業稅、工商業所得稅和农業稅；(3)調剂分成收入：包括商品流通稅和貨物稅。以上第一类收入全部固定进入地方預算，第二类收入以一定的比例划給地方，而第三类調剂分成收入則根据地方財政收支的差額，由中央以商、貨兩稅加以調剂。以上收入的划分是符合我国財政分級管理的原則的。但是問題在于：地方的固定收入占地方支出中的比例不大，而固定比例分成收入和調剂分成收入的分成比例，又年年变动。地方支出每年由中央确定，然后再根据支出相应地划給收入，决定分成比例。地方在編制預算草案时心中是無数的，無法測知本地区可以有多少收入用来安排支出。因此，地方財政虽然是一級独立的財政，但是权限和机动力量很小，不能很好地統筹安排收支，因地制宜。

其次，由于地方收支主要是由中央确定的，地方不負責平衡，所以有些地方編制的預算草案报到中央以后往往要討价还价，反复磋商，并且必須等全国各地預算匯齐全面平衡以后，才能核定。因此，时間就拖得很久，使地方很难及时把預算提交同級人民代表大会审查和批准，个别地方到九月份甚至更晚的时候才能把預算提交人民代表大会。

再次，对地方預算执行过程中的超收和节約缺乏妥善的处理办法。地方預算执行中的超收和节約，在制度上允許地方安排使用，但是在使用的范圍上則有比較严格的限制，以致地方多收了，不能多支，节約下来的資金也很难安排其他用途。相反地，只要預算批准，少收也不妨碍多支。这样就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地方积極性的發揮。

另外，过去对地方預算年終結余的处理上也存在着問題。在1953年以前对地方年終結余采取"年終一刀砍"的办法，地方結余完全收归国家預算。1954年以后又采取了"限制使用，分期使用，列入預算抵充撥款"的办法，地方仍很难安排使用。"每年在全国財政会議上均要扯皮，地方要留，中央要交，結果是上交一部分，留地方一部分"。① 地方年終結余上交中央，虽然可以使国家集中建設資金，进行重点建設，但是同时也容易造成地方在年終前突击花錢，浪費資金的情形。

以上在財政管理体制上所存在的这些問題，对于發揮地方机关管理財政的积極性和主动性当然是不利的，不能鼓励地方机关發掘新的收入来源和更节約更合理的使用資金。

三

鑒于过去財政管理体制上所存在的問題，国务院于11月15日就發布了关于改进財政管理体制規定的命令。此項規定的主要內容就是："明确划分地方財政的收支范圍，适当地扩大地方管理財政的权限，并且在保証国家重点建設的前提下增加地方的机动財力，从而进一步發揮各地方积累資金、增加收入、节約支出的积極性，推动建設事業的發展"②。

下面我們預备根据改进財政管理体制規定的具体內容，分几个方面来談一談这个新办法的优点。

第一，明确划分了地方財政的收支范圍，地方有了可以滿足本身正常支出需要的独立收入来源。

前面我們曾經提到，过去地方財政沒有能够实現本身政治經济任务的独立收入来源，新規定对此作了改进，明确划分了地方財政的收支范圍。

今后地方的財政收入有三类。第一类是地方的固定收入，其中包括地方原有企業的收入、地方事業收入、七种地方稅收(印花稅、利息所得稅、屠宰稅、牲畜交易稅、城市房地产稅、文化娛乐稅、車船使用牌照稅)和地方其他零星收入，这些收入全部划給地方，不在中央和地方之間进行分配。第二类是企業分成收入，其中包括中央新下放企業和虽未下放但地方参与分成的企業，这些企業的利潤一律按20%划給所在省、市作为地方收入(如輕工、食品、紡織、重工和森林等工業部，以及交通部、商業部所屬的一些企業下放由地方管理，企業利潤实行地方和中央的二八分成，其他有些企業虽未下放地方管理，但企業利潤也与地方二八分成)。第三类是調剂分成收入，其中包括：商品流通稅、貨物稅、工商業营業稅、工商業所得稅、农業稅和公債收入等六項。調剂分成收入划給地方的比例根据各地平衡收支的具体需要，計算确定。

以上三类收入中，固定收入可以滿足正常支出需要的，不再划給其他收入，收入如超过支出，多余部分按一

① 胡子明：关于地方預算中几个問題的商榷，財政1957年第8期。

② 国务院关于改进財政管理体制的規定，人民日报1957年11月18日。

定比例上交中央。如地方固定收入不能滿足正常支出的需要，就再划給企業分成收入，多余部分，也要按照一定比例上交中央。如上兩項收入尙不敷支出的需要，即再划給調剂分成收入。如果以上三类收入全部划給地方仍然不足，就由中央撥款补助。以上地方收入的項目和分成的比例确定以后，原則上三年不变。

地方的財政支出，一般分为兩种，第一种是地方的正常支出，包括地方經济建設費、社会文教事業費、行政經費和其他地方性支出。地方的正常支出应由上述地方的收入来弥补。第二种支出是由中央專案撥款解决的支出，其中包括基本建設支出和特殊性的支出（如重大灾荒救济費、国家計划的大規模移民垦荒支出等）。这些支出每年由中央撥款解决。

今后地方的固定收入、企業分成收入和調剂分成收入，即分别根据地方財政支出的正常需要，划归地方使用。地方收入的項目和分成比例确定以后三年不变。这样，地方就有了独立的、稳定的收入来源，可以在划定的收入范圍以內，以收定支，瞻前顧后，因地制宜地进行各种建設事業的規划和安排。另外，我国的經济事業总是不断向上發展的，因此划归地方的收入也一定会随着地方經济事業的發展而不断增加，从而就可以进一步滿足地方經济文化建設支出日益增長的需要。

新办法規定地方經济建設、社会文教、行政管理等正常性的支出，由地方用划定的收入来弥补，自求平衡，而基本建設支出和其他临时的特殊性支出則由中央撥款解决，也是完全合理的。因为前者需要由中央在地区間作統一安排，而后者則是事前無法充分估計的，一般說这兩种支出变化都較大，如果也和正常支出一样，据此划給地方一定的收入，三年不变，那么就一定会發生苦乐不均的現象，这当然是与改进財政管理体制的要求不相符合的。

第二，明确划分了地方財政收支范圍以后，对于及时編制和确定地方預算也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地方有了独立的收入来源，可以根据收入編制預算，中央对地方預算的审核，除了收支項目外，主要着重于方針政策和应当由中央控制的某些事項，只要在这些方面沒有問題，不必等全国各地預算匯齐，中央就可以个别批复。这样，地方預算也就可以及早确定。这对于健全財政制度，加强地方財政工作的主动性，是有很大好处的。

第三，以上述三种收入供地方使用，可以充分發揮地方机关管理財政經济的积極性。例如地方企業事業收入和某些中央国营企業的部分利潤划归地方就可以促使地方关心这些企業事業的經营活动。同时，以商品流通稅、貨物稅和农業稅等作为調剂分成收入，也可以促使地方充分关心国家收入計划的完成。因为，在这样的条件下，地方收入的多寡与企業的利潤計划以及国家收入計划的完成情况發生着直接的依存关系，如果这些計划未能完成，那么地方收入即会受到影响。

中央国营企業的利潤，实行中央和地方的分成是有重大意义的。最近几年来，中央企業的数目随着国家建設事業的發展而不断增多，这些企業又分散在全国各地。由于距离远、層次多，各中央主管部門就很难对企業进行监督管理。現在地方参与中央企業利潤的分成，就会促使地方关怀本地区中央企業的經营管理，这对于企業改善管理、加强經济核算当然是有利的。

第四，新規定对地方年終結余和地方預算在执行过程中的超收节支有了妥善的处理。地方預算执行过程中，多收了可以多支，节約了可以另行安排支出，地方的年終結余，全部留給地方，由地方在下年度使用。同时为了避免中央把地方結余抵充撥款或变相收回，又規定在分配年度預算指标的时候，地方上年結余部分，不得計算在分配指标以內，中央也不能因地方有上年結余，而减少对地方应有的專案性撥款。

上述規定，有以下兩方面的好处：首先，由于超收和节支都由地方自行安排使用，地方年終結余也全部留給地方，这样就可以鼓励地方机关努力爭取收入和节約資金的使用。其次，上述的处理办法也可以使地方得到一定的机动財力，来安排自己的特殊支出。

第五，对民族自治地方的財政比一般省市有比較多的照顧。根据規定，在民族自治区將地方固定收入、企業分成收入和在自治区的全部調剂收入都划給地方，多余的部分上交中央，不足部分由中央补助。另外对民族自治州、自治县，也給予适当的照顧。

我国是一个統一的多民族的国家，全国各少数民族的人数占总人口的 6 %，他們的居住地区則占全国土地总面积的60%左右。解放以前，我国的少数民族長期受反动政权的統治和压迫，沒有人权，沒有政治地位，經济貧困，文化落后，人口也不断减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党和政府对少数民族貫澈了各民族一律平等，加强民族团結，在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区域自治等民族政策。全国解放以来，我国各少数民族虽然在政治上获得了平等的权利，但是由于少数民族地区的經济文化，長期以来是比較落后的，如果仅仅依靠他們自己的力量，就不可能滿足經济和文化建設的需要，因此历年以来，国家在財政上均曾給以大力的援助。例如 1955 年国家預算即曾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經济文化建設投資一亿七千余万元；1956 年全国各地区的經济建設支出平均比上一年增長 17.04%，而內蒙古自治区則增長了 65.46%，青海增長了 118.14%。

这次新規定，在收入范圍的划分方面，对民族自治地方有較多的照顧，此項措施当更有助于少数民族地区經济文化的进一步發展和我国各民族的加强团結。

以上所談的就是这次国务院頒布的改进財政管理体制的主要內容和采取此項办法的重大意义。

有人曾經担心，改进財政管理体制以后，由于扩大了地方管理財政的权限，地方有了較大的机动力量，会不会影响国家的計划和重点建設，会不会造成資金的浪費。实际上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因为，首先今后地方在編制預算和使用資金方面，仍然要受国家建設計划和国家預算的制約，地方仍然要遵照国家有关的財政政策和制度办事。同时，实行新办法以后中央預算仍占国家預算的三分之二以上，而且地方預算中的專案撥款也由中央掌握分配，因此国家的計划和重点建設是可以保証的。其次，地方多花一些錢，主要还是用于經济建設方面，而經济發展了，国家預算收入的来源也就更为充沛，国家重点建設的資金需要，也就更有保証。另外，今后地方收支有了密切的联系，对超收节支和年度結余有了妥善的处理，因此不仅不会造成浪費，而相反地只有会促使地方更合理的使用資金。

最后，我們还要指出，随着財政管理体制的改进，有兩个問題也是应該注意的。今后对地方来說，权限是扩大了，但同时地方的責任也相应加重，权力和責任总是联系在一起的，"权力下放是事情的一方面，事情的另一方面，也可以說是更重要的一方面是責任下放"①，过去一些可以由上面决定的事，現在要由地方来决定了。这样，地方机关就应該充分注意合理地使用財政資金，貫徹增产节約的精神，有計划地發展地方国民經济；同时也应瞻前顧后，建立必要的后备，准备以丰补歉，以有余补不足。今后对中央来說，决不能認为权力下放了，就可以对地方放手不管，而应該随着地方管理权限的扩大，适当地改进过去的領导方法和業务重点，把工作重点，集中到綜合平衡工作和有关方針政策的領导，使地方既能在一定范圍內因地制宜，而又不至于影响整体和全面的平衡。

总之，这次改进財政管理体制，是我国財政工作中的一件大事，我們相信新的办法实施以后，一定会更好地發揮地方組織收入、节約支出、加强財政管理的积極性，进一步推动社会主义建設事業的發展。

① 人民日报社論：改进工業、商業和財政的管理体制，人民日报 1957 年 11 月 18 日。

（上接第 37 頁）

品产量計划的完成。

第五，由于中央集中管理了工業，使得中央部和局必須有較細的分工，过去像第一机械工業部分出了电机制造工業部；燃料工業部化成了电力、煤炭、石油三个工業部，部下的生产管理局也相应增加，这些部局都各有其职能机構。但是这样發展的結果，造成机構重叠，工作層層轉遞，形成了人力物力的浪費，有些可以由地方和企業管理的事也集中了，給国民經济的統一平衡和安排上增加了复杂性。最突出的像建筑工業的多头的"条条"領导使得施工力量不能統一安排，在各地区不能相对稳定，远距离的調动很多，造成浪費；也不能統一进行基地規划和基地建設，目前需要和長远需要也不容易結合；施工机械和其他設备由各部門分别掌管，不能合理使用，利用率很低，各系統都各有一套規章制度，特别是工資福利方面的規定不一致，使职工意見很多。今后这些企業分别下放或加强地方的領导监督以后，就会根本改变了这种情况。

第六，在企業的財务管理和人事管理制度方面，过去由于我們对管理企業經驗不多，地方和企業主管人員权力比較小，限制也比較多。但是国营工業都分散在各地，地方政府对它們的人事不能管理和調整，就对于掌握和平衡一个地区的劳动力，以及对于干部的統一調剂發生了困难。在財务管理方面也是由于同样原因限制得比較严，在利潤分配制度上是采用滿收滿付方式，全部上繳后再根据需要申請撥付，企業本身不能有部分的支配权，这样造成的后果就使地方和企業主管人員难以充分發揮其积極性和創造性。通过目前的改进，就可以充分發揮了它們的能动性，对于貫徹社会主义工業企業的經济核算制將起一定的作用。

第七，在物資供应方面，过去由于中央各部"条条"下来，各自严格保証所屬企業材料不断的供应和生产任务的完成，因而物資分散儲存在各自的倉庫里，綫条分得很細，各自有一套系統，在这样情况下，同样物資在甲倉庫的不能为乙系統的企業用，某一个工業系統的物資即使有多余儲存，也不能給其他系統調撥应用，在統配和部管物資方面，即使超产，不管地方是否需要也都不能动用，一定要上繳中央，然后另行申請。在体制改革之后，地方对物資有权調剂，超計划产品地方也可以按比例提成使用，就能够大大地提高对物資运用的灵活性和地方的积極性充分發揮物資的作用。

毫無疑問，这次工業管理体制的改进將大大地推动我国工業企業各个管理环节和全体工作人員能够更好的管理工業，为超額完成第二个五年計划准备更有利的条件，使我們在工業化过程中迈进一大步。党和毛主席已經向我們發出号召，我們要在工業方面全力支援农業發展綱要四十条，我們要在十五年后在鋼鉄和其他重要工業产品产量方面赶上或超过英国。工業体制的改进將使我們更有可能以乘風破浪的气概实現这种偉大的壯举。

农業社收入分配核算問題的研究(下)

吳滬生　陈治鈞

二　决　分

关于年終决算分配的程序在实务上的作法或有不同，然而其工作的重点应該包括下列几方面：第一，确定农業社全年收入分配的总数；第二，确定农業社当年生产費用的总数；第三，确定应該参加当年收入分配的劳动日数；第四，进行决算分配；第五，結帳和編制資金平衡表；第六，对农業社全年的生产經营活动进行总結。現在就其中几个主要問題分别研究如下：

(一)确定农業社全年收入分配的总数

农業社的实物收入和貨幣收入，在年度中是在"种植業收入"、"畜牧業收入"和"副業及非生产收入"三个总分类帳戶及其所屬的各个产品收入明細分类帳中进行核算的。

在"种植業收入"帳戶的貸方記录整个年度中所收获的一切粮食作物、經济作物、蔬菜、果树、林木、茶园以及竹林、苗圃等产品(包括主产品与副产品的价值)，包括收获入庫的各种农产品，已收获未入庫而按劳动日分配給社員的农产品，以及已收获未入庫而直接对外銷售的农产品价值。

在种植業收入核算中，关于农产品收入的計价，对于收获已銷售部分农产品是按銷售价格入帳的，对于入庫而未銷售部分农产品，有銷售价格的按銷售价格計算，無銷售价格則按国家收購牌价計算，沒有收購价格則按农業社管理委員会所規定的价格(經社員大会批准)計算。發出农产品在原則上应該按照收获入帳时的价格銷帳，但是农产品收入时的数量与發出时的数量每有出入，若对外銷售更可能發生銷售收入价格与原入帳价格不相一致的現象，这种在数量上与价格上的差异，可能在当年度發生，也可能在次年度才發生(本年收获的产品在次年实現其价值)。总的說来，有下列三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农产品在收入与發出时在价格上發生差异，数量相同，而产品的收入与發出在同一年度。在这种情况下，应当按照所發生的差額調整当年的"种植業收入"帳戶的金額，譬如收入农产品价值1,000元（借：产品材料1,000　貸：种植業收入1,000）而当年銷售收入1,010元，則增加"种植業收入"10元，

借：产品材料10

　貸：种植業收入10

反之，如銷售收入990元，則应用赤字冲减种植業收入，

借：产品材料 $\boxed{10}$

　貸：种植業收入 $\boxed{10}$

如果今年收获的农产品在明年銷售增值，因为今年的收入已經分配，其增加收入部分的价值应該記入明年"种植業收入"帳戶中，如果在明年銷售减值，則可將銷售損失部分（比原帳面价值减少数）冲减明年的收入分配数，但是須提請社員大会批准。

第二种情况，农产品在收入与發出时在数量上發生差异而价格相同。發生差异的原因，是由于所收获的农产品尙須清选分級，分級清选后有一部分廢品損耗；也可能是由于在农产品貯存上所不可避免的自然損耗。当收获的农产品未經清选入庫时按毛重估价入帳，在清选后發生的廢品損耗，应作为农業收入的减少，用赤字冲减"种植業收入"帳戶的金額。至于自然損耗，則应將短少数列作副業及非生产支出，减少当年收入分配数。至于人为盜窃的短少数应作为債权收入处理，与"种植業收入"帳戶無关。

第三种情况，农产品的收入与發出在数量与价格上都發生差异时，应該参照上述兩种情况分别处理。

这里必須指出，在某些农業社会計核算实务中，对于农产品收获的核算不够严密，在收获产品时不編制收获的原始憑証，也不記帳，要到产品銷售，或分配給社員，或干燥后入庫，甚至在入庫清选分級后才入帳。这种对产品在收获过程中放任不加监督的現象，助長滋生弊端，造成农产品不应有的損失，从而减少农業社的收入。这样，会計核算失去了保护社会主义財产完整的作用。当然在这种不健全的处理方法下，是不会發生农产品的差异問題，因为根本不知道原来收获了多少产品，無帳可考。

在年終"种植業收入"帳戶的貸方，彙总地反映了全年度已經收获的农产品价值，但是在农業社中，在年底时有些农产品(如蔬菜、水果)已經成熟可以收获出售，或是同一种产品正在进行收获尙未收获完畢，这种跨年度的

农产品，在实务上有的作为当年的种植業收入計入收入分配之中；这就是說，將本年度可以收获而尙留在田間的那一部分产品列为当年收入，参加当年分配。借：种植業收入，貸：收入分配（"种植業收入"帳戶原有的貸方数額全部轉入"收入分配"帳戶）。因为該种产品实际尙未收获，所以先有"种植業收入"的借方發生額，在次年收获产品时才有"种植業收入"的貸方發生額（借：产品材料，貸：种植業收入）。在"种植業收入"帳戶下应为跨年度收获的农产品設立一个独立的明細帳，在年終結轉下年度，直至产品收获后結清为止。跨年度收获的产品，虽然一部分（或全部）要在下年才收获，照这种帳戶处理方法，并不增加次年种植業收入的金額。但是"种植業收入"帳戶应該先有貸方發生額，后有借方發生額；然而由于估价收入的結果，与上述情况正相反，这是不符合会計核算原理的。如果將跨年度收获的农产品估价入帳，另設一"年終估价"帳戶来处理（借：年終估价——农業，貸：种植業收入），这是任意增加核算的会計科目，也欠妥善。

將年終留在田中尙未收获的农产品估价列为农業收入，虽然可以增加收入分配总額，还可能估算出三包慰奬，增加社員收入。但是农产品估价与实际收入难免有出入，引起日后农業收入帳戶的調整（数量与价格差异）。这样，不論在估价入帳时与調整时都会增加帳戶处理的困难。如果估价分配后，遇到意外的不可抗力的气候变化（如霜冻、台風等）遭受損失时，則会造成收入落空。更主要的是，將尙未收获的产品估价分配，并没有实物或現金支付与社員，仍然要到次年在产品收获后才能支付，若不將这部分产品估价分配，在次年当农产品收获后，作为实物預支給社員，对于社員收入在同一时間內并無增減影响。所以將跨年度农产品提前分配，并無实际意义。因此，我們認为，如果农業社每年都有跨年度收获的农产品并且变动不大，在农業社已經定型，組織上已經巩固，社員逐年变动不大，农業社財务狀况良好，足以保証絕大部分社員增加收入的情况下，將已成熟而尙留在田間的农产品留到次年分配比較恰当。至于在这部分农作物上已作的劳动日和已支付的生产費用，可按收获面积比例分别結轉在兩个年度之內参加分配，三包慰奬在次年年終分配时結算。这样处理对于社員收入并無影响，而更合乎分配原則；对于农業收入的計算更为精确，免除了估产計算上的困难。

綜上所述，应計入当年收入分配的种植業收入，包括已收获的农产品，上年收获的农产品銷售增值，以及可能列入的已成熟而尙未收获或正在进行收获的跨年度的农产品的价值。

在"畜牧業收入"帳戶的貸方，核算农業社在进行畜牧業生产方面所收入的各种肉类、牛乳、蛋品等畜产品收入的价值（包括副产品收入在內）；以及牲畜繁殖的幼小牲畜、育肥畜的增重量等收入的价值；包括当年对外銷售收入以及尙在飼养中的牲畜的增重量与当年收入的庫存畜产品的价值。当有牲畜的繁殖与增重时（銷售、轉群、月底称重），就应按实际的数量与規定的价格記入"畜牧業收入"帳戶。所以如有牲畜的死亡，就应該按照原記录的方向用赤字冲减死亡牲畜的帳面价值。与种植業收入核算相同，对于已收入尙未銷售的畜产品在銷售或分配时也有数量与价格差异的調整。在年終"畜牧業收入"帳戶貸方的余額应表示全部畜牧業生产的收入。畜牧業收入占农業社收入的比重很大，是农業收入的重要来源，应全数轉入"收入分配"帳戶并按法定程序进行分配。在畜牧業收入中包括大量在飼养中的牲畜、幼畜与育肥畜，它們之中的一部分在成長之后將轉化为固定資产（产品畜），其余部分在相当長的时期中（有的要跨年度）随着牲畜的成長陆續对外銷售而实現其价值。因此，在分配时应該提存相当数量的公积金，一方面用作生产費周轉資金，另外一方面用以增加基建投資資金，以保証畜牧業的不断發展与扩大。

至于畜牧業收入的核算，在实务中是作得比較草率的，尙缺乏完整的核算帳戶系統，畜牧業的核算制度没有建立，对于牲畜財产没有日常核算监督，只有不完全的数量登記；在飼养中的牲畜价值，在"畜牧業收入"帳戶中平时没有記录，要到年終才盤存入帳；对于盤存也不够全面。譬如，有的社年終并不將兩个月以下的小猪盤存入帳，这是值得考虑的。虽然未断奶的仔猪还没有独立的商品价值形态（不能出售），但是它也是牲畜飼养的产品，具有一定的价值，应該估价入帳。有的社用另外的办法处理，年終盤存，將飼养中的牲畜价值冲减畜牧業支出：

借：幼畜及育肥畜

貸：畜牧業支出

这种处理方法，从数学計算方法上講是与这样的帳务处理結果相同的，即：

借：幼畜及育肥畜

貸：畜牧業收入

也就是說，畜牧業收入与畜牧業支出兩个帳戶轉入收入分配帳戶用着分配的数字相同。但是这种处理方法不符合于帳戶对照关系，照常理，"畜牧業支出"帳戶应該与"收入分配"帳戶轉帳，不应該与資产帳戶轉帳。另外，如果年終牲畜盤存价值大于畜牧業支出，則照上述方法处理的結果会發生"畜牧業支出"帳戶的貸方余額，这当然是不符合于事实的，所以对于牲畜年終盤存的价值应借：幼畜及育肥畜，貸：畜牧業收入。

在"副業及非生产收入"帳戶的貸方，記录农業社所有各种副業生产(包括主副产品的价值)及各种劳务的收入。在副業收入中与前述种植業畜牧業同样存在着产品的估价入帳与实現其价值时的差异問題，其处理的办法也与前述种植業收入的处理办法相同。在这个帳戶的貸方也計算了与农業社生产經营沒有直接关系的非生产性的收入，如存款利息收入，違約罰金收入以及材料产品物資盤盈的价值。副業及非生产收入在年終全数轉入"收入分配"帳戶。

所有上述三个帳戶的年終貸方合計数，彙总地表示农業社在整个年度中农、牧、副業生产經营收入的总額，其中包括超产部分在內。但是农、牧、副業收入帳戶中不核算固定資产的增值，例如果树生長的价值，社員为农業社的基本建設所創造的价值以及出售固定資产的价值等。这些項目屬于农業社的公共积累，不应列为农業收入，而是公积金的增加，应該記入公积金帳戶。此外，未到收获时期的农产品（在产品）因为不可能提供收益，它的价值也不应列入农業收入，参加当年的收入分配。

按照农、牧、副業实际收获記入各个收入帳戶的金額，并非应計分配的金額。在农業社中为了鼓励社員生产的积極性，提高产品的收获量，普遍实行了三包懲奬制度(包工、包产、包財务、超产奬励、减产賠产)。

关于超产奬励的办法在各农業社間所实行的并不一致，归納起来有三种不同的办法：第一种办法是实物奬励，就是从超产的生产队（或組）中將超产部分产品的一定百分比提出作为超产奬励，归队(組)分配，其余部分計入农業社的收入总額中，由农業社統一分配，超产奬励百分比一般在50%—60%左右；第二种办法是奬励劳动日，即按照超額完成生产任务的一定百分比奬励給社員一定比例的劳动日（詳見劳动日部分）；第三种办法是同时用实物与加算劳动日的奬励，一般适用于特种經济作物。

至于减产賠产的办法有兩种：第一种是賠实物，按减产程度的一定百分比計算，例如有的社規定每减产1%照賠实物1%，但是賠产应該規定最高限額，以免影响社員生活。有的社是另外的作法，例如規定减产10%以下者不賠，减产10%以上者賠償减产部分2%；第二种办法是扣除劳动日，即按照未完成生产計划的一定百分比扣除其应得的劳动日，但最多不得超过劳动日的25%(詳見劳动日部分)。

無論超产奬励或减产賠償，在包产队（或組）各社員間应按已作的劳动日数比例或农業社規定的奬賠办法分配。

因此，在三包奬励制度下，假定用第一种办法，計算收入分配額时，要从总收入中减去那些生产队（組）超額完成生产計划而应照規定給予实物报酬的价值，加上那些生产队(組)由于未完成生产計划而应照規定賠产部分的价值，經过加减計算所得的余額才按农業社的章程在全体社員間統一分配。

根据經驗：三包奬励以奬賠劳动日为較好，如按实物奬賠，会使社員只关心价值高的作物的生产，不安心价值低的农作物的生产，因此使农業社不能全面的完成生产計划指标。按劳动日奬賠可鼓励社員安心各种生产，鼓励社員提高劳动生产率，全面的完成生产計划。

(二)确定农業社当年生产費用的总数

农業社全年收入的实物和現金，依照国家的規定納稅后，应按示范章程的規定进行分配，首先，要扣除本年度在生产过程中已消耗的各种生产費用，如种籽、肥料、农藥等。这些生产資料的价值已轉移到新产品的价值中，構成新产品生产費的一部分，每年不断地从产品收入中补偿已經消耗了的各种生产費用，这是进行农業再生产的必要条件。农業社的农、牧、副業經营上所支出的各項生产費用，在年度中是分别在"种植業支出"、"畜牧業支出"、"副業及非生产支出"、"管理費用"等总分类帳戶及其所屬的明細分类帳中进行核算的。在年終这些帳戶彙总表示已經支出的各种費用总額，但是有下列几項費用应予調整或别除：

(1)应計入本年度生产費用的已領用的种籽、材料及低值易耗品攤銷价值。在农業社中常有相当数量的低值易耗品、种籽、材料，平时由各队(組)領用。通常生产队領用的数量，并非实际消耗的数字，要待生产队將材料投入生产后；才按实际消耗量报帳轉作生产支出。平时当生产队領到材料、低值易耗品时，在帳务上的处理，不过是將材料帳的保管地点作出变动記录，由倉庫保管員帳轉到生产队的帳上。由于各种低值易耗品的品种与数量，因其使用期限較長，在領用的时候耗用数尙未确定，还不能作为支出处理，因此，在年終时应作一次盤存，將其已耗用部分价值列入各部門(农、牧、副業)的費用中。对于已領用而未报帳的其他产品材料也应作一次全面的盤存，將应計入生产的部分消耗数，报帳轉作生产支出。例如农業生产队在年初領用繩索、筐籃等物品价值500元，在年底盤存时尙存100元，应將消耗部分轉作种植業支出。

借：种植業支出——农作物支出 400

貸：产品材料——低值易耗品 400

(2)归本年分配的跨年度收获的农产品在將来收获时尙須支出的生产費用，应从本年度的收入分配中取得补偿。这些費用只能用估計的方法計算，在有詳細的生产費用定額时，可按費用定額計算，在沒有詳細費用定額

时，可根据已經收获部分發生的費用作为标准推算或采用抽样測定的办法确定。但是各种作物費用發生額合計数最高不得超过三包中各种作物的費用限額。將已确定的尙須支付的生产費用計入收入分配，应作分录：

借：收入分配，

貸：种植業支出。

如前节所述，由于將跨年度农产品估价作为本年度收入的处理方法存在着問題，所以在帳务处理上也存在着困难，因此也就不可避免地發生先有生产費用轉帳后有費用支出的不合理現象。对于年終估計支出的生产費用也要用單独的明細帳記录，在年底要結轉到次年的費用总帳与該类作物費用明細帳的貸方，在費用發生后就可結平，不影响次年的收入分配数。

（3）关于三包作物生产費用节約額的奬励及其超支費用的处理問題。在三包懲奬制度下，各种作物上实际支出的生产費用与三包生产費用比較可能是节約，也可能發生超支。对于三包作物的費用的节約額应按照三包規定从节約額中提出一定百分比的金額作为奬励，这一部分要加算到各該作物的生产費用上并轉入"收入分配"帳戶轉銷。在实务上有些社把节約部分保留作为包产队（組）的生产費用基金，用以弥补次年同类作物上所可能發生的超支費用。至于三包作物超支的生产費用应由生产队（組）負担，不应轉入"收入分配"帳戶。三包作物的生产費用轉入"收入分配"帳戶的数額最多不得超过三包中所規定的限額。所以，本年生产費用的轉銷額＝費用实际發生額＋本年度估計尙須發生的費用＋三包作物生产費用节約的奬金－三包作物費用的超支数。应該特别指出，在实务上有曲解三包生产費用定額的作法，生产队（組）向社按定額要生产費用，而不用之于生产，强調节約，將节約数当作奬金擅自分配給社員；这是違法的行为，形同盜窃农業社的財产，应該加以禁止。只有在保証工作質量的条件下生产費用的节約額，才能按照規定提存奬金發給社員。

（4）关于在下年收获作物上所支出的各項生产費用。农業生产有显明的季节性，作物播种时即可确定它是在本年还是下年收获。因此，对于每种农作物的支出，在費用發生时即可确定是本年作物費用或者是下年作物的費用，例如水稻播种所發生的一切費用就記入本年收获农作物支出明細帳，冬季播种費用就应記入下年收获作物支出明細帳。在已經將費用按年度划分設立明細帳戶記帳的农業社，只須將本年收获的各种种植業支出明細帳上的費用轉入"收入分配"帳戶，在下年收获作物支出明細帳上的金額不予轉銷，但是要結轉在下年度的作物支出明細帳中。然而在有的农業社里，支出費用时不划分年度界限，或者是由于作物的收获期限不明确（产品可在今年收获，也可在明年收获），費用發生額只能記在同一农作物支出明細帳中。在这种情况下，办理决算分配时，便应該將屬于下年收获农作物上的費用进行轉帳，

借：种植業支出——下年收获作物支出

貸：种植業支出——农作物支出（蔬菜支出等）

这部分費用不轉入本年度收入分配帳戶。

关于"畜牧業支出"及其所屬明細帳的費用，在年終时全部轉入"收入分配"帳戶。至于"副業支出"在年終若無在产品存在，則与畜牧業相同，將全部費用轉入"收入分配"帳戶。"管理費"帳戶的借方發生額在年終也全部轉入"收入分配"帳戶。这三个帳戶經結轉之后都沒有余額。

除上述各項生产費用外，在本年收入中也应該扣除各种非生产性的支出，如借款付出的利息，違約罰金，材料产品盤亏的損失等。

农業社本年度的总收入减去本年度的各項費用（即上述四个費用帳戶）后的余額，就是用以进行分配的金額，在留下次年生产費和归还本年度生产周轉的貸款、提存公积金和公益金后，其余按照劳动日分配給社員。

必須指出，目前我国除少数农業社外，生产費用中均不包括固定資产折旧。农業社是否应当提取折旧这一問題，在苏联的經济学界目前已取得一致的意見，都認为在集体农庄中应当提取折旧，以便測定产品的成本水平，考核生产的成績。在已計提固定資产折旧的农業社里，不应該再要提存固定資产恢复用的公积金，而只須提存固定資产的扩大再生产部分公积金。当然，在提取的公积金中还要包括扩大生产用的生产費基金与粮食儲备基金。至于有些农業社在提取折旧后仍按規定的数額提存公积金，这显然是不正确的，因为这样就减少了社員应得的收入，損害了社員的利益。

（三）确定当年收入分配的劳动日数

在农業社中是按劳动日取得报酬的。劳动日的价值是根据农業社在全年内所投入的劳动日数量与全年收入的多少来决定的。农業社全年支出的劳动日总数是記在劳动日总帳内，而个别社員所做的劳动日数是分别記在每个社員的劳动日明細分类帳和社員劳动手册中。在劳动日总帳及其明細帳所記載的当年劳动日發生額（实作劳动日数），并非参加当年分配的劳动日数，还要进行下列各个項目的調整。

（1）实作劳动日与包工劳动日之間的差异　在实行三包的农業社里，各种三包作物在每阶段工作完工后，管理委員会要进行質量檢查。对于已經正确地执行工作驗收制度的农業社，可將各种作物劳动日明細帳上实作的

劳动日数与各种作物所規定的劳动日数（包工数）相比較，即可算出劳动日的差异数。在没有健全的工作驗收制度的农業社里，管理委員会在作物收获前应該按照各种作物明細帳上的記录与农作物技术措施上的規定深入田間进行实际檢查，对于不合理部分劳动日支出要进行适当修訂。把没有按照农作物技术措施工作部分的劳动定額从包工数中减去，因为自然条件变化而追加支出的一部分劳动日加入包工数中（包工限額的調整，应該用民主評定或与有关生产队协商的办法解决）。根据調整后的包工数确定劳动日差异。如果实作劳动日少于包工数则应將差异数加在实作劳动日上。反之，应將差异数从实作劳动日中减去。劳动日差异的調整在总帳与明細帳之間同时进行。如果三包包工是以生产队（組）为承包單位，則差額的調整应按各队（組）社員劳动日的合計数与差額的百分比在各个社員之間（在社員劳动日明細帳上）进行調整。

如果原始工分記录是按件計酬依定額計算的，則没有差額調整的問題。

（2）三包作物的懲奬劳动日 在前面曾經說明过，在用劳动日計算懲奬的办法下，一般是按照超額完成生产任务或减产的一定百分比奬給或扣除社員一定比例的劳动日。关于超产情况的核算資料，产品实际收获的数量与价值，是分别記在种植業收入、畜牧業收入与副業收入的各种产品明細帳上（該帳戶按生产队或小組設專欄），对于計入本年收入分配的跨年度收获的农产品未收获部分的估产价值在計算超产或减产百分数时要加計在各該明細帳中。將各种作物实际产量与其包产量比較，即可算出每种作物超产或减产的絕对数和百分比。將各个百分比乘以各該作物包工規定的劳动日数即求得超产作物的奬励劳动日数或是賠产作物应扣的劳动日数。將各种作物应奬励或扣除的劳动日数相加即得各个包产队应得的奬励或扣除劳动日数。例如某生产队所負責种植的水稻，包产量100,000斤，包工数51,000个劳动日，水稻收获实产量105,000斤。据上資料計算，超产5,000斤（105,000斤－100,000斤），超产百分比为$5\%\frac{5,000}{100,000}$，应奬励給該生产队的劳动日数为2,550个劳动日，該生产队在水稻作物上应参加收入分配的劳动日数为53,550个劳动日。

至于各个社員应得的超产劳动日奬励或賠产应扣除的劳动日数的处理办法，在实务上实行的有三种：

第一，根据各个社員的劳动日核算明細帳（其中設專欄記录每种作物的劳动日数）的記录比例加算或比例扣除其劳动日。但是对于那些在全年內没有完成最低限度劳动日的社員不予奬励，而賠产照賠。只有無劳动能力的社員和未成年的社員家屬不負賠产責任，而奬励仍可按規定的办法享受。

例如某种作物超产4%，某甲在該种包工作物上实作劳动日100个，則該种作物应奬100×4%＝4个劳动日。相反，如果作物减产就以减产的百分比为标准，从所作包工劳动日数中扣除按减产的百分比計算的劳动日数。

第二，超产奬励按各个社員在包产作物上实作劳动日数的多少比例加算，但是賠产則按应負包产責任的社員的劳动力底分的比例扣除。

第三，超产（减产）奬励（賠产）是按每个社員在全年內規定应作的劳动日数（或最低限度劳动日）为基数計算的。超产奬励对于没有完成最低限度劳动日的社員按实作劳动日的70%的比例奬励，对完成或超过最低限度劳动日的社員按全数实作劳动日的多少比例奬励。如第一种办法所举的例子，某乙在該作物上作了50个劳动日，但是某乙没有完成全年应作的最低限度的劳动日数，因此某乙在該超产作物上应得奬励的劳动日为：50×70%×4%＝1.4个劳动日。至于賠产，对于实作劳动日超过最低限度劳动日的社員，按在包产作物上所作劳动日的50%，折算劳动日数再按賠产百分比計算应扣除的劳动日数；而恰好作滿最低限度劳动日的社員，按70%折算实作劳动日（在包产作物上的）再按賠产比例計算扣除的劳动日数；对于那些没有按农業社規定作滿最低限度劳动日的社員，应不折不扣按其在包产作物上所作劳动日数的多少按賠产比例計算扣减其劳动日。

上述三种办法，各种农業社都可按照自己的条件选擇使用，只要社員同意都可实行。但是农業社应該注意，究竟采用那一种奬懲办法，要以能够鼓励先进帶动落后，保护忠实劳动社員的利益为标准去衡量取舍。

在实务上，实行三包大多运用多奬少罰的原則以提高社員生产的积極性。根据經驗：包产指标以稍低于农業社的計划指标为当。有的社以計划产量指标90%—100%的限度为包产指标。这样，可使大多数三包队（組）都能完成包产指标得到物質上的鼓励。这种处理办法在三包初期实行是比較恰当的，能起刺激生产的作用。但是因为奬励面太广，鼓励先进不够，所以应逐步过渡到以奬励平均先进的办法更为恰当。就是將完成三包指标的各生产队（組）的生产計划完成百分比加以平均，在平均数以上的队（組）可得到按高于平均数以上部分百分比所計算的劳动日奬励。例如，某农業社有四个生产队，其完成包产指标情况为：第1队98%，第2队100%，第3队104%，第4队106%。根据这些資料算出平均先进指标为102%，[(98%＋100%＋104%＋106%)÷4＝102%]，

高于102%的队有第3、第4兩队，各超过平均先进指标2%与4%，即第3队应得2%的超产奬励劳动日，第4队应得4%超产奬励劳动日。至于第2队虽然低于平均先进指标，但是已經完成原定計划指标可以不奬不罰，至于第1队因为没有完成原定計划指标，应从包工劳动日数中扣除没有完成計划指标的部分，即2%。应該特别指出，目前有一些农業社对三包作物在包定之后放任自流，对工作質量不加檢查监督；队按三包指标向社要生产費与劳动日，然而不按技术条件进行工作；尅扣人工与生产費用当作奬金使用；完成三包指标奬励，也欠恰当，对于超产部分有額外按定額比例要求加算人工与生产費而又同时要求按規定給超产奬励的情况。在实务上，按照这样計算的結果，有的社，超产队所得奬金超过其超产的全部价值，反而侵占了别人正常的劳动成果。这种奬励办法是不正确的，不宜采用。

关于劳动日的核算制度，在实务上有不少社尙欠完善，社員劳动日核算明細帳不健全，三包奬懲一般以生产队为承包單位，社員对全队所生产的一切作物都負奬懲責任，就是說有的社員所种的作物没有超产，但因为缺乏个人的劳动日明細帳（按作物設專欄），無从計算个人奬懲，所以也得到超产奬励。相反，超产社員，也負担賠产的处罰。甚至有的社劳动日帳紊乱，奬懲失却依据。所以农業社应及时健全劳动日的核算制度。劳动日核算的原始記录中应分别作物核算每个社員所完成的工作量，按規定期間記入社員劳动手册，按时上报管理委員会以便登入劳动日总帳、社員个人劳动日核算明細帳与个人劳动日結算帳戶。劳动日的核算必須定期（或按作業阶段）公布給社員核对，这样在分配时才有所依据。

（3）上年度結轉本年度的劳动日与本年度結轉下年度的劳动日 农業社在年終一定有相当数量的农作物在生長过程之中，这些作物要到下年度才能收获，因此，为下年度收获的作物而投下的生产費用与劳动日都要結轉到下年度参加分配。这部分劳动日包括已經投入在生产过程中（作物上）的劳动日，与在为下年生产准备工作上所作的劳动日。为生产准备工作上所作的劳动日如积肥，在全年度用在积肥工作上的劳动日，应按前后二个年度肥料耗用量的比例，將一部分劳动日結轉下年度分配。对于参加来年分配的劳动日数，要从本年度的劳动日总帳中扣除。为了照顧多作下年度工作的社員在本年度能有适当的劳动日报酬收入，鼓励社員参加来年工作的积極性，結轉下年分配的劳动日，不应由实际負責下年度工作的社員負担，应按全社結轉下年劳动日与全年劳动日总数的比例在每个社員結算帳中扣除一部分劳动日。例如全社全年度共支出劳动日20万个，其中投在下年收获的作物上的劳动日1万个，某甲全年共作劳动日400个，則参加本年度分配的劳动日为：

20万－1万＝19万个，每个社員应按5%的比例（1÷20＝5%）分别計算扣除一部分劳动日，某甲結轉下年度劳动日应为20个劳动日（$400\times\frac{5}{100}=20$）。同理，关于上年結轉本年劳动日，要加在劳动日总帳与个人劳动日明細帳中。

（4）应由社員負担的义务劳动日 在农業社中对于劳动力是有計划調度与使用的，对于应該由农民負担的对国家提供的义务劳动，不应該由出工的社員負担，要按照各个社員劳动力的（或底分）比例分攤，从各个社員的劳动日帳戶中扣除。

（5）基本建設劳动日的劳动报酬 逐漸扩大公共积累，增加基本建設投資，是农業社扩大再生产的途徑。基建投資資金的主要来源取之于公积金，每年农業社从收入中提存一定数量的公积金用之于基建投資。农業社用公积金的資金購买固定資产、購买建筑材料、聘請工程技术人員和由社員出工进行基本建設。社員参加基本建設与农業生产相同都要計算劳动日。

关于基建劳动日是义务劳动日还是要参加分配的問題，邓子恢同志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农業合作社扩大再生产及其他几个問題"的發言中早已指出：（一）最好是当年分紅，这更可以發揮社員的劳动积極性，避免劳力浪費，但是分值要低一些，要向社員講清楚。（二）社員覚悟高的社可当年記工，俟有收益时再分紅。（三）造林可以三年包栽包活，俟成活时再支付工款。（四）完全义务工也可以，但要經过充分动員与組織領导。避免劳力浪費。

在实务上，有些农業社，將基建劳动日全部在当年計酬，其余（如80%）結轉以后年度分配；更有些社，为了基建劳动需要較高的技术，而定額定得不够恰当（或制定定額暫时有困难），参加建筑的社員（如木、石工）不願按劳动日分配，由农業社比照市价給予报酬，將一切基建劳动报酬从当年总收入中先提出，其余才按劳动日分配。值得商榷的是，因为需要較高技术基建工的劳动报酬，不应該比照市价給酬，而应按照定額計算劳动日（或評議），参加年終分配。但是，必須將基建劳动日的工作定額制定得科学合理，复杂技术的劳动报酬，应比簡單的农業劳动报酬高些，使相同一个工作日的劳动，因为需要技术的不同而劳动报酬有所差别，从而可以鼓励社員提高技术發揮生产的积極性。

关于基建劳动日报酬的資金来源可以参加当年收入分配，也可从公积金帳上开支。在每年的基建任务大小不等，支出基建劳动日的数量多少也不相同的情况下，基

建劳动日的报酬(單价可与农業劳动报酬同或低些)从公积金中开支較恰当。在此情况下，如果將当年的基建劳动日参加当年收入分配，將会使农業社劳动日值在前后年度可能發生較大波动，使前后年度的劳动日單价失去可比性。

以上所述是指直接参加劳动的社員的劳动日，至于脫产半脫产干部的补貼劳动日的处理办法，在实务上实行的有三种：第一，固定貼补劳动日；第二，对社干报酬不确定固定劳动日，也不預計他們的誤工数，而是在年終按照一个中等或上等劳动力全年能做的劳动日的标准計算补貼；第三，定工、定产、定額补貼和年終評議相結合。上述三种办法以第三种为最合理。这种办法是按照社干职責的大小，任务的輕重和工作的繁簡程度确定他們預計的誤工数，然后按照这些誤工数占中等或上等劳动力全年劳动日的百分比确定补貼的百分比，年終用这一百分比乘中等或上等劳动力实际所做劳动日，即得社干的实际报酬。此外，并且規定他們在保証搞好社务以后，应当参加生产的时間，以便多得劳动工分。年終还要根据他們参加社务的实际情况进行評議，确定懲奬，如果实际上因社务关系誤工过多还可以調整报酬。农業社采用了这一办法以后，可以鼓励社干在搞好社务的前提下，努力参加生产，而且社干参加生产后，不必完全由社补貼工分；农業社就可以大大地减少对社干的工分补貼数。这种处理办法，与中共中央所發出的关于民主办社几个事項中規定的"干部要参加生产"的精神是完全一致的，同时，这一办法也充分地体現了邓子恢同志在中共中央八屆三中全会上指出的"大大减少脫产干部、减少工分补貼"的精神(根据这一指示，农業社脫产半脫产干部的补貼工分一般地应該不超过全社工分总数的1%)。

綜上所述，参加本年度收入分配的劳动日数，是根据劳动日总帳及其明細帳的資料进行核算的。即：本年所支出的劳动日数＋上年結轉的劳动日数±(实作劳动日数≶包工劳动日数)＋超产奬励劳动日数－賠产应扣劳动日数－基建劳动日数－結轉下年分配的劳动日数＝应計入本年度收入分配的劳动日总数。在劳动日个人結算明細分类帳上要分别按照应加应扣的各項劳动日进行調整。

(四)决算分配

在确定当年度农、牧、副業收入与农、牧、副業支出，以及应計参加当年收入分配的劳动日总数之后，就应該編制分配方案。在分配方案中分收入、支出、預分、本年度收益分配四大部分加以詳細說明。在收入部分：分别农業收入(稻谷、麦类、棉花、蔬菜等各种产品)，畜牧業收入(馬、牛、羊、猪、鷄、鴨各种牲畜及其产品)，副業收入(各种作坊产品、运輸、編織等)，非生产收入(利息、違約金等)，并按主要产品項目列出各种产品收入的金額。在支出部分：分列种植業支出(按費用項目，肥料、农藥等表示)，畜牧業支出(按畜禽种类表示)，副業及非生产支出(按副業种类，各种作坊、运輸業等表示)，管理費、税金等項目列示其細数与总数。在預支及預分部分：分别按产品种类表示已預支和已經分給社員的实物价值和現金以及农業社結存的实物和現金。在本年度收益分配部分：按分配程序列示每个項目，提存多少公积金(基建基金、生产基金、粮食儲备基金等)，公益金，应分配給社員的劳动报酬数并說明每个劳动日应分配的金額。

在分配方案中的收入、支出与分配数包括跨年度收获的产品估計收入与支出的費用及劳动日在内，所以对于尙未实現的收入、支出、与劳动日应在有关的項目内加以說明。

管理委員会应將分配方案的内容向年終社員大会报告，总結說明农業社在全年度内完成生产計划的情况，分析影响收入增减的原因，說明对国家义务完成情况、公共积累的增長程度及社員收入增加的情况等。

分配方案提經社員大会討論通过修正后，就变为决分的憑証根据。根据通过后的分配方案編制决算分配表。决算分配表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本年收入，按种植業收入、畜牧業收入、副業及非生产收入分别表示其各主要項目的收入細数与全年各种收入的总数。第二部分，本年支出，按种植業支出、畜牧業支出、副業及非生产支出分别表示各种支出項目的明細数与全年支出的总数。第一部分收入减去第二部分支出后的余額即本年分配的数額。第三部分，本年收益分配，按公积金、公益金、社員劳动日报酬等項目表示其細数及其合計数。

在分配方案与决算分配表中的社員劳动报酬金額，包括已經按实物与現金預支与預分給社員的数字及按劳动日报酬結算应該找补的数字在内。

在实务中，有些社在本年收益分配部分中多列出一奬金項目，即按公积金、公益金、奬金、劳动报酬等項目列示。这样列示方法，很容易令人誤解在收益分配时要按照公积金、公益金同样先提出一部分奬金，剩下的余額才是劳动报酬的分配数。所以这样列示方法是值得考虑的，奬金是对于那些在生产工作上有成績的社員的一种鼓励，奬励应該与完成生产計划任务有关系，是劳动报酬的另外一种分配形式。所以奬金是劳动报酬的一部分内容，应該包括在劳动报酬内。在采用三包超产实物奬励的社里，为了將劳动报酬内容表示得更清楚起見，可在社員劳动报酬項目下用其中奬金的項目表示；从而可以說

明，奬金是由于超产而提出，是按生产成績分配，全部劳动报酬扣除奬金后余額才是按劳动日平均分配的。如果实行三包超产加算劳动日的办法，奬励已包括在劳动日内，便無須乎列出奬金这个項目。

根据决算分配表所列应分配給社員的劳动报酬数，要按照劳动日分配給每个社員。在实行超产实物奬励的农業社里，如上段所述，在劳动报酬中包括劳动日的基本报酬与超产奬金兩部分。將劳动报酬总額扣除奬金后的余額按劳动日平均分配。这是全社的劳动日报酬共同的标准。在那些获得超产实物奬金的生产队（組）里，在基本劳动日报酬之上还要加上实物奬金，再按該队的劳动日数去分配。在那些賠产的队里，在基本劳动日报酬之上应扣除賠产的数額，然后再按該队的劳动日数去分配。所以，在实行实物奬励的农業社里，每个生产队（組）的社員的劳动日报酬是不尽相同的，可能大于或小于基本劳动日报酬，按照各队重算的劳动日报酬在各个社員間进行分配。假如农業社不用超产实物奬励，而用超产加算劳动日的奬励方法，則全社各队每个社員所用的劳动日报酬标准都相同，而差别只在劳动日的数量方面。

分配給社員的劳动报酬，須要編制一張社員分配明細表。明細表可按队分别編制（在各队劳动日报酬單价不同情况下），也可就全社編制一張（在全社采用同一劳动日單价情况下）。在明細表中应反映出劳动日單价，就每个社員反映出参加分配的劳动日数，应分配的劳动报酬，已預分和預支数，应該緩發数、实际找补数等資料。在劳动日中还应分專欄表示出上年結轉劳动日，本年实作劳动日数、按三包調整劳动日差額，結轉下年劳动日、扣除义务劳动日、三包超产（賠产）劳动日数（在实行劳动日奬励情况下），社員在領到劳动报酬后应在明細表上签章，此表即为記劳动报酬結算帳的原始憑証。

关于收入分配的核算是在"收入分配"帳戶中进行的，該帳戶在平时没有任何記录，在年終分配时应作成下列分录：

（1）將各种收入轉入分配帳戶

借：种植業收入
　　畜牧業收入
　　副業及非生产收入
　　貸：收入分配

（2）將各項支出轉入收入分配帳戶

借：收入分配
　　貸：种植業支出
　　畜牧業支出
　　副業及非生产支出
　　管理費
　　税金及保險費

（3）根据經社員大会通过的分配方案和据以編制的决算分配表分配收入，結清收入分配的总帳与明細帳，并根据社員分配明細表記入社員劳动日报酬結算明細帳的貸方。

借：收入分配
　　貸：公积金
　　公益金
　　劳动报酬結算

（4）根据付清劳动报酬的社員分配明細表記入劳动日报酬結算帳戶的借方和劳动日报酬明細帳的借方，借：劳动日报酬結算，貸：貨幣資金（或产品材料）

經过上述分录后，在劳动日报酬結算明細帳上的貸方余額，即为农業社欠社員的現金或实物报酬，应在資金平衡表的負債方表示之。在劳动日报酬結算明細帳的借方余額，表示社員在年終时的透支数，应作为債权表示在資金平衡表的資产方。假如农業社生产發展，收入分配工作做得很好，劳动日报酬結算帳戶在年終分配之后应無余額。

在决算分配結帳之后，应根据各个資产与負債科目的余額編制农業社年度資金平衡表，总結农業社整个年度的經营資金来源与資金組成（运用）的情况。根据資金平衡表中期初与期末数的比較即可了解农業社公共积累的增長速度，社員公共文化福利提高的程度；并且也可看出农業社自有資金的結構与資产項目的組成；根据項目結構分析农業社資金的运用是否适当，从分析中找出今后改进生产經营、組織財务工作的正确方向从而使农業社的生产得到不断的發展，在經济上日益巩固。

更正：上期第39頁社員夏收預分明細表下左方第8行"应預分总数"欄内应改为"按劳預分"欄内的金額分欄内。表下右方第5行"应預分总数"欄应改为"按劳預分"欄。

44頁表下左方第3行累計应繳数改为累計应支数。

关于我国农業生产計划向征購計划过渡問題的商榷(上)

張开敏　陈声雅

1956年9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發布了关于加强农業生产合作社的生产領导和組織建設的指示，其中提到今后对于农業生产領导的原則应当是在国家計划指导下，保持合作社生产經营的独立性，农業生产計划的制定必須結合农業生产的特点，避免脫离实际和机械死板的偏向；以及今后要逐步做到由生产計划过渡到农产品采購計划和調撥計划等要点。

同时，1957年中央制定頒發的国民經济計划表格中，在农業生产計划部分里，增加了一張农产品征購計划表格。

因此，在1956年下半年以及1957年上半年中，关于我国的农業計划制度如何从生产計划过渡到征購計划的問題就引起了广泛的注意和討論，根据各地討論的情况，一般都認为目前我国的条件还不成熟，困难很多，在相当長的时期內还不能改变現行的农業生产計划制度，因而对于这一个問題的討論又逐漸归于沉寂。

但是我們認为这一个問題还是值得进行研究的，因为农業計划制度的改变密切关系到农業生产的發展，而农業生产的进一步發展又是我国第二个五年計划期間国民經济全面發展的重要关鍵，虽然推行新的农業計划制度可能遭遇到一些困难，但是在尚未对困难的性質及其克服方法进行充分討論之前，即行否定实行征購計划制度的可能性也是不妥当的。因此我們提出一些粗淺的意見，希望能够重新引起注意，对于这一个問題繼續展开討論。

一　农業生产計划的重大成就及其存在缺点

現在提出关于改进农業計划制度的問題，并不是否定农業生产計划在过去几年中所起的巨大作用，几年来我国农業生产的發展是与国家的計划領导分不开的。大家都知道，社会主义的生产必須有計划地进行，这是客观經济規律的要求，也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表現。在社会主义經济規律的基础上，国家利用計划管理的方法指导国民經济的發展，建立各个部門之間的正确比例关系，并且充分合理地利用一切社会資源，从而保証社会主义扩大再生产能够迅速發展，人民的生活水平能够逐步提高。

社会主义农業是国民經济中重要的物質生产部門，它供給全国居民以粮食及其他各种食品，供給輕工業生产所需的絕大部分原料，并且还提供了工業产品的广大市場。因此农業生产的發展对于整个国民經济的發展有着極其重要的意义，农業生产与国民經济其他各个部門之間必須保持密切的配合与协調关系。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全部社会生产是有計划进行的，作为重要物質生产部門之一的农業生产当然也必須在国家計划的領导之下，才能够順利地發展。

在我国第一个五年計划期間，国家对农業生产进行了必要的計划領导，通过編制并組織执行农業生产計划的方法，把分散的小农經济納入国家計划的軌道，克服了小农經济的盲目性，使得广大的农業生产基本上能够符合国民經济的需要。

第一个五年計划期間，我国农業生产战綫上的成就是巨大的，虽然在1954年和1956年都曾經遭遇过严重的自然灾害。1953和1957年也發生了相当程度的灾害，但是各种主要农产品的产量还是取得了很大的增長，基本上保証了对粮食以及輕工業原料的供应，并且还完成了一定数量的农副产品的出口任务，换取建設器材，支援社会主义工業化。

取得这些成績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由于农業生产計划的指导作用。在第一个五年計划开始之初，小农經济在我国农業生产中还占着优势，如果没有国家計划規定明确的生产指标，就不能够引导这些分散的小农生产符合国家的需要，也就不能保持农業生产与国民經济發展之間的平衡比例关系，因此第一个五年計划期間农業生产計划的重要作用是必須予以肯定的。

虽然如此，但是由于农業生产計划本身的性質所决定，在計划的实踐过程中也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一些缺点，这些缺点如果不及时加以克服，对于今后农業生产的發展就会發生不利的影响。

农業生产計划的主要缺点表現在下列几个方面：

1.农業生产計划是一种間接計划，不能帶有严格的指令性，缺乏貫徹实現的保証；

2.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国家計划机关不可能全面掌握各个地区千差万异的自然条件。因此，制定出来的計划就难以完全符合各个地区的实际情况，不能充分貫徹因地制宜、因时制宜的原則；

3.国家計划机关在制定全面的农業生产計划时往往容易偏重于从国家需要出發，不能充分考虑到农民本身的需要，以致于影响农民的生产积極性。

以上三个缺点的产生并不是由于計划工作上的主观原因，而是由于农業生产計划的性質与当前农業生产中的特点不相适应所造成的。

目前我国农業生产中存在着三个主要特点：

1.在全部农業生产量中，农業內部消費所占的比重很大；

2.各个地区的自然条件差别很多，对于农業生产的影响也很大；

3.农業中占統治地位的所有制形式是农業生产合作社的集体所有制。由于第一个特点的存在，就没有必要由国家計划規定农業的全部生产量，而只要求規定其中的商品量；由于第二个特点的存在，就要求农業計划必須帶有一定的机动性，以便适应各个地区的自然条件，充分利用地力；由于第三个特点的存在，就要求农業計划能够保証农業生产合作社在国家計划指导之下的生产經营独立性。

但是現行的农業生产計划制度在这三个方面都是不能滿足要求的，因此就造成了上述的各項缺点，影响了計划領导的水平。

随着国民經济的进一步發展，这些缺点必須加以克服。进入了第二个五年計划以后，对于农業生产提出了更高的任务。在工农業并举的方針下，今后几年之內迫切要求农業生产更加迅速地發展，以克服当前农業生产落后于国民經济需要的矛盾。

农業生产的迅速發展有賴于許多因素的作用，然而农業計划制度的改进却是最主要的因素之一。为了提高計划領导的水平，促进农業生产的發展，就有必要对現行的农業計划制度进行合理的改革，以便克服过去存在的缺点，發揮更大的作用。

适应着当前农業生产中的特点，农業計划制度改革的方向应当是將計划的制定建立在控制商品量的基础上，也就是从生产計划过渡到征購計划。

这一个計划制度在苏联已經建立了成功的先进經驗。

二　征購計划的优点以及苏联的先进經驗

农業品征購計划本身并不是什么新的东西，早在几年以前就已經进行了农产品的征購工作，并且这些工作也都是按照計划进行的。

但是过去时期农产品征購計划的性質不同，它是以农業生产計划为基础的，征購的数量决定于生产的情况，这种計划对于农業生产不起指导的作用，而只是为国家取得一部分农产品，供应国民經济的需要，然而，改变制度以后，征購計划的作用提高了，它被用来代替过去的农業生产計划指导农業生产的进行。根据新制度的要求，农業計划的編制程序是先由国家制定各种农产品的征購計划，逐級下达，最后分配到农業生产合作社，作为必須完成的任务和义务；农業合作社在保証完成国家任务和履行各項义务的前提下，結合本身的需要，安排生产，制定合作社的生产計划。

这种計划制度具备許多优点，主要的有下列四項：

1.国家計划規定的指标只限于一些主要农产品的商品产量，指标的范圍大为縮減了，于是国家就有可能集中力量掌握这一部分由国家直接掌握的农产品，进一步做好农产品的供应工作，更好地滿足国民經济和居民对农产品的需要。

2.国家計划規定的征購指标。都是农業合作社必須完成的任务和义务，帶有严格的指令性，于是就加强了計划的指导作用，使得农产品的供应更有保証，农業与国民經济之間的联系也就更为巩固了。

3.农業生产合作社根据征購任务自行制定生产計划，就能保証合作社在生产經营上的独立性和主动性，更多地依靠社員群众的經驗和智慧，更好地貫徹因地制宜、因时制宜的原則，充分利用当地的自然条件，創造增产的有利因素。

4.征購計划只規定了国家需要的部分，其余的部分留待农業社自行考虑，于是农業社就可以根据本身的需要，合理安排生产，在保証国家需要的前提下，充分照顧到农業合作社与社員的需要，这样就使得国家利益、农業社利益与农民利益三者之間更加完善合理地結合起来，从而提高农業合作社的生产积極性，促进农業生产的發展。

以上这些优点与农業生产計划的缺点正是一个显明的对照，所以改变农業計划制度，实行农产品征購計划乃是进一步提高計划領导水平，克服現存缺点，推动农業生产發展的根本方法。

新的农業計划制度在苏联已經取得了成功的經驗，为了帮助了解新制度的实質，下面簡單地介紹一下苏联的农产品采購計划。

1955年以前，苏联的农業計划制度也和我国現行制度一样，由国家計划規定各項生产任务，逐級下达执行，其結果也是造成了很多缺点，在長时期中影响了农業生产的發展。自从1955年以后，苏联的农業計划制度有了重大的改变，这就是由国家規定生产計划轉变到国家只規定农产品采購計划。

按照新的制度，計划編制的程序是：国家計划机关根据各方面上报的有关农产品生产和需要的資料，結合計划期的任务，核算农产品的需要量与生产量，在平衡的基础上規定各种农产品的采購任务，經过批准后，逐級下达，最后分配到各个集体农庄，集体农庄在必須完成各項采購任务的前提下，考虑本身的需要，結合安排，制定生产計划。

集体农庄的生产計划編好后，还应逐級上报，由各級計划机关进行审查綜合。

国家規定的农产品采購計划的內容，按其来源划分，包括四类指标：

1.义务交售

列入义务交售的产品包括谷物、肉类、乳类等，这一項指标的确定是根据集体农庄的面积和国家对各个地区規定的农产品交售定額計算的，因此义务交售的数量比較固定，集体农庄自己也能計算出来。

2.机器拖拉机站的实物报酬

这一項指标是根据拖拉机工作每一公頃的报酬定額和拖拉机的工作总量而定的，国家計划規定了拖拉机站的工作总量，所以这一項指标也能預先計算出来。但是实际的报酬数量却要根据拖拉机站的实际工作量，因此实际完成的数字可能与計划数字有出入，拖拉机站为了完成并超額完成国家計划就要爭取多为集体农庄做工作，集体农庄根据实际工作量付給报酬。

3.預購

列入預購的产品包括各种技术作物，預購指标的計算是比較复杂的，因为没有任何定額可作为依据。这就要根据各个消費部門提出的需要量，并估計計划期技术作物可能达到的生产量，在需要与資源平衡的基础上确定預購量，并与集体农庄訂立經济合同，保証如数供应。

4.采購

列入采購的产品都是有义务交售任务的产品，例如谷物、肉、乳、羊毛等，其数量的确定是在完成国家义务交售任务后，再除去集体农庄本身的需要，其多余的部分由国家进行采購。这一項指标的計算也是很困难的，一般可以根据义务交售任务的比例来估算，例如苏联从1956年开始，采購任务大致占义务交售数量的60—65%左右。

以上这些指标是集体农庄必須完成的任务和必須履行的义务，如不能完成时集体农庄应承担責任，按照苏联規定，还应当于次年补足。至于这些指标的核算和确定則是依靠农产品总資源平衡表的編制，总資源平衡表中包括对农产品的各項需要及其可能的生产資源，国家計划机关依据核算，在需要与資源平衡的基础上确定采購数量。因此在实行农产品采購計划制度以后，計划机关对于农業生产的情况仍然应当很好地掌握，根据生产資源的核算方能够制定正确的采購計划。因此在新的計划制度下，国家对农業生产的領导并没有削弱，而是适应着农業生产的特点，更加改善和加强了。

农产品采購計划制度在苏联已經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兩年来苏联农業生产的飞速發展固然是由于多方面的原因造成的，但是，不可否認，农業計划制度的改进起了最重要的作用。这一个先进經驗是值得我們参考学習的。

当然，学習苏联先进經驗还必須結合我国的具体情况。因此，对于我国目前改变农業計划制度可能性的研究就是更为重要的問題了。

三　目前实行征購計划的可能性以及存在的困难

从我国目前的情况看来，实行以征購計划領导农業生产的制度，已經具备了下面一些有利条件：

1.全国范圍內已經基本上实現了农業的高級合作化，于是就有可能以农業合作社作为基層計划單位，要求各个农業社根据国家的征購任务編制生产計划；

2.通过几年来农業稅的征收和农产品的統購統銷工作，基本上掌握了主要农产品的商品量。同时对于各种农产品的需要量，几年来也积累了一些确切可靠的資料，为征購指标的核算奠定了基础。

3.第一个五年計划期間农業生产計划編制和执行的資料提供了核算农業生产資源，編制农产品总資源平衡表的依据。并且各級計划机关以及有关部門都积累了一定的工作經驗，計划工作已經建立了巩固的基础。

4.随着农業合作化的胜利和农村中社会主义思想教育的开展，广大农民的社会主义覚悟空前提高，絕大部分农民都能認識到国家利益与个人利益正确結合的重要意义，能够做到积極支援社会主义建設，首先照顧国家的需要，因此征購計划的完成有着群众基础的保証。

以上几点有利条件說明在我国实行征購計划制度的可能性基本上已經具备了。

但是可能性的具备并不等于没有困难，新制度的推行必然也会遭遇到一些不同程度的困难，对于这些困难也必須加以充分的考虑。

綜合各方面的意見，目前在我国实行农产品征購計划制度可能遭遇的困难不外乎以下几个方面：

1.我国农業技术落后，农業生产受自然条件的影响很大，产量不稳定，这种情况不但对于确定征購数量造成很大的不便，而且一旦遇到較严重的自然灾害时就不能保証征購計划的完成。

2.我国农業生产的商品率很低，能够提供的商品量不大。农产品的生产与其需要之間的平衡关系經常总是处于紧張狀态，如果仅仅控制商品量，农产品的供应难以有保証。

3.目前对于主要的农产品实行統購統銷的政策，改变計划制度以后兩者之間可能發生矛盾；而且在貫徹統購政策的同时，征購計划指标的确定也可能存在一些困难。

4.农業的高級合作化虽然已經基本上实現，但是目前农業合作社的組織还不够巩固，农業社的組成也还没有完全定型，因此，若是以农業合作社为單位来分配征購任务就可能遭遇一些困难。而且目前大多数农業社干部的工作能力不高，經驗不足，不一定能够根据国家的征購任务制定社的生产計划。

5.征購指标的确定需要各个部門事先提出有关农产品生产和需要的詳細資料，并且計划下达的时間要提前，才能保証指导农業生产的作用。此外，具体的征購方法也需要改进，但是目前各个部門的工作还配合不上，不能充分适应征購計划制度的要求。

6.过去各級計划机关和农民都已習慣于根据上級頒發的生产指标安排生产，一旦改变制度后，很可能引起工作上的混乱和农業生产中的自流偏向。

以上这些困难都是实际存在或者都是可能發生的，应当加以考虑，但是更重要的是这些困难是否眞正会成为实行征購計划制度的障碍，它們可能發生的程度如何以及是否可以加以克服的問題，却是更值得进一步研究的，下面就这些問題提出一些初步的看法。

1.我国农業生产受自然条件影响較大，产量不稳定，这是事实，但是却并不能成为实行征購計划制度的障碍；相反地这正是应当改变农業計划制度的重要原因。正由于产量不稳定，所以农業計划就必須帶有相当的机动性、征購計划制度的主要作用就在于这种制度使得农業合作社有可能根据本身的自然条件，因地因时而制宜，尽量利用自然条件的有利因素，避免不利的影响，于是就能加强抗灾能力，提高产量的稳定性。因此，农業产量不稳定的情况有待于改变計划制度去协助解决，而不能成为改变計划制度的障碍。

征購指标的确定应当建立在稳妥可靠的基础上，在核算生产資源时应当根据常年稳定的产量水平，而不能以个别的最高产量作为标准。因此，在編制征購計划，确定各項指标时就应当仔細研究历年产量的动态，并根据当年条件变化的趋向估計可能的增产程度，制定切实可靠的指标，避免过高或过低的偏向。只要指标規定得正确合理，在一般情况下，征購任务是可能完成的。

不过这只是指一般比較正常的年景而言，当遇到特别严重的自然灾害，以致农業产量大为减損时，即使原来制定的計划指标非常正确合理也还是不能保証征購任务如数完成。但这只是一种例外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即使采用农業生产計划制度，对于自然灾害的發生也同样無能为力，不能保証农产品的稳定产量，遇到这种情况时就不得不依靠縮减农产品的消費量以及动用农产品儲备的办法来保持国民經济平衡，而不能依靠农業生产計划制度来解决問題。

相反地，当遇到特别丰收的年景，农業产量大为增長时，国家除了按照原定的計划完成征購任务外，还可以通过国家商業机構以及供銷合作社机構向农業社直接收購增产的农产品，这样的办法較之事先規定生产任务，然后再根据产量規定征購任务的办法更为方便有利，不仅能够保証国家可以得到更多的农产品，并且也更能为农民乐于接受。

此外，产量不稳定所造成的困难，在制定生产計划时也是同样存在的，而且事实上还將更甚于制定征購計划时所遭遇的困难，因为当产量略有减損时，征購任务仍然能够完成，但是生产計划却缺少这种机动性。

照这样看来，不应当認为自然条件的影响，产量不稳定的困难足以成为实現农产品征購計划制度的障碍。

2.我国目前的农業生产力水平較低，农業人口比重很大，因此农产品的商品率也較低，这一点也是事实，但是这只能指粮食产品而言，至于經济作物的商品率并不是很低的。

虽然这是一个事实，但是却并不是实行征購計划制度的一个困难，而且正是由于这一个原因，国家就没有必要規定全部农業生产任务了，因为农产品的商品量只占总产量的一部分，并且又只是較小的一部分，所以国家只需要集中力量控制这一部分商品产量就能保証对城市居民、工業生产以及一部分农村需要的供应。

至于农民本身消費的部分就没有必要由国家来代为全盤計划了，这一部分如果由农業合作社根据本身的需要自行考虑安排，是更为合理有利的。这样的办法既能够避免国家控制过多过广，照顧不及的缺点，又能够發揮农業社的生产潜力，提高生产积極性，从而增加产量。而农業产量的增加才是眞正提高农产品的商品率，增加商

品产量，解决目前农产品供需紧張的根本关鍵，所以为了有助于迅速解决目前农产品供需之間的矛盾，就应当迅速地改进計划制度，促进农業生产的發展，而不应当采取消極的态度，等到农产品商品量增加，供需之間的矛盾緩和以后再来考虑計划制度的改进，这样做根本就失去了計划制度在發掘潜力，推动生产發展方面的重要意义。

3.农产品的統購統銷政策是在我国目前情况下保証农产品供需平衡的重要措施，在今后若干年內这一个政策还必須繼續貫徹执行。然而这并不妨碍农業計划制度的改变，在統購統銷政策与农产品征購計划制度之間不存在任何矛盾，而且农产品征購計划的編制在目前还必須以統購統銷政策作为基础，統購統銷数量的規定有助于征購指标的核算。

根据我国的情况，目前农产品征購指标可以包括下面四个来源：

①农業稅实物征收　这一項指标的确定可以依据农業稅征收的資料核算。

②定購　这一項指标只包括粮食，分列主要品种，其数量的确定可以根据1955年的定購数字，必要时进行部分的合理調整。至于根据国家規定粮食增产应予增購的部分則不必列入本項指标，可列入其他来源中另行处理，以保証定購指标的严格指令性，此外，还有周轉粮部分則根本不必列入征購計划，而由粮食供銷單位处理解决。

③預購　列入国家計划的預購产品包括屬于統購产品的主要經济作物，如棉花、油料、重要的出口物資等，此外还可包括一些主要的畜产品和副产品，如生猪，主要的藥材等。其数量的确定可参考过去的資料，并依据各部門提出的需要量核算。

④采購　凡是不列入上列各項，而又必須由国家計划加以管理的产品都可列入本項，由国营商業机構或供銷合作社机構进行收購，如次要的經济作物、畜副業产品等，这一項指标，可由各地区分别掌握，根据需要和生产資源的情况而定。

此外，粮食增产应予增購的部分以及主要經济作物增产超过預購指标的部分也可列入此項，其数量根据国家規定的增購比例和預計增产的情况而定，但是实际增購的任务应当按照实际增产的数量，所以这一項指标帶有一定的估算性。

凡是不屬于上列各項指标的产品，由农業社根据社員的需要自行安排。

根据以上来源划分的各項指标，在具体計算上当然还需要进一步考虑和研究，在实际工作中也將会遇到一些困难，但是基本上看来，这些指标的核算問題是可以解决的，它們不但不会妨碍統購統銷政策的执行，而且更能貫徹統購統銷政策的要求，有助于农产品供銷之間的平衡。

4.关于农業合作社的組成和巩固的問題，虽然应当考虑，但也不是一个很大的困难，目前农業合作社的組成虽然还未完全定型，但是大致上已經决定了，經过一兩年的整頓后，除了个别情况外，不致再有很大的变动。而且即使今后由于行政区划的改变或是由于生产条件的需要，必須变动农業合作社的隶屬关系和組織規模时，也还可以按照变动的情况随时調整农業社的征購任务。

此外，农業社組織机構的变动对于編制生产計划，分配生产任务也同样会产生一些困难。所以这一个問題实际上并不会影响农業計划制度的改变。

至于农業合作社的巩固确实还需要相当長的时間，甚至于需要四五年之久，但是这一点却并不妨碍征購計划的实現，相反地，以征購計划来領导农業生产的办法將会促进农業合作社的巩固，其理由有二：

①征購計划制度能够充分發揮农業社的生产积極性和主动性，使农業社更加关心采用先进的技术措施，提高产量，因此就能促进农業社生产的發展，在生产發展的基础上，农業合作社才能得到进一步的巩固；

②农業合作社根据国家的征購任务制定社的生产計划时，为了要保証完成国家任务并适应社員的需要，社干部就必須更多地征求群众的意見，依靠群众来安排生产。因此就可以避免官僚主义，脫离群众的包办作風，充分發揚民主办社的精神，这也正是进一步巩固农業合作社的重要条件。

由此看来，实行征購計划制度將会促进农業社的巩固，而农業社的巩固和發展也必然要以更合理、更完善的計划領导制度作为基础。

至于对农業社編制計划能力的顧虑就更不必要了。事实証明，只要依靠群众，农業社完全有可能自行安排生产，况且农業合作社是社会主义的集体生产，必須有計划的进行，不論国家規定生产任务或是規定征購任务，农業合作社都必須自己編制生产計划，不能够由国家来全部代办，因此这个顧虑是完全多余的。

5.以征購計划領导农業生产的办法是农業計划制度的进一步發展，因此就必然要对各个有关部門提出更高的要求，但是，目前各个部門的工作还不能适应新制度的需要，这是实际工作落后于客观發展需要之間的矛盾，这一矛盾的正确解决应当是改进現有的工作，使之能够适应新情况的需要，而不应当迁就現存的缺点，推迟改革的步驟，各个部門的組織机構、工作程序都应当与当前的工作制度相配合，在实行生产計划制度的条件下，既然存在着与生产計划相适应的机構和程序；在实行征購計划

制度以后，有关的机構和程序也就应当适当地調整，以符合新制度的需要。

况且以征購計划来指导农業生产虽然是一个新的制度，但是农产品征購本身并不是一件新的工作，过去几年内，在农業税征收和农产品采購方面已經做过不少工作，建立了必要的机構，取得了相当的經驗，改变計划制度后只是要求更加提高一步，在程序上更能适应新制度的需要，例如征購計划的編制和下达要比过去提前，各个有关部門之間的工作更需要密切的联系，这些方面工作的改进是完全有可能在不長的时期内做到的。这些工作的改进同时也就意味着計划管理水平的提高，这一点也正是改变計划制度的重要作用之一。

6.改变計划制度以后是否会引起农業生产中的自流偏向是最普遍关心的問題，对于这一个問題的認識应当首先了解农产品征購計划制度的内容。

按照农产品征購計划制度的要求，并不意味着国家除了規定征購任务以外，对于农業生产就置之不問，完全放任自流了，事实上，采用征購計划以后，还必須要求各級計划机关更好地掌握农業生产的情况。征購指标的确定，一方面要根据国家的需要，另一方面还要根据生产資源的核算。在編制計划之先，各地区应当根据本地区的具体条件核算本地区可能达到的生产量以及本地区的需要量，并將核算的資料逐級上报，国家計划机关依据各方面报送的資料进行平衡，在需要和資源平衡的基础上才能够最后确定农产品的征購数量。

各級地方計划机关在核算生产資源的过程中必須密切联系群众，深入分析情况，依据本地区的自然条件，掌握生产發展的方向，以便向上級提供正确的資料，作为編制征購計划的依据。当国家征購計划下达后，各級計划机关还必須根据本地区内部各地生产和需要的情况，正确合理地分配征購任务，最后逐級分配到基層計划單位—农業合作社。农業社根据国家計划規定的征購任务編制自己的生产計划，农業社的生产計划編好后应当逐級上报，由各級地方計划机关加以审核彙总，最后上报国家計划机关，以便掌握全面的农業生产情况。

在审核过程中，地方計划机关如發現农業社的生产計划明显違背国家發展农業生产的方向，不能保証完成国家征購任务，或是不能滿足农業社本身的正常需要时，就有权向农業社提出修改計划的建議，农業社也必須加以考虑，对原定的計划进行适当的修改，在这个过程中，即使农業社原定的生产計划可能存在着缺点和錯誤，也能够得到及时糾正，决不致于造成很大的偏差。

况且，国家在下达征購計划的同时，还需要采用一些其他的經济措施，如价格政策、市場管理、經济合同、物資供应、技术指导等等来引导农業社的生产，以保証征購計划的完成。因此，在征購計划制度下，国家对农業社生产的領导，除了直接規定征購任务以外，还要求更多地运用經济措施，才能够取得更大的效果。通过直接下达征購指标，审查农業社的生产計划以及依靠各項經济措施的配合，对于农業生产的計划領导就更为加强了，农業生产的自流偏向是完全可以避免的。

从以上各点看来，我国农業計划制度的改革虽然存在着一些困难，但是这些困难并不是不可克服的，对于这些困难应当加以充分考虑，但是也不必过于顧虑重重。苏联在改变計划制度之前，也曾經进行广泛的討論，在討論中也曾經提出过許多困难，存在着許多顧虑。但在改变制度以后，实踐証明，原先估計可能产生的偏向并未發生，事前的許多顧虑都是多余的。

当然苏联的情况和我国不同，計划制度的改变关系重大，因此对于在我国实行征購計划的可能性以及困难所在还应当进行深入的研究。除此以外对于具体的过渡步驟和方式也必須根据我国的情况妥善考虑。目前关于从生产計划过渡到征購計划的方式問題，也存在着几种不同的意見。

（上接第34頁）

除了以上三項主要的增产措施以外，第二个五年計划还要根据全国农業發展綱要所提出的增产办法，采取其他一系列的措施，同时有关部門还要推广各地的先进經驗以發展农業生产，不过在这里不能一一加以說明了。

*　　*　　*

自从党中央提出了在优先發展重工業的同时必須大力發展农業的方針，而且又召开了一系列促进农業生产大躍进的各种会議以后，广大农民和农業战綫上的干部的积極性已經开始高漲起来，和發展农業有关的各个經济部門也正在按照这个方針安排自己的工作。同时，絕大多数的国家机关干部和广大的知識分子都响应党的号召，有的已經或者正在准备“上山下乡”直接支援农業生产，并在劳动中鍛煉自己；有的則采用其他各种办法間接地促进农業的發展。目前全国农村正在掀起一个空前的生产高潮，全国城市也正在掀起一个热烈的支援农村的高潮。我們坚信：在党的領导下，全国农民不怕困难，持久奋斗，加上各个有关的經济部門的大力配合，再加上知識分子的积極支援，十年以后，我国定將成为一个不但具有現代化的工業、而且具有現代化农業的社会主义强国！

关于上海工業的情况和若干問題

本文系我院工業經济系所举办的工業經济專題講座之一，由業务部門同志主講，材料比較充实。本刊今后將陆續發表該講座之其他重要报告。

主講人 刘志誠

今天講的內容分三个部分：

一、上海工業基地的發展过程，主要变化以及在国家的社会主义工業化中所起的作用；

二、上海工業的几个特点；

三、上海第二个五年計划工業初步規划的要点。

一 上海工業基地的發展过程、主要变化以及在国家的社会主义工業化中所起的作用：

(一)上海現代工業成長的过程

这一方面掌握的資料不多，运用了一些国民党政府的統計，可靠性很差，只能就現有資料簡單談談，可能有許多地方不对头。

上海現代工業已有100多年历史了。自 1843 年开为商埠，同年英国的傳教士开办印刷厂，可能这是上海第一个現代工厂，叫墨海印書館。从 1843 年 — 1863 年的 20 年中，外商在中国先后开办了 17 个工厂，除士林西报館外，主要是修船厂、进出口貿易有关的小規模加工厂。由此可見，初期上海工業主要是：①外国人开办的；②与进出口貿易有关的服务性的加工修理工厂；③进行宣傳的。

中国人自 1862 年才开始自己办厂。当时是李鴻章办的制炮厂（該厂設立的目的是为了打太平天国的），到 1865 年改为江南制造总局（即目前江南造船厂）。1883 年，英商怡和洋行买办开了一个机器五金厂。1905 年—1914 年間，中国商人又开了兩家紗厂，七家面粉厂等，这說明了中国人开办現代工業的首先是封建官僚，其次是洋行买办，民族資本大約在1905年以后才开始。

解放前上海工業的發展情况：根据国民党政府一些統計資料，1936 年上海共有工厂 2,700 家，职工人数 30 万人。1945 年工厂数为 4,100 戶（职工人数沒有統計数字）。1948 年（解放前一年），工厂数 12,500 戶，工人数 45 万人。長时期来，上海工業主要掌握在帝国主义手里。根据上海市国民党伪社会局統計：1928 年，上海工業資本总額 29,000 万元，其中帝国主义資本占 64%。在此中，日本帝国主义資本比重最大，占整个帝国主义資本的63.8%；其次是英帝国主义資本，占 29.7%；再其次是美帝国主义資本，占 3%。这些帝国主义工厂在上海榨取的高額利潤，以美商上海电力公司为例，从 1893 年—1936 年 40 多年間，賬面盈利总額为 6,500 多万元，而原来投資只 5 万兩，即盈利比投資高 1,000 倍以上。

中国的民族資本在这样情况下，一方面和帝国主义資本、官僚資本有千絲万縷的联系；另一方面又受到它們猛烈的压迫和摧残，除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及其后一个短期間以外（發展的主要是紡織工業和輕工業），总的說来，維持和發展是很困难的。

至解放前夜，国民党的官僚資本在上海工業中，占了相当大的比重，而且比較集中，以棉紡業为例：官僚資本占紗錠 39%，占布机 60%，职工人数占 38%。官僚資本一方面勾結帝国主义；一方面压制了民族資本，但这些情况也給解放后国营經济占領导地位准备了条件。

(二)解放以来上海工業的發展

我們可以举些指标来加以說明。

①工業总产值 1956 年是 119.6 亿元，1949 年是 32.2 亿元，1956 年为 1949 年的 371%；1952 年为63.21 亿元，1956 年为 1952 年的 189.3%。1957 年国务院下达指标是 111.47 亿元，預計为 128 亿元，超过下达指标 16.3%，为 1949年的 397.54%，为1952 年的 196%。

②主要产品的产量

以1956 年产量与解放前最高年产量和 1952 年产量相比：

	1956年的产量	1956年为解放前最高年产量百分比	1956年为1952年的产量的百分比
电　力	19亿度	148	145
鋼	40万吨	5,800	560
水　泥	19万吨	194	167
輪　胎	15万条	264	199
膠　鞋	5,344万双	無	189
棉　紗	162万件	127	121
棉　布	4,200万匹	126	131

（以上数字和百分比是四舍五入取整数）

③职工人数　工業职工数 1952 年 69 万人，1956 年 97 万人，增加了 40% 以上，工資福利也有了一定的增加与改善。

④工業劳动生产率 1956年工人生产价值平均每人18,000元，为1952年的141%。

此外，在制造新产品、提高产品質量、降低成本、改进工業管理、提高技术水平等方面，也取得了巨大的成績。

从上面的指标来看，要說明兩个問題：

第一、發展这样快是否正常合理？解放后，上海工業經过了接管、"二六"轟炸以及反封鎖反轟炸的斗爭、全国土改、鎮反、抗美援朝、三反五反等运动，特别是經过1955年—1956年对农業、資本主义工商業、手工業的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这都为上海工業的恢复和發展創造了有利的条件。应該指出，在抗美援朝时期，由于軍用需要，加工訂貨扩大，加以我們未能妥善处理，刺激了某些私营工業的盲目發展，增加了1954年和1955年工業安排的困难。但总的說来是正常的，發展和增加的商品，对社会主义建設和改善人民生活是需要的。

第二、是否發展够了，是不是由于我們工作未做好，而未充分發揮能力？在1956年前，我們对沿海工業的發展与內地工業的关系缺乏一个完整的理解；对于上海工業在社会主义建設中的地位，作用估計不足；对于上海工業的方針，有些搖摆不定。因此对于上海工業，特别是地方工業，从維持的一方面考虑得較多，从应有的利用和發展考虑得少了一些。上海工業总产值1953年—1955年間，每年平均增長速度低于全国和沿海地区。地方工業应有的潜力未充分發揮，有些必須增加的关鍵性設备，未加調整和补充，应該改建扩建的企業也沒有及时建議这一情况，到1956年有了轉变。

(三)解放以来上海工業的重要变化：

①根本改变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經济性質 解放后，接管了官僚資本和处理了極大部分帝国主义的工厂，約占全市一半的紗錠、占$\frac{1}{3}$的机器制造業、占$\frac{1}{5}$的鋼鉄冶煉設备。官僚資本企業早沒有了，目前外国資本还有少数几家。解放前上海工業原料主要依靠进口，如1946年—1948年进口的棉花占总消耗量的60%，小麦占50%，卷烟占60%。目前除化工、五金的一部分原料需进口外，其余大部分均依靠国內供給，而且还有許多出口。

②社会主义工業比重扩大，已占統治地位 对資本主义工業、手工業的社会主义改造，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1949年私营工業产值占总产值83%，1952年占67%，1955年占35%，1956年全部合营。

③重工業結構变化了，比重扩大了 同时重工業从解放前主要是为輕紡工業搞裝配和修理，發展成为能独立制造成套設备，精密机器仪表，以及重要的化工原料；从仿造开始轉变为能自行設計。自行設計的好处：节約外匯、节約投資、培养技术人才。1956年重輕紡工業的比重：重工業占31.1%、輕工業占30.9%、紡織業占38%。1949年重工業9.7%，1952年为22%。發展速度，如果1949年为100%，則重工業1956年为1949年1193%，輕工業为388%，紡織工業为233%。預計1957年，重工業的比重將进一步提高。

(四)上海工業基地在国家社会主义工業化中發揮的作用，总的講有5个方面：

①支援了国家重点建設，为各地（內地）工業进行协作生产 1950年—1956年七年来，工作母机調出28,000多台，發电机100万瓩以上；第一个五年計划期間上海供应了鋼材200多万吨，直接为鞍鋼协作的有30个工厂，78种产品，与長春汽車厂协作的有43种产品，与石油工業协作的有400多种石油配件。

②在市場上供应了大量的商品 七年来經国营商業供应各地的生活資料有185亿元，其中卷烟460多万箱，膠鞋17,700万双，紙張22万余吨，肥皂812万多箱，棉布18,800万多匹。

③出口 从1950年—1956年上海出口总值54亿元，其中工業品为22亿余元。在支援兄弟国家建設和为国家增加外匯收入方面起了一定的作用。

④为国家积累了建設資金 第一个五年計划中积累了190多亿元，占全国第一个五年計划基建投資$\frac{1}{3}$以上，占全国工業基建投資$\frac{1}{2}$以上。

⑤在人力方面 上海輸送了大批人才，七年来上海調出27万余人，其中工程技术人員28,000人，技术工人17万多人。

这样，概括說来，解放以后上海工業有了很大的發展和提高，性質和構成起了根本性的变化，对国家的社会主义工業化起了一定作用，这是和党的正确領导、全体职工群众的努力以及兄弟地区的支援分不开的。

二 上海工業的几个特点

(一)上海工業在全国范圍內占了相当不小的比重

①工業总产值約占全国$\frac{1}{5}$，地方工業总产值占全国地方工業总产值$\frac{1}{5}$。上海机器制造業产值占全国1/4，化学工業产值占全国26%。

②主要工業产品产量占全国的比重。占50%以上的有：蒸汽鍋爐、汽輪机、發电机、医藥、塑料、膠鞋等。占30—50%的有：內燃机、民用船舶、染料、試剂、自行車、棉紗、卷烟等。占10—30%的有：电力、鋼、燒碱、汽車外胎、电动机、机床、紙張、棉布等。

③工業主要設备占全国的比重：金屬切削机床占36%，紗錠占35%，布机占33%，印花机占50%。

这說明了上海工業在今后应当进一步發揮应有的作用。

(二)上海工業拥有較雄厚的技术力量和技术操作經驗职工中工程技术人員数約7万多人，技术工人32万多人。生产工人中，工龄在7年以上的占全部工人的66%，在資本家和資方代理人中，也有一部分担任技术工作的。

这些技术人員和技术工人，使用、裝配、仿制过許多种产品，經驗比較丰富，設备虽然較差，也能制造出精密的产品。这样，就有条件生产一些国家迫切需要、技术水平較高的新产品和高級产品，并在技术力量上支援国家的建設。

(三)工种比較齐全，相互协作較广泛，通过协作可生产国内其他工厂所不能生产的产品。因而，許多产品品种較多，質量較高，具有适应性、灵活性、多样性等特点。

由于技术力量与协作关系較好，在进行基建时，就可收到投資少、赢利大、收效快的好处。也正由于这一特点，可以綜合利用多种副产品、廢料、廢气、廢水。

基建投資少、效果大，还有下列原因：

①一般基建都在原有基础上进行，逐步扩大，这样就可以对原有設备的性能和操作方法进行研究，在扩建时加以改造和提高，如上海有一家硫酸厂原用硫磺作原料，解放前靠进口，制出硫酸成本每吨300多元，而出厂价格为170多元，很难維持。1954年合营后，改用国内硫鉄矿，成本降为150多元。而且在扩建后改为露天生产，不用鋼骨水泥建筑物，投資也节省了20—30%。

②物資可以相互調剂，設备因陋就簡。当物資或設备部件供应不足时，一般說还有几个来源：*a*.庫存；*b*.同業調剂；*c*.市場收購；*d*.节約代用。

③技术上的协作。仍以硫酸厂为例：如扩建，專搞設計，就要好多个技术人員設計一年左右，而現在是本厂技术人員不脫厂，加上外厂技术人員配合，半年就能搞成。

(四)上海主要是加工工業城市，地处沿海，原料供应、銷售均面向全国，而且是对外貿易的一个重要口岸。

上海工業構成中主要的有十三个工業，占上海工業产值10%以上的是：机器、棉紡、印染。占4—5%的是：鋼鉄冶煉、棉織、卷烟、橡膠。占2—3%的是：有色金屬冶煉、医藥、造紙、毛紡、針織、肥皂。以上都是加工工業，其他工業大部是圍繞上面这些加工工業进行生产的。

重工業产品90%以上供应外地，主要有金屬切削机床、石油配件、电动机、变压器、汽車配件等。輕紡工業产品70%左右供应外地，如肥皂占62%、膠鞋占68%、棉紗占65%、卷烟占68%、毛綫占63%等。

生产資料和生活資料大部是外地供应的，生产資料每天运入达数万吨，主要物資为兩白兩黑，兩白指棉花和粮食，棉花一年要×××万担，粮食××亿斤。兩黑指煤、鋼鉄，煤每年×××万吨，鋼鉄××多万吨。此外木材××万立方公尺，油料××万多吨，烟草×万多吨。

这說明了：

(1)上海工業在本市范圍内地产地銷的产品是極少的，上海工業計划的制訂和生产的安排，必須与全国配合，統一平衡，全面規划。

(2)上海自己也要尽可能地生产一些关鍵性的原材料，主要是化学工業及冶金、机电工業。同时要加强与外省的协作。

(五)重工業發展速度較快，但輕紡工業仍占較大的比重，有些产品設备利用率不高，还有潜力。从1956年情况看，輕紡工業設备利用率有些在80%以下，在20%以下的也有油漆、火柴、針剂等。这說明了上海輕紡工業的發展与农業經济作物的收成好坏关系十分密切，除了要加强与农業原材料的平衡以外，輕紡工業还必須努力从塑料加工、金屬日用制品加工、合成纖維加工和制造高級产品等方面开辟新的道路。

(六)一般都能因陋就簡，进行生产和建設，但不少工厂設备陈旧，厂房过份拥挤，中小厂很多，設备不平衡。根据調查在16,000戶工厂中，公私合营的有15,400戶，其中98%以上是在大合营时批准的，称为新合营。在16,000戶中，按职工人数分組，50人以下有13,000多戶，50人以上3,000戶左右。此外还有几千家自發戶(地下工厂)。

設备不平衡，重、輕、紡工業各举一例：如煉鋼与軋鋼，煉鋼能力占軋鋼能力54%；紙漿与造紙，造紙漿能力占造紙能力57%；紡織方面，以紡紗能力折合布匹数为100，織布机能力为56%，印染能力为69%。兩头大，中間小。

此外，很多設备已經陈旧，需要换新；厂房拥挤簡陋，劳动条件不好；这就使得試制新产品有困难，产品成本較高，質量在有些小厂里也較差。

这說明了資本主义旧企業唯利是圖、盲目發展遺留下来的缺点是严重的，也不是一下子就可以徹底改变的，而今后如何有計划地积極地进行技术改造、經济改組是个大問題。

(七)上海有不少科学研究机構、高等学校，工業部門在提高技术和管理的水平，制造新产品等方面，可以取得很多帮助。水、电、煤气、公共交通等市政設施、鉄路、港口、碼头、倉庫等交通运輸，也較有基础，可以配合工業的發展。另一方面，上海工業已相当集中，人口較多，城市有些臃腫。上海常住人口已有690多万人，加上流动人口有720万人，而面积小，就發生了一系列的問題：如住宅

問題，水的問題（上水量大大超过下水量），运輸（市内貨运量超过了現有运輸能力），及生活用品供应問題等等。因此，今后規划工業發展时，不能过份加重城市負担，要考虑建立衛星城市、动員剩余劳动力支援外地建設以及开辟副食品供应基地等。上海資本家及工人阶級亦比較集中，全国私营工業一大部分在上海，因此，对資本家的改造和政治思想工作也就十分繁重。

（八）中央部主管的国营工業比重較大，就产值来說，国营与地方各占一半，其中如鋼、水泥、卷烟、紙張、棉紗、毛紡、麻紡都是国营。而跨行業的有机电、肥皂、化工、織布、印染等。这样，一方面地方厂可以向国营企業先进的技术、企業管理、計划工作等学習，交流經驗；另一方面，国营厂和地方厂在劳动力和物資調配、生产协作、基本建設等方面非常密切。必須加强协作配合，統一平衡（最近体制已有改变）。

上面所講的上海工業的几个特点，由于研究得很差，既不全面更不深入。但总的說来，有些是有利的条件，也有不利的一面。有利的条件是主要的，对于工業生产的計划和安排来說，必須考虑到如何發揚有利条件，克服和防止不利条件的影响。

三　上海第二个五年計划工業初步規划的要点

第二个五年計划已在編制中，还沒有經过領导上审查和全国的平衡，只能談一些初步的看法和打算。

总的方針：充分利用、合理發展。

根据上述工業特点，必須回答两个問題：充分利用是什么？合理發展是什么？

充分利用：保持和發揚上海工業的有利条件与特点——多样性、灵活性、善于仿造、适应性强等。在此原則下，充分利用原有設备、厂房、技术协作关系等，来支援国家建設。

合理發展：根据全国需要及上海可能，主要發展能代替中央新建、在上海建設比較有利、以及和内地矛盾不大的項目，而且使發展又不致过分加重上海各方面的負担。

主要發展方向，要考虑下列几个方面：

①充分利用上海工業的有利条件，發展化学工業，精密的机器、仪表、电訊等行業，以及对上海工業生产有重要作用的原材料；輕紡工業主要生产高級及出口的产品。上海工業要多生产一些国家迫切需要、技术水平較高、品种花色多、原材料消耗少、輕型的高級产品。

②充分利用上海技术力量，大力提高技术水平，使上海成为全国發展新技术制造新产品的工業基地之一。

③上海要繼續保持和进一步發揮本地区的工業与全国工業的协作配合的作用。

这样，上海的工業除了徹底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工作以外，主要是根据国家建設的需要，結合財力物資可能及劳动力合理安排情况，有步驟地大力解决較落后的設备与社会主义生产發展的矛盾，对現有工業进行經济改組及技术改造，在利用現有設备的基础上，进行必要的改建和新建，同时要照顧到国家和人民的需要，照顧到国家对工業的合理布局，全国供产銷的平衡，使上海工業符合社会主义建設、社会主义工業化的要求。

上海第二个五年計划的初步規划，要根据党中央提出的在优先發展重工業的基础上，發展工業和發展农業同时并举；勤儉建国和多、快、好、省相結合；和統籌兼顧、适当安排的方針，以及市委对上海工業充分利用、合理發展的方針，进行編制。在發展工業方面，要着重考虑保持原有企業的优点，大力提高技术水平，合理調整組織，加强劳动力的調配工作，以达到增产不增人或少增人，不过分增加城市負担和加强与外地协作的精神。要求在資金、技术、物資等方面进一步支援国家建設，作出更多更好、加倍的貢献。

第二个五年計划期間，工業总产值要求增長一倍以上。在地方工業生产方面，我們除了在原有基础上进行經济改組和技术改造以外，打算进行如下的基本建設（大多数是扩建、迁建，一部分是新建）。

1. 化学工業：　考虑建設煉焦制气厂。上海每年原煤消耗数量不少，煤炭直接燃燒，只利用了少量的热能，新建煉焦厂，生产煤气，供工業及民用，热能利用率可以大大提高，还可以增产焦炭和大量的焦油、苯、硫胺等化学原料。

利用石油廢气建設生产聚苯乙烯、环氧乙烷、石炭酸等化学原料的高桥化工厂，用来制造合成纖維、塑料等。

建設化学肥料厂，以年产 20 万吨計，可以增产水稻十一亿六千万斤，或籽棉三亿斤。建設聚丙烯晴（即人造羊毛）、尼龙 66、尼龙 11、滌倫等合成纖維的單体厂。建設聚氯乙烯車間，聚氯乙烯塑料用途很广，可以制造工業用的管子、薄板和日用的雨衣、台布等。建設利用木材廢料的纖維板厂，以年产六千立方米計，相当于原木板材二万六千立方米。

此外，建設生产有机磷等的高級农藥厂，年产四万吨的硫酸厂，扩建橡膠輪胎厂等。

第二个五年計划期間，化学工業將逐步改变目前化学原料工業大大落后于加工工業的情况，改变化学工業产品在品种上远远落后于需要的情况；初步建成以煤和石油为中心的綜合利用体系，以及高級的塑料和合成纖維等新兴工業；建成比較完整的化学肥料、高級农藥、高級医藥和試剂工業；增加橡膠、造漆和無机鹽工業的产品

品种，以基本上适应本市机电、仪表、輕紡工業的發展，以及适当滿足国防工業的需要。

2.机电和鋼鉄工業：考虑建設为农業水利排灌服务的大型水泵、动力設备和啓閉設备的制造厂。扩大水稻机械和金屬材料的加工能力，建設高級玻璃纖維厂，用于电机、国防及航空工業。建設以利用粉矿和硫鉄矿渣为主要原料的煉鉄小高爐。建設年产無縫鋼管 2 万吨，接縫鋼管 16,000 吨的上海鋼管厂。新建年产 3 万吨的矽鋼片厂。新建年产 3 万吨的黑鉄皮厂。

为了支援重点建設和扩大机电設备制造能力，建設鑄鍛能力 6 万吨的槓和翻砂厂，建立以 1,200 吨水压机为主的鑄鍛中心，以解决上海地区大件鑄造問題，提高上海机器工業的生产能力和技术水平。建設年产造紙机 6,000 吨的中华造紙机器厂。建設生产自动控制及远距离操縱等的精密电子、电訊仪表工厂。扩建化肥設备制造業，生产化肥設备，以适应全国化肥工業發展的需要。

第二个五年計划期間，在机电和鋼鉄工業方面，除繼續保持各地协作关系外，將生产煉焦、化肥、輕工業机械（橡膠、塑料加工、造紙、印刷等机械）成套成台設备。建立起生产矽鋼片，有縫、無縫鋼管，黑鉄皮等关鍵性原材料工業，建成中型的鋼鉄联合企業，扩大中小型鋼材的品种規格。發展以电子仪器、精密部件为中心的無綫电工業，生产無綫电傳眞，半导体收音机等新产品。發展以热工仪表、电子仪表为中心的仪表工業和中、小型精密机床制造業。

3.紡織工業：考虑建設聚丙烯晴、尼龙 66 等合成纖維的紡絲厂，聚丙烯晴以年产 2,000 吨計，每年可减少羊毛进口 2,000 吨。建設卡勃隆抽絲厂，以年产 5,000 吨計，相当于 12.5 万件棉紗。建設粘膠纖維厂，以年产 1 万吨計，每年可减少人造絲进口 1 万吨，节約外匯 500 万英磅。建設紫羊絨衫厂及兎毛衫厂，紫羊絨衫以年产 150 万件計，兎毛衫以年产 50 万件計扩大出口后，即可增加外匯收入約 1,500 万美元。建設透明紙厂，以年产 1,000 吨計，每年可节約外匯 750 万美元。建設尼龙絲袜厂，以年产 134 万打計，約可节約棉紗 15,000 件。

在第二个五年計划期間，在紡織工業方面，除利用現有厂房扩建一些紗錠和适当提高紗支外，为了更好的發揮上海作为一个紡織工業基地的作用，將大力發展合成纖維的聚合紡絲和混紡。如混紡的卡勃隆織物，以及和羊毛混紡的聚丙烯晴，和絲、麻、棉混紡的粘膠纖維和尼龙等織物，以增加新品种，同时并大力發展各种高級的紡織品，如防縮、防縐的高档織物、多套色印花布等，以扩大出口。

4.輕工業：考虑建設聚氯乙烯、苯乙烯，电玉粉等塑料制品厂，塑料制品一般有耐酸、耐碱、防蛀、抗潮等功效，可以代替金屬材料、棉布、紙張等。扩建手表厂、建設仿萊卡式的高級照相机厂、軟片厂、感光紙厂、扩建五金玩具厂、化学玩具厂、扩大冷藏設备滿足副食品及出口品冷藏的需要。恢复年产12,000 吨的上海啤酒厂，改建肥皂厂，生产合成洗滌剂，以年产 4,500 吨計，可制洗衣粉 14,000 吨，节約油脂 14,400 吨。扩建自行車厂、建設人造皮革厂。

第二个五年計划期間，在輕工業方面將結合化学、机电等工業的發展，并利用上海技术条件和协作关系，大力提高产品質量，扩大花色品种，生产高級照相机、各种塑料制品等高級产品和新产品，对于部分与內地生产發展有矛盾的产品与行業，將逐漸改变生产方向。

上海工業的总的方向和面貌：將發展成为化学工業、精密机械、仪表、电訊器材、小型鋼材、船舶修造、輕紡工業高級产品、各种文化用品和文化精制品等現代化的工業基地。若干質量較低的主要产品，可以爭取分别在第二、第三兩个五年計划期間赶上或者超过英国或美国同类产品的質量水平。

勘　誤

1957 年 第四期

“試論民族資产阶級兩面性及其分化”一文中，第一面右欄中“三次右傾”应改为“三次左傾”。又該文最末一行“1857 年”应改为“1957 年”。

学　术　动　态

近月来，我院广大师生虽然都热情积極地投入了紧张的整風运动中，然而，学术活动以及与業务部門联系的活动却仍然异常活躍。

× × ×

与我院訂有正式合同关系的業务部門，計有財政部、上海市統計局、人民銀行上海市分行、人民建設銀行上海市分行以及上海电机厂、上海烟草工業公司等單位。虽未訂有正式合同，但联系甚为密切的則有上海市計划委員会、上海市各工業局、商業局、农業局以及新中动力机器厂、上海自行車厂等單位。联系的主要內容一般是双方提供有关資料、参加有关重要会議、派員作專題报告(或系統性講座)、一方委托或双方合作研究以及由業务部門提供参观实習的便利等。

× × ×

近来，接受邀請来我院作專題报告的有上海市計委、华东紡管局、上海市劳动局、物資局、財政局、第一商業局以及人民銀行上海市分行等單位的負責同志。报告的內容有：上海市的工業情况、上海市紡織工業的發展、厂內經济核算制、工資改革問題、物資技术供应、关于1958年的財务問題、国营商業組織机構和計划制度的改变、价格工作以及非現金結算等問題。第一机械工業部第二設計分局同志还为我院工業經济系开設了“机械工厂設計与規划”的講座。这些报告与講座都大大有助于我院师生提高政策水平，熟悉实际工作情况与提高業务能力，深为广大师生所欢迎。

× × ×

貿易系师生在全市下放干部参加农業生产的高潮中，有組織、有計划地每周一次輪流参加了中国食品公司第一食品商店的售貨劳动，他們不仅热情很高，而且未出一次差錯，食品商店职工們曾来信致謝并要求今后繼續协助，特别是業务最忙的春节前希望組織大批人力支援。貿易系师生已决定于考試結束后，再度輪流投入售貨的义务劳动，加倍努力以协助食品商店职工同志們胜利完成工作任务！

× × ×

財政信貸系負責同志为人民銀行上海分行开了“苏联貨幣流通与信用”的講座、工業經济系工業企業組織与計划教研組为上海自行車厂开了“技术定額”的講座，業务部門認为帮助很大。

× × ×

工業企業組織与計划教研組徐之河先生与上海自行車厂計划科負責同志合作研究，完成了“期初在制品成本水平对本期計划成本水平的影响及其处理方法”的科学論文。

× × ×

农業經济教研組負責同志經南京农業厅农垦局的介紹，于1957年第四季度到国营練湖农場进行了短期的参观，收集了一些宝貴的資料。

× × ×

我院1957年度的科学討論会，为做到更充分、更深入的准备，以进一步提高論文与討論的質量，决定延期举行。目前，各系、教研組及教师們一般都在爭取时間加紧准备，拟参加討論的論文已經或即將陆續举行小型討論会以进行教研組內部的审查与帮助。

× × ×

財政信貸系在前一时期組織了关于財政本質的專題討論，准备較为充分，討論尙深入。

× × ×

研究处为滿足广大同学的要求，特于前兩个月补办了兩次專題报告会，由王惟中先生主講“关于無产阶級絕对貧困化問題”、丁日初先生主講“关于当前大力發展农業的几个問題”，內容都很丰富，頗得好評。

× × ×

我院統計系王善彰先生在院部大力支持下，于1954年創制了簡易助算器(原名活动計算器)。經高教部、中国科学院、国家統計局等單位审查后，一般尙認为“該計算器进行計算的原理是正确的，在运算速度方面，确比單独用珠算的一般速度高。”目前，該計算器已进一步改进了，計算方法更为簡便了，有助于广大財經干部解决运用算盤、进行多位数乘除和开方的困难。現已由上海市第一輕工業局指定上海日用品五金公司委托华兴厂制造，于本年第一季度暫先制造1,000架，將由上海文教用品社作为新产品試銷。

希望广大經济研究者和財經干部訂閱

財經科學

"財經科学"主要刊登政治經济学、馬列主义理論、国民經济史、国民經济計划、工、农、貿經济、財政、統計、会計等有关財經方面的論文。

訂閱办法:

(1)每本訂价 0.70 元,每三月出版一期,全年訂費 2.80 元,銀行轉帳(中国人民銀行成都支行祠堂街营業处,四川財經学院开戶帳号 372002)。

(2)訂閱地点:成都市四川財經学院学报編輯委員会。

(3)代售地点:全国各大中城市新华書店。

财经研究	編輯者	上海財政經济学院 財經研究編輯委員会	
	出版者	新知識出版社 (上海湖南路9號)	預定价目
(双月刊)	印刷者	商务印書館上海厂	每双月一期 定价(5)0.40元
1958年 第1期	总發行者	邮电部上海市邮局	国内平寄邮費免收
(总第7期)	訂閱处	全国各地邮局、所	定費一律預收
1958年2月15日出版	代訂代售处	全国各地新华書店	

印張:4 字数: 138,000 印数: 4,315册 (代号 4—37)